

第九期 (2023 年 11 月)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



组织 宣传 学习

联系&订阅: RSF-kan@tutanota.com

(使用安全邮箱向我们的邮箱发送“订阅”，即可在每月 27 号收到杂志)



RSF 编辑部制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FRONT

目录

关于我们.....	3
第一部分 理论阵地.....	8
论民主集中的问题.....	9
历史模仿家.....	45
该如何融工以及不该如何融工？	50
揭穿大群最新污蔑的实质.....	53
第二部分 路线斗争.....	56
融工分享——我们是如何进行融工的？	57
新十月的先生们究竟想做什么？	66
谁在为工人们事业而奋斗？（评《融工分享——我们是如何进行融工的？》口头政治斗争派彻底露出形左实右的狐狸尾巴）	81
第三部分 社会社评.....	84
评李克强之死以及相关运动.....	85
评最近农村的阶级斗争.....	95
简评上海某中学学生学农期间发生的卫生事件.....	101
2023年10月中上旬到11月中上旬工人运动的趋势.....	105
第四部分 读者投稿.....	106
官僚制综述.....	107
第五部分 宣传内容.....	112
发展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的号召.....	113
第六部分 斗争艺术.....	114
清楚网络访问痕迹-避免网络追捕.....	115

关于我们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是致力于在中国推进一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以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我们创立《革命社会主义阵地》旨在通过对一些普遍公认的马列毛主义基本原则进行梳理和分析，以帮助马列毛主义者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力量的进步。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在工人阶级中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打下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此外我们也十分乐意帮助任何真诚的想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同志们进一步提高知识文化素养和必要的技术能力；我们认为这些素养和能力一方面是运动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帮助同志们少走弯路。（例如：各种合法斗争的方法、发展秘密组织的经验、把非法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的艺术、和反动警察斗争的经验、信息安全技术）

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和资产阶级全面复辟以来，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中国劳动人民就从社会的主人沦落为了雇佣奴隶。此后直到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处于被资产阶级完全专政的地位，而毫无任何实际权利可言。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这世界上绝不会有人甘愿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甘愿永远任人摆布。中国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哪怕一秒。而且，随着近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导致的经济下行趋势越发明显，统治阶级必然会向工人阶级发动越来越多的进攻，因此工人阶级的斗争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必然会有重大提升，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工业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是头一次见到了。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由此发现一对矛盾，那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需要进行斗争（现阶段很多情况下实际是“反击”）同中国工人阶级缺乏进行斗争的必要“武器”间的矛盾。我们都知道，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一般都具有非常强大，十分高效的维稳能力（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千秋万代，保证雇佣奴隶制能够延续到永远）。中国的统治阶级（独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容任何挑战，哪怕是最普通的经济斗争也会招致最无情的打击，在这种法西斯国家里连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需求都难以做到。面对这样的法西斯怪物，我们的工人们除了用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外几乎别无他法（当然了，我们这里并不是说只要非法斗争）。而工人们除了组织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进行斗争的武器。我们谁能够设想工人们能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赢得哪怕是一场小规模、最初步的经济斗争的胜利？即使是最初步的经济斗争也是需要一定的组织宣传联络工作的，更不要说未来的政治斗争乃至最终的阶级决战了。一句话：没有组织就不可能做到工人阶级的联合，而没有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力量自然也就无力应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疯狂进攻。

然而不幸的是，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人都知道，虽然工人们非常需要组织但我们最缺乏的却恰恰又是这个武器。要用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从而“武装”工人阶级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客观环境极端恶劣。另一方面则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才刚刚开始行动，还没有广泛的同工人阶级深刻的结合起来。

中国的统治阶级根本容不得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群众组织，即使是前几年那些对资产阶级统治完全无害甚至是对现有秩序进行有益补充的公益性非政府组织（他们搞得东西和现在未明子之流的活动差不多）都遭到了最严厉的打击。面对这种情况自然就有些人跳出来，告诉我们现在要做的首先应该是等待合适的时机，因为根本没有可能在当下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推进运动的发展。对于这种人，我们称之为“等等主义者”。诚然，真正的革命者也会分析困难，

但真正的革命者分析困难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克服困难以实现最终的目的，而绝非逃避困难。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了“等等主义者”的“高论”，那么即使当机会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把握住机会，更不必谈无产阶级专政了。试想在我们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即使统治阶级真的面临巨大的统治危机，群众即使真的无法再继续往日生活了，但那时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群众会跟着那些从未同他们有过实际联系却又自封为“革命家”高谈阔论的人走吗？到时候整个运动最好的结局估计也就是像德国十一月革命一样被回过神来的统治阶级粉碎罢了。我们认为，中国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革命的主观条件是否成熟。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危机只是促成革命的客观条件之一罢了，而真正能使革命危机转变为成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是革命主观力量的充足准备。我们认为革命主观力量准备充足与否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革命者和广大劳动人民是否走在相对正确的政治路线上，这是纲领性的问题，是决定一切的根本问题所在；第二方面是我们是否具备具体的斗争实践方法、必要的物质和技术等等现实物质条件。

虽说第一方面是根本性的，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就要抛下第二方面不管。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和革命斗争所必需的现实物质条件严重不足的这一矛盾呢？毛主席说得好“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1]一句话，我们不是成为了大多数才去斗争的，而是在斗争中逐渐成为大多数；我们不是在具备了各种物质条件后才去运动的，而正是在运动中逐渐具备各种物质条件的。（当然了这绝不是说我们应该盲目的去送命，而是在具体的斗争中快速的学习并成长起来）而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归结于正确的路线。也就是说，要争取到必要的现实物质条件应该在坚持正确道路的前提下先投入到斗争中去，而绝非一味的等待。当然了，这世间绝不存在什么先验的绝对真理，所谓的正确路线实际上也就是在历史和现实的无数阶级斗争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那些理论和经验罢了，而这些理论和经验又反过来指导我们今后的斗争。这也正是马列毛主义的生命所在。

近来中国阶级斗争的事实也证明了，虽说中国统治阶级确实非常强大，但也绝非是不可战胜的。疫情时期我国各种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如：上海封城时期的各种群众运动、富士康工人们的斗争、乌鲁木齐事件的群众运动、全国各地的群众冲关事件、白纸运动等等，这些运动难道最终没有迫使当局放弃了极端反动的“清零政策”了吗？（当然了，有的人肯定会说全面开放都是因为地方政府没钱了，假真如此，这也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主要的因素是我国群众用实际行动愈发的迫使政府放弃他们的极端政策，这就使得他们在十月份都还坚持要防疫到底却又在十一月份突然来了个180°大转向。）然而这个时候估计又有些“革命家”跳出来准备“实践”一番了，从成天专注于喊口号、做大梦的机会主义小团体“中共（毛）”[2]，到部分贡派的朋友们的所谓“中国毛主义者小组”（他们僵化的简直震撼世人，他们竟打算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抵制不存在的、所谓的“资产阶级议会选举”！！！）[3]再到最近成立的所谓“革命共产主义联盟”都是如此。这些朋友们在实际上是把共产党当成某种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了，当成是某种只需要几个自命为革命者的人坐在一起开个会再出份宣言就可以变出来的东西了。但不幸的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不是戏法师傅，绝不能从真空中变出一个党来，我们也相信他们也同样不具备此种神奇魔力。事实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最高级别的工人组织。换言之，先锋队是在大量群众工作，遍布全国的、和工人阶级有深刻联系的马列毛主义小组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的发展，最终形成的一个强大组织；所谓的成立大会，只不过是把先锋队存在的既定事实给摆上台面罢了。从这个逻辑来看，目前及之后一段时间里，任何在中国大陆地区成立的所谓“无产阶级先锋队”顶天不过是一群左翼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俱乐部罢了。

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谈到了现阶段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需要进行斗争而又缺乏斗争的武器的现象。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现阶段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工人们尚未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应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暴政。（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还不存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意义上的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无产阶级）群众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海洋里爬上岸；马列毛主义尚未被群众接受并成为劳动人民自己的意识形态。一句话：革命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同革命的阶级相结合。而我们正是要使革命的阶级逐步具有革命的意识形态，使中国劳动者能自觉的捍卫自身阶级利益，并最终能够组织起来走向彻底解放自己的光辉的社会主义大道。而要改变现状以达到这

个目的，我们认为需要有一批具有各种必要素养的的革命知识分子，而这也就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他们将首先联合起来，去到社会各阶层中去学习、去实践、去宣传、去组织、去斗争。当然了，在一开始我们还没有足够力量的时候，我们应该主要到工人里去，特别是到产业工人那里去，他们永远都是我们的基本盘。

但是如果我们这些自命为马列毛主义者的人，连自己都不能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一个相对清晰科学的认知又怎么能到群众中去开展各项工作呢？如果我们自己对革命的学说都不能有一个基本理解的话又怎么去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呢？如果我们没有发展革命组织的必要知识素养和维护群众利益的必要手段怎么能够代表群众并使他们走向革命呢？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一种渠道，来把这么多年来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所形成的一些基本认识所总结出来并尝试加以分析，以促进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自身在基本理论上的进步，为不久的将来所进行的群众组织工作打下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而这也就是我们这份杂志存在的重要目的之一。除此之外，我们杂志也必须要做到能推动我国目前还很弱小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的现实组织工作，要推动建立革命组织、群众组织、革命家组织，所以它必须还要服务于我们现实组织工作的理论、政治路线需求。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指责我们搞宗派主义，不懂得联合各种泛左派。但问题在于什么是“联合”？如果我们把“联合”定义为“一定范围内的个人或不同团体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在一定原则下选择的统一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同任何人联合的目的都必然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最高要求而服务的。然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是讲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的，我们的理论和道路绝不是哲学家或伟大导师从真空中凭空想出来的绝对正确的律令，而是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年里，无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的、血与火的阶级斗争实践中一步步总结出来，并反复被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代表的无数具体革命实践和今天仍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地进行的人民战争所反复检验的理论；是在实践中能够进行自我反思并不断发展的理论。（不然是怎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马列毛主义的呢？）而历史和现实也同样无数次的证明了其他各种各样的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妙论从来就没有同工人运动真正大规模的结合过，几乎没有为运动争取到半点的突破，反而很多时候在起阻碍作用，更不要提靠它们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了。且不谈已经沦为和自由派没什么实际区别的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第二国际时代就已经被驱逐出去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一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的托派分子也就那样。托派分子所鼓吹的什么“工农对立”，就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成为过主要矛盾；还有他们热衷讨论的所谓“官僚问题”，实际上和自由派天天痛骂的所谓“秦制”一样，基本就是一个空洞的靶子和好用的帽子；至于那荒谬的“世界革命论”则是要求不顾世界各国运动发展的自身逻辑、不相信各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以极端傲慢的态度要求革命率先胜利的国家不顾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强行推进所谓“世界革命”，这种策略不但难以推动世界革命，甚至很可能把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政权也葬送进去。

对于那些自称为“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人也就是贡萨罗派还值得分辨一番。我们相信绝大部分贡派朋友都是多少有一定理论基础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是被极少数顽固的接近于修正主义者甚至已经是修正主义者的贡派所误导了的。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只要他们继续坚持学习基础理论，并多多加以反思的话，肯定是可以继续进步并最终投向我们的队伍的；但为了帮助他们实现进步，我们反而要不断指出他们目前的问题所在。而对于极少数十分顽固的贡派分子，只要他们没啥现实影响力我们就几乎可以无视他们，而假设有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对待修正主义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了。事实上，贡派和马列毛主义主流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已经持续很久了，并且还将持续下去，而我们的一些同志也已经在部分国内合法公开的平台同他们交锋过好多次了，写了不少优秀的文章。因此我们的杂志相对而言应该不会涉及太多这方面的内容了。（当然，肯定还是会有有的）

实际上泛左翼的问题绝不只有我们刚谈的那么一些，但在这里实在没法全面展开论述了，我现在只谈一点：要想真正促进那些泛左派的人进步，要想真正实现广泛的联合，要的绝不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去妥协或勉强接受对方的所谓“妥协”，而是要坚持路线斗争，坚持用马列毛主义的方法逻辑来指出他们的正确和错误的地方以及为什么正确或错误；唯有这样才能够在革命的旗帜下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否则当我们在错误的路线下同泛左实现了所谓的“联

合”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联合”甚至会让我们把自己本来相对正确的东西也被迫丢失了，实在是得不偿失。而若是我们能够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共识总结起来，锻造成一把利刃，并在具体事例和运动的发展中实际运用这把利刃来深刻的解剖各种现实问题的话，那么任何真正愿意推进革命而又具有基本的反思能力的人反而更容易摒弃原先错误的东西，转而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从而实现真正的大联合。

还有的同志可能会觉得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各种墙内的网络平台上，用视频之类的途径进行所谓的宣传工作。事实上我们的工人们并不会花大把时间在这些平台上广泛活跃，他们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在百忙之余抽出时间去网上大量的看这些视频。通过这种倍受限制的方法去缓慢的直接影响部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任务不是我们编辑部的主要任务。而对于有更高追求的马列毛主义者而言，则更不会把看视频当作提升自己的主要途径。另外，即使是从单纯的信息传播效率的角度看，汉字也要比任何视频或音频的效率高得多，尤其是在传播严肃内容的时候更是如此。此外更不要说我们在那些公开的网络平台上只能做最初步的政治宣传而任何一点涉及关键内容的东西都是难以涉及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绝不是要像“火星报”一样现在就要扮演一个能够团结起全国各地活动小组的全国政治报的角色。这是因为现阶段中国根本还不存在什么马列毛主义者和工人们相结合的活动小组。我们还在 1895 年之前，我们尚未建立“彼得格勒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既然没有什么成熟的线下组织可以团结，那么现在也就自然不会有“火星报”，我们只是要促进我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往这个方面发展，从一个更基础的地方开始起步做起；从这点看，以叛徒“米宁”为代表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前几年搞的什么“全华政治报”是非常奇异搞笑的存在。诚然，布站的马列毛主义者们也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这很多方面的工作上，他们都曾经是我们的老师。布站老管理们的不少判断（例如那“五个基本判断”）都是至少十年前做出的了，这些判断在当时大多是非常深刻的，有的内容放在今天都极具价值，而有的地方在今天却显得过时了，例如将当下的中国判定为所谓的“二流帝国主义”（实际上，我们认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仅次于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是目前唯一有野心又有能力同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势力）。在有的问题上，布站的同志们又谈的太少了，例如台湾问题和女性解放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等等。并且布站的老管理们如今还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如：提出了完全错误的线下组织工作路线，恶劣的诋毁我国其他革命组织，在一些行为上故意的阻碍和破坏我国目前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线下组织工作，老管理们其在布站组织内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问题严重的伤害了许多优秀的革命分子和革命工作者们，用错误的路线影响群众等等。这些错误使我们不得不开始批判，但我们也不否认布站以前的历史成绩，不否认布站其他优秀的同志，不否认布站现在还在起正面作用的革命工作，不否认其他受其影响的还很有革命意愿的进步人士。我们目前要求批判布站老管理们现在的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行径和要求布站改正其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我们希望布站的老管理们能迅速认识错误改过自新，我们也希望布站的其他同志们和受其影响的人士们能认识到问题，和我们一起团结起来批判其严重的机会主义、帮助其改正错误、克服其错误影响等等。

现在我们的经验确实十分有限，对于很多问题不可能现在就能做出非常完备和严谨的分析与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连一些最初步的分析与判断也做不到，在这点上我们是希望能够超越我们曾经的老师的。虽说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将基本共识总结起来并尝试进行分析，但这绝不是说我们的杂志就只局限于什么“纯粹的理论分析”。实际上，哪怕是最好的东西，哪怕是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一旦脱离了社会现实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因此我们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我们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对现实的具体情况所进行的分析。当然，我们还需要全国优秀的马列毛主义同志和先进群众们的参与与帮助。除此之外，我们也试图使我们的内容能切实的帮助到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使它能对我国的革命工作者们能起到现实的有益帮助。

并且我们除了这个刊物本身的作用外。我们革社也希望通过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等方式来团结起我国优秀的革命组织和革命分子，以更好的斗争各种机会主义和纠正我国革命力量的各种错误；并竭力推动我国革命工作的发展，努力消除那些种种阻碍我国革命事业前进的

阻力；并能在这样的不断团结、不断消灭机会主义和错误、不断发展革命工作的过程中逐步的建立起我国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对于未未来具体会发生什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对此我们只有两句话可说：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如果要持续阅读我们的作品，请联系我们在下面段落标注的邮箱地址，发送“订阅”的内容。

如果是有意见或问题、以及有投稿或其他事情的读者也请通过邮箱联系我们，我们会尽力回复。（当然如果是恶意破坏的行为或有安全风险我们则不会回复。）

我们的邮箱地址：RSF-kan@tutanota.com

对读者朋友们的提醒：请大家使用非国内的、相对安全的邮箱来联系我们或当作接收我们订阅的邮箱。如 Protonmail、Tutanota、Gmail 等。如果使用国内邮箱来联系我们并作为接收刊物的邮件，则不能确保信息的安全性，可能会被反动派官方审查。如 qq、163 等邮箱。出于对同志们安全的考量，我们也不会接受来自国内邮箱的订阅，也不会回复联系，还请理解。

并且，读者朋友们如要向革社（RSF）进行投稿或者有其他事情需要联系我们的，请通过邮箱以邮箱文本的形式发送给我们。请不要向我们发送文件、文档等一切形式的附件以及各种链接，为避免安全隐患，我们不会接收附件，也不会打开任何链接。

第一部分 理论阵地

第一部分是本刊物最重要的部分。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革命的理论是我们革命运动中主观力量的精神条件，是我们政治路线的直接体现，也是革命的灵魂所在。我们在这部分集中创作或整编了一些其他国内外同志的优秀文章，用来丰富我们的内容和我们的思想。对于推动我国大部分马列毛主义者和其他进步群众们的理论成长，以及指导目前我国各种早期幼年的进步组织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方法有重要意义。

由于读者和同志们的要求、建议，以及我们的实际工作的需要。我们目前把该部分重心转到了组织建设方面的内容。

论民主集中的问题

革社（RSF）编辑部

我国左翼对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争论已经有了许多，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随着我国群众运动、革命运动的发展也越来越激烈，可以预见的是这个问题在未来也会越发重要。特别是在我国墙外领域中已经对此产生了许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分歧乃至冲突，大群的老管理和东风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争论、斗争公社反对大群官僚主义的斗争、各组织对于这个问题的简单阐述和各自的组织制度现在都属于这个问题的实际范畴之一。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实践目前已经成为了决定我国革命分子的工作发展和革命组织的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但涉及这个问题的争论目前还比较零散、内容所涵盖较多，因此作者试图更为全面的论述这个问题，我们想为读者理清思路，提供读者能够更全面、更理智、更透彻看待这个问题的条件、以及试图提供一个更好的实践依据。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里曾这样写道：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马克思《资本论》

列宁同志开创性的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科学内容，列宁同志是天才般的以一个整体的方法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他的对于该学说的内容奠定之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成熟体框架。但本书对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却要先从更细小的方面入手，而一开始直接就谈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因为更细节的要素的内容和定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也就是组成民主集中制问题的细胞的问题，因为这些细胞有着自己的矛盾作用，如果我们要全面而又彻底的了解这门科学的话就不得不理解他们的细胞。而这方面的开头也是相对比较艰难的。在这些细小的方面也要像马克思一样用到抽象力，学习像马克思先从解决商品的问题来解决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一样来从解决民主和集中的细胞问题开始来解决整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而在这个方法上，我们已经有了马列毛主义高度的哲学，这是作者所能采用的优越条件。并且这个问题也不至于都只能用那样的方式来解决，因为历史上也有了非常多的对于该问题的实践经验，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民主集中制科学的躯体可以给我们作为参照，而缺乏的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整理、归纳而已，在这一方面上过去革命先辈的实践经验早已走到了理论的前头，作为后代的我们只是继承前辈的精神遗产。所以本书的内容完全只是利用现有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和丰富的历史经验所进行的归纳总结。

但有一个问题是作者不能为读者们解决的，那就是内容的不足，因为作者当以自己的马列毛主义理论水平和个人经验来全面的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所涵盖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而作者的现有能力和精力又是有限的，因此作者只能够完成研究归纳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工作，因此读者切不可把本篇文章当作这个问题的全部或完全正确的，在现实中它只会比本文所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而要更彻底和更全面的完成这个工作还有待未来其他的革命者和先进劳动者们通过自己更为优秀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来达到。

一. 集中和民主的辩证关系

a. 一般民主和一般集中

民主集中制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而产生的东西。民主集中制的正式提出源于1905年的俄国，它由列宁提出，源自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问题和革命运动的现实需要（对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在做更详细的谈论），这要求在党内实现少数服从多数等制度。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现代民主集中制产生的条件，它的要求也是要把集中和民主完美的结合起来。两者结合起来也就形成一个特殊的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的现​​象是从此时此刻才开始的，事实上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民主和集中就不可避免的纠缠在一起了，或者说我们现在意义的民主和集中是在这一时期才刚刚产生的现象。只是直到几千年后的俄国1905年革命时期才有了对这种民主集中的更明确的和更彻底的要求。

在人类未进入阶级社会以前是不存在也不需要我们现在意义的这种民主和集中的，因为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现象和需求恰恰意味着人类的社会权力和活动是基于不平等的，它必然要以另外一方面的专政作为补充，这和阶级社会以前的情况完全不同。而在原始的公有社会，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所产生而又平等的服务于每一个人的。当然，这样的基础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一般的社会条件，而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中只有这些时期的人才具有完全一般的社会条件，我们从恩格斯的著作中就可以发现这样的内容。

“它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酋帅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亲纽带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基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是有组织的印第安人社会的基础。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印第安人具有那种受到普遍承认的强烈的独立感和自尊心。”到发现美洲的时候，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是按照母权制组成氏族。仅在某几个部落如达科塔人的部落，氏族已然衰落；在另外几个部落中间，如在奥季布瓦，奥马哈等部落中间，氏族已经是按照父权制组成了。

.....

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威胁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多得多，——家庭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

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户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当易洛魁人在1651年左右征服伊利部落和“中立民族”的时候，他们曾建议这两个部落作为完全的平等的成员加入他们的联盟；只是在被征服者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才被驱逐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凡与未被腐蚀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

不久以前，我们在非洲看到了这种勇敢的例证。祖鲁卡菲尔人在数年前，也像努比亚人在数月前一样，——两者都是至今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到的事情。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步兵——在密集队形战斗上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后装枪的弹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尽管在武器上非常悬殊，尽管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服兵役，也不知道什么是操练。英国人诉苦说，卡菲尔人比马走得还快，一昼夜比马走得还远，这就可以证明这种野蛮人的能力和毅力。“他们的最小的一条筋都暴栗起来，坚硬如钢，像鞭条一样。”——一位英国的画家这样说。

在没有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以前，人类和人类社会就是如此。要是我们把他们的状况和现代绝大多数文明人的状况作一比较，那么就可以看出，在今日的无产者和小农同古代自由的氏族成员之间，差距是巨大的。

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它没有超出部落的范围；部落联盟的建立就已经标志着这种组织开始崩溃，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易洛魁人征服其他部落的企图也表明了这一点。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只是到后来，才因物质利益的影响而缓和一些。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展，因而广大地区内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他异己地对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这个时代的人们，虽然使人感到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差别，他们都仍依存于——用马克思的话说——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权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使人感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退化，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因此，阶级社会以前的古代人类是没有我们今天的这种民主和集中的，他们也不需要这种民主和集中。他们的那种全体相等的个人权利和与生俱来的共同的社会财富是同今天的阶级对立下的社会权利、财富分配之间所根本不同的。因此如果有人把这两种情况等同起来那就犯了很大的错误，因此我们倾向于把古代非阶级社会的那种社会权利排除在今天意义上民主和集中之外。所以如果我们要谈一般的民主和集中，就首先应该把古代的那种根本不同的情况排除出去，而只是谈阶级社会下的一般的民主和集中。

相对于列宁所提出的民主集中制要求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问题和无产阶级运动的需要而言的，他要求进一步解决党内的分裂现象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组织性问题；而古代雅典的奴隶制共和国的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民众法庭等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就把雅典的奴隶主阶级通过民主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的集中了起来，这个集中包括这个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而民主又要表达每个奴隶主的意见、最后通过投票决定，因此民主和集中在阶级社会首先表现为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当然我们在这里还不是要专门的谈民主集中制的阶级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而是要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引出一般的集中和民主。

虽然这两种情况涉及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具体情况，但就一般的而言，集中是要求统一一定范围内不同单位的活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组织、思想等等。而民主则是要求一定范围内（这种范围是阶级社会所造成的各种范围的群体）不同的个体表达自身的社会观点和社会需求。集中成为了民主的结果、目的，民主为集中提供材料和选择；另外一方面，集中也为民主所服务，集中所统一起来的内容总是要为一定范围内的群体所服务，也就是参与这个范围的民主的群体。从这两方面的联系来看，民主和集中总是相互依赖的，提供了使对方存在的条件。

有人可能会拿独裁作为反驳这种相互依赖观点的证据，但独裁恰恰证明了民主和集中相互依赖的观点，如果我们设想彻底的、纯粹的独裁的情况，那么就会发现它根本不需要集中，在这情况下进行独裁的单位不需要集中他人的观点、活动，也不需要为他人的利益所服务，所以也就不需要任何程度、形式和范围的民主。所以这种纯粹的独裁不属于民主集中的范畴，也就同样不可能属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但另外一方面，现实历史中还不存在这样彻底的和纯粹的独裁，因为独裁个人虽然和本阶级其他单位有尖锐的矛盾，但他总是需要照顾一定阶级的利益、代表一定阶级和一定的生产关系，所以他又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集中（也就是阶级的集中），以及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的民主（阶级的民主），过去中国的封建帝王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他也要照顾其他地主阶级的利益，赋予这些阶级各种形式的权利。而现在一般谈论的独裁现象是比较缺乏民主集中的现象（而不是完全没有），纯粹的独裁目前还是不存在的（它也不可能实现）。

所以集中和民主要么一同存在、要么一同不存在。没有了集中，民主就变成了没有目的和结果的东西；没有民主，集中就成了没有根基的东西。民主集中反应了这样一个人类活动的过程：一定范围内的一定单位为了满足共同的自身需求而把彼此的活动统一了起来。那么民主的一般含义只是反映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社会范围内的不同单位的活动及其需求，而集中则是把这种活动和需求一定的统一了起来，对于这两方面来说自然都会有程度上和形式上各不相同的无数情况。

b. 民主和集中的矛盾

另外，民主和集中之间还存在着矛盾。首先是因为民主和集中代表着这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有着不同的特征，参与民主的单位要求集中为它的各种需求服务，而集中要求把参与民主的单位的活动统一起来。这两种特征之间就有着长期的、不能彻底解决的矛盾。集中要求把丰富的民主单位化解为一般的和统一的；而民主在集中中始终得不到彻底的满足但又始终

只能通过集中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因为每一个单位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所以它必须借助其他和他相同的单位的力量来满足自己，为了利用大家的力量来使彼此共同受益，它们就只能通过集中使彼此的活动统一起来。

因为人类活动和需求丰富产生了无数种可能存在的利益需求，就有无数种活动的可能。而各不相同的特殊利益是没有条件促进不同单位进行集中的。只有共同的利益才有条件使不同单位的活动统一起来，只有通过一般的利益才能得到集中，集中也只能满足一般的利益，在阶级社会下则主要是阶级利益。同时，一般的利益也只是不同单位的部分利益。因此，民主需要用集中来满足自己的一般利益，而集中要求民主的特殊利益和个别利益服从于一般利益和共同利益，这就产生了一般和特殊之间、共同和个别之间始终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

而在现实中，民主和集中更是不同的工序，处于不同工序上的单位由于两方面的特征也就产生了新的矛盾。首先就是集中工作的个别工作的矛盾，集中工作要求各个个别工作服从于它，而个别工作要求集中工作满足与它。然后位于这不同分工的单位之间也就产生了各自的特殊利益的矛盾，集中工作的利益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在此工作上活动的单位的特殊利益结合起来，因此产生了新的利益和其他个别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曾是阶级矛盾的萌芽状态。

c. 阶级民主和阶级集中

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进行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过渡平行地发生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 [Volk] 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狄乌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还不存在人民大会的地方，也出现了人民大会。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继续发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其所以称为“军事”，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功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比劳动获得更容易甚至更光荣。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深壕宽堑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实行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他们最初是耐心等待，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挣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裂成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马克思语），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活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

民主和集中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产物之一，它是伴随着人类活动之间的根本对立而产生的。最早的掠夺者把古代的机关变为他们特殊利益服务的机关、把古代社会中还相同的社会权利变为互相对抗的权利，这种情况下掠夺者们不依靠专政是维持不下去，专政是对付其他群体的，民主和集中是针对掠夺者们自己的。随着私有制、单偶制、阶级对立的出现，人类活动越来越多的产生特殊利益，而这些特殊利益和一般利益之间有着根本的矛盾，对于最早的统治阶级来说则还有个别的、特殊的私人利益和整体的私人利益的矛盾，民主集中使他们构成一个统一的阶级，使它们不同的个别利益统一为一般的利益（即统一的阶级利益），使他们和其他不同一般利益的成员所对立起来，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不同阶级利益的对立、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对立、专偶制家庭与整个氏族的对立。民主和集中在这个时候才有了产生的条件，所以也只有存在特殊利益或私人利益的社会条件下会产生民主集中，也只有存在者完全不相同的一般利益的地方才会需要民主集中。而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期，即使是不同分工的人类劳动也是不会产生不同特殊利益的，一切不同形式的利益都由于公有制、群婚制、人人平等的社会权利等因素而全部的统一了起来，要求这些利益无本质差别的为每一个成员的所有需求服务。

只有私有制蓬勃发展的社会，人类的才成为了主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活动，私人利益也使彼此的活动对立了起来，也就产生了以破坏对方活动为自身利益的人类活动。人类分化的最彻底形式就是阶级分化，在阶级分化产生前，人类一切的特殊活动所产生的特殊利益还只是促进阶级分化产生的程度，而在阶级分化产生后，人类的一切生产、一切活动都开始成为了服务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活动。民主和集中也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也不得不成为了为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活动。

因此，在阶级社会，民主集中首先就具有阶级性质。而每个阶级的利益又是根本不同的，一些阶级之间存在着完全敌对的阶级利益，这些阶级之间的一般利益是完全的不同，比如奴隶和奴隶主、地主和农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这样根本对立的阶级之间形成共同的民主集中是不能想象的，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一定的民主集中只能有着一定共同利益的阶级之间或单个阶级之内产生，任何不同的一般利益都会导致和民主集中之间产生根本的矛盾，民主集中不允许互相对立的阶级进行调和，而对于不根本对立的阶级之间只允许进行一定程度内的调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一般利益（阶级利益是这种利益的最重要和主要的形式）决定着不同单位之间的民主集中所能达到的程度和所能产生的形式。

就如同“自由”的情况一般，在阶级社会，总是一些阶级自由另一些阶级不自由，一些阶级的自由恰恰是通过造成另一些阶级的不自由来达到的。民主集中也是这样，一定的阶级的民主集中总是为了一定阶级的一般利益，而这种民主集中总是和另一些阶级的一般利益所相互矛盾的，总是和另一种民主集中相矛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的高度发展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利益遭到更彻底的破坏，中国今天的人大制度是完全和中国的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这里面可以代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私人垄断资产阶级、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知识分子的利益，其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居于核心，但唯独最缺乏中国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的声音。这种民主集中恰恰意味着针对无产阶级

的反动联盟的成熟，这里的一般性完全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般性利益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的建立恰恰也需要通过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一般利益所对立起来。

所以从本质来论，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主集中一开始就有它的阶级性。民主集中首先要满足一定阶级的一般利益。民主和集中在不同阶级之间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无产阶级的民主是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也是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集中的。无产阶级的集中首要要求集中能代表无产阶级一般利益的需求和活动，无产阶级民主也要求实现着自身阶级的各种利益。因此就一定阶级的民主来说，他的民主集中就不能集中与它阶级利益相对立的东西，那只会破坏他们的存在，民主要求集中实现自身阶级的各种利益。具体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就只能集中代表自身阶级利益的、集中正确和革命的因素，以一般的阶级利益、革命的利益来统一自己的活动，反动和落后的东西都是破坏他们民主集中的行为。

对于任何阶级来说，民主集中都是要集中正确的内容、集中对这个阶级有利的观点、活动、路线等等。并且对于不同的阶级来说，民主集中对他们也会有着不同的程度和形式的范围限制。因为民主集中只是代表一般的利益，而在私有利益越多、特殊利益越多、特殊活动越多的阶级民主集中就越难彻底的实现，这些特殊的因素和他们的一般因素相矛盾。帝国主义高度发达的时期也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矛盾最深刻的时期，也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最深刻的时期，私有利益使这些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产生了根本的矛盾，私有利益虽然是这些阶级的一般利益和主要利益，但私有利益之间本就是相互对立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矛盾发展为了根本敌对的矛盾冲突（自然这种矛盾是小于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的），对于他们来说民主集中是永不能彻底阶级的矛盾。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个阶级是一无所有的阶级，这个阶级之间的内部差异是最小的，这个阶级靠出卖劳动为生，靠一般活动为生，他的阶级利益也就是一般的公有利益，这种利益要求彼此之间彻底的集中和统一，这个阶级的一般利益恰恰要求消灭私有制、消灭特殊利益和阶级对立等等造成自身阶级利益受害和人类分化的一切现象。这个掌握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阶级至今仍一无所有，他们必然要求彻底的解放自己，因此只有这个阶级能达到最彻底的民主集中，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在未来彻底的消灭民主集中而把人类和人类的活动重新统一起来（即共产主义社会）。

d. 民主集中的范畴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古代雅典的奴隶制共和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议会，还是其他解决的民主集中。在这些地方，民主集中在这里基本表现为政治的，它普遍反应一定阶级的各种社会需求，并把这些需求统一为一定的社会活动，集中的反应一定阶级的一般需求。这种需求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抽象，但民主集中本身并不是政治、经济、文化，它是一种工具，它要求把一定群体的一切社会活动的一般化，因此，民主集中的作用主要是上层建筑的，而且是一定的阶级或者说一定的集团的上层建筑。因此民主集中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二. 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特征

我们已经在最开始谈过，民主集中制的提法最早源于1905年的列宁。而此时的俄国社会已经处于革命运动的一个高潮，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各阶级都充分的活动的起来，产生了许多社会运动乃至起义。但此时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也导致了俄国工人阶级在这一时期因运动的无组织、无计划性而遭到了重大失败乃至后来一段时间内陷入了革命的低谷时期。此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还存在着种种分裂的现象，虽然由于此前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普遍认可下和代表会议上使这个党已经产生了，但对于党的许多问题和工作上各组织代表之间还有着巨大的分歧，分裂为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大重要派别，该党在实际工作和组织上的统一还远远不足，两派之间几乎是各自为政，甚至到后来彻底的对立。列宁在此时期对于民主集中的问题作过许多内容，我们认为比较重要和能够比较完整展现这一时期关于民主集中制内容的是在《《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一文中列宁对于合并组织问题的提法：

我们要再一次重申我们认为实行合并所必须承认的基本的组织原则：

(1) 少数服从多数（不要同带引号的少数和多数混淆起来！这里说的是党的一般组织原则，而不是“少数派”和“多数派”的合并，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抽象地说，可以设想合并将采取“少数派”和“多数派”处于均势的形式，但是如果不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义务，那么这种合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2) 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大会，即一切享有全权的组织的代表的会议，这些代表作出的决定应当是最后的决定（这是民主代表制度的原则，它同协商会议的原则和把会议决定交付各组织表决即举行“全民投票”的原则是相反的）。

(3) 党的中央机关（或党的各个中央机关）的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必须在代表大会上进行。不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选举、二级选举等等都是不许可的。

(4) 党的一切出版物，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绝对服从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出版物不得存在。

(5) 对党员资格的概念必须作出极其明确的规定。

(6) 对党内任何少数人的权利同样应在党章中作出明确的规定。

-列宁《《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

在当时的情景下，列宁同志提出的这些组织原则都是直指问题的核心，他要求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发挥代表大会的最高机关作用、直接选举的中央机关、中央和地方以及党的一切出版物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明确党员资格、明确规定少数人权利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直接要求消除党各级组织上、工作上的分散状态，也是要求所有党内的特殊利益都服从于党的一般利益，后来一般利益也被列宁成为了党性。而全面加强民主制度和集中程度的要求在当时却和孟什维克等少数派的利益相矛盾，所以他们后来不仅拒绝进一步集中，也拒绝直接民主选举的要求，他们用“从下面来的拳头”的提法来歪曲工人们对党内的统一集中和直接民主的要求。这是因为孟什维克的利益逐渐的离开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党的一般利益，他们要保证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他们既不要布尔什维克的集中，不愿让自己服从于集体的一般要求来活动，也不敢进行更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因为这两方面的需求都是和他们的特殊利益相矛盾的，他们做不到放弃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彻底的走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

就这里的内容而言也还有很多地方值得谈论。其中的第五条和第六条就是要求进一步的明确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对象及其特殊利益的范围，这就也证明了我们上面所谈及的民主和集中的范围问题。一定的民主集中制也是要有具体的范围的，它需要明确他的参与对象，也需要限定参与对象的特殊利益，使这些利益服从于一般利益。而第一条到第四条则是具体的行动原

则和要求，反映了这个民主集中制的具体程度，它要把这个范围内的个体的一切政治观点、组织活动、刊物都服从共同的需求。列宁同志的这些内容非常鲜明的服务于当时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需要，也开创性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学说。

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相关具体内容的地方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

第二章 党的建设

第十二条 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第十三条 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

党部之执行机关概以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上级机关批准为原则；但特殊情形之下，上级机关得指定之。

第十四条 地方党部对于地方部分的问题有自行解决的权利。

第十五条 各级党部最高的机关为：全体党员大会及代表大会。

第十六条 全体党员大会及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委员会。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为该级党部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并指导党务及政策。

第十七条 党的组织系统为：

全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

省———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

市或县———市或县代表大会———市或县委员会

区———区代表大会———区委员会

生产单位———支部党员全体大会———支部干事会

第十八条 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的报告及提议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有所命令及指导均按照党的系统手续。

第十九条 为党的各种专门工作各级党部得设立各部管理之（如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等）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隶属于各级党部。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组织制度均须得中央之命令或同意。

第二十条 区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区委员会之批准与市或县委员会的追认；市或县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市或县委员会之批准；省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省委员会之批准；省委员会之组织须得中央委员会的批准。

各级党部之执行机关（自省委至支部干事会或书记）之选定及撤换须得上级机关之批准。

第三章 党的中央机关

第二十一条 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一次；中央认为必要时或有三分之一党员及三分之一省的党部之请求得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中央已经决定或三分之一的党员及三分之一省的党部请求之临时代表大会中央须在两个月内实现之。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之召集与大会之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须在大会前一个半月公布；全国代表大会须有代表全国党员之过半数方为合法，代表人数百分率由中央委员会规定之。

第二十二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工作为：

1. 讨论与批准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他中央各部工作的报告。
2. 审查与修改党纲及党章。
3. 决定一切重要问题政策的方针。
4. 改选中央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及其他等等。

.....

这里的内容已经具体了很多，从这里也可以我们看出来与列宁提法的一些差别。在选举问题上，此时的党对地方党组织的要求是：地方选举、上级机关批准、特殊情况上级指定；而最高机关选举问题上则允许有中央委员会固定召开、中央需求时请求召开或广大党员需求时召开三种情况。但这里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作用是和列宁的要求相似的。1905年列宁的要求中的最高的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各全权的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在1927年的中国是全国各地党员的代表构成，这自然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此时是由各不尽相同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合并而来的，而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党了。所以就民主集中制的特征来说，我们可以发现就民主方面而言，问题不在于参与集中的代表由怎样的组织形式或单位来构成，而在于这种集中是否能够代表所有参与单位的普遍的一般利益，这也取决于一般成员对集中的参与程度、影响程度最高能有多深，广泛的直接选举、直接的民主要求就最深刻的体现。而对于集中方面来说，问题也不在于参与集中的各种机关、组织、个人的不同单位形式，而在于是否能够让不同的参与单位服从于这种集中。因此，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完美结合便是民主集中制，其最完全的体现就是广泛的直接民主和最高程度的集中的结合，同时它也是最高程度的民主集中。

我们也可以看看毛主席论述：

十七年来，尤其是五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有在党内、八路军与新四军内继续坚持铁的纪律的必要。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过去，由于克服了张国焘一类破坏纪律的倾向，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的顺利执行。在今后，又必须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在这里，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

（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

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为此原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述那些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过去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一类，则利用一部分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所以纪律教育，不但在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监督党的领袖使之服从纪律，也有其必要。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为此原故，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

—毛泽东《论新阶段》
1938年10月

可以看到，“四个服从”已经非常鲜明的展现出了民主集中制的一般政治特征。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今天的特色也在讲“四个服从”，他们的党内民主集中制虽然也照搬了以前许多方法，但内容上和对无产阶级的意义上已经彻底不同了。所以这里的内容也还只是民主集中制的一般特征，而不包括阶级特征，“四个服从”还没有涉及阶级的内容。因此，我们就可以

发现，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利用这个方法的，就比如今天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就意味着有不同阶级的民主集中制。

所以在另一个情形下，毛泽东同志也曾谈到过民主集中制的部分问题：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民主集中制也有了新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民主集中制的阶级性要求得以加大，毛泽东同志非常关系此时民主集中制的阶级性问题，而阶级性的问题直接关乎民主集中制的性质。并且以上内容中也论述到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的部分内容，民主保证集中的性质，高度的阶级民主的基础下才能实施高度的集中。同样，民主集中制的阶级问题也和社会主义经济、阶级专政的问题直接联系着，如果不处理好这些问题，无产阶级的专政就会变为资产阶级的专政，甚至是法西斯式的专政。而这些内容在之前的革命时期还是没有提出来过的，只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有了这样的需要和实践经验后才被毛泽东同志提了出来，可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问题的学说也在进一步的发展，民主集中制在这一时期也要求成为最完成、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形式。同时，民主集中制也成为了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管理国家的制度和基本工具之一，苏联和中国都是在上层建筑实行了民主集中制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对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特征做这样的总结：

1. 民主集中制是最高程度和最后形式的民主集中。
2.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集中的最高形式，也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完美结合，其最完全的体现就是最广泛的直接民主和最高程度的集中的结合。

3. 民主集中制的一般政治内容的特征有这些重要部分：（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
4. 民主集中制有着深刻阶级性质，现实不存在一般的、无阶级性的民主集中制，这就可能会有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民主集中制。
5. 民主集中制和社会经济制度以及阶级专政的问题相联系，它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经济建设和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

那我们是不是只需要照搬这样的制度拿到我们今天来用就行了呢？不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的条件还是截然不同的，列宁同志在此的内容是面对俄国革命高潮时期党内的分裂现象所谈的，而我们在此引用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内容是党领导革命运动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分裂现象而谈的。我们今天还在我国革命的初期，我国的革命分子本就分裂各个极不成熟小组的，我国还不存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一切社会运动，而另一边还存在着统治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我们的条件还是非常有限的，广泛的实现民主集中制的条件还不存在。所以我们下文还要谈谈非广泛的民主集中制的情况。并且，我们还需要对于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关系问题同样加以阐述。

三. 阶级斗争、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的关系

a. 民主集中和阶级斗争

对于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的关系的问题，我们曾经在《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政治的区别》一文中涉及许多了，当时是谈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问题以及它和民主集中制的一些联系，现在看来有许多内容是可以同样用在此处的，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因此我们在这里要专门谈谈一般的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的关系。

就如我们本文前段中所谈到的，一定的民主集中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所服务，一定阶级的民主集中所代表的一般利益恰恰是和其他阶级的利益相矛盾的。也就是说，一个阶级不得不在对自己采取某种程度和形式的民主集中的时候又必须对与它相对立的阶级采取对立和斗争的方法来实现，这种对立和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便是阶级专政。一句话，如果离开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那么民主集中的一切内容都无法得到实现，民主集中就变成了空话。因此，这种民主集中的性质同时也是由它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的性质所决定。我们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也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是干脆把“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编者注]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是怎样变化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

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即奴隶主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么无论在选举权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细节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建筑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办报原则上，等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来对付穷人的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

.....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读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

-列宁《国家与革命》

对于一个阶级民主、对另一个阶级就要不民主；民主集中是一方面，阶级专政就是另外一方面，这就是民主集中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因此，民主集中和阶级专政的关系也是民主集中谁和专政谁的问题。一部分人享受一种民主集中，那么就必须对另一部分人进行相反的专政。民主集中和阶级专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矛盾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具体体现。

阶级专制和民主集中的对立统一就是上层建筑的两个方面，它们是一个阶级的主要政治工具。但这种工具是带有具体的阶级性的。这个工具对于任何阶级来说，都是一方面对内，一方面对外。任何阶级都是用这样的工具才能以自己的面貌和需求来改变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

b. 无产阶级对民主集中和阶级专政的作用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重视民主集中的重要性，具体来说是民主集中的阶级性的重要性。正如我们前文所引用的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的内容一样。在社会主义时期若没有高度的民主集中，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和保证无产阶级的专政。我们这里暂时只

谈阶级专政的方面的内容。虽然阶级斗争是民主集中的目的和主要内容，但民主集中同样也是决定着阶级斗争性质的重要基础之一（经济基础也是决定着阶级斗争性质的），阶级斗争和民主集中相互依存。没有足够的民主集中，阶级性质就得不到足够的统一，一般性（主要是阶级性的）活动也就达不到高度的统一，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阶级性就得不到保障。

阶级斗争和民主集中形成了一个互相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在私有制下的条件下时，民主集中是一个永不能彻底解决的矛盾、人类的活动由于私人利益永远得不到彻底的统一；而对于阶级斗争来说，私有制范畴内的阶级斗争也是永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矛盾，参与这种斗争的单位都争取取得永无止境的私人利益；而对于民主集中和阶级斗争之间的矛盾来说，则是由一系列的不同阶级相对抗的活动所构成的人类文明史。而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以他无私的特征和强大力量来结束这纠缠数千年的由私有的野蛮利益所书写的文明史。

但无产阶级却又是一个例外。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国家消亡”这个说法选得非常恰当，因为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千百万次地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根本没有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而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那么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列宁《国家与革命》

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过去的统治阶级在对其他阶级实施阶级专政的同时也对自身阶级采取各不相同的民主集中的程度和方式。而在这一切时期中都有统治阶级成员和代表自身阶级利益的国家专政机关相矛盾的现象，自然对于这种矛盾现象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对于依靠剥削利益的阶级来说，是这些阶级个人的私人利益和整个个阶级的集体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但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要消灭一切不民主的和剥削的现象。

通过文革的例子，我们也能发现，在这样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自己的国家机关也存在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发展得比过去那些剥削阶级和自身统治机关的矛盾还要激烈数十倍，这里的情况已经不同于以上那些阶级的情况。这是因为国家机关本身就代表着人类社会活动的分裂、对立和其他一切不平等现象的存在，无产阶级由于它的自身特征，它要求利用这种机关来消灭这种社会活动的分裂、对立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并且无产阶级也利用民主集中的办法来达到自身利益的不断统一。可是是要求用自己的一般的、无私的公有利益来不断的消灭一切特殊的利益和私人的利益，这就同时是在消灭阶级专政本身的需要，在这样的过程中阶级斗争不断的在失去自身存在的条件，而阶级斗争一旦消失，整个民主集中的内容也就随之消失，民主集中制本身也就溶解于远古般的人人平等和只存在一般利益（这里的一般利益已经不再是阶级利益，而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一般利益）的社会条件中了，对于那样社会的人来说，人的一切利益已经统一为一般的了，那就不需要再进行集中和民主了。可见，无产阶级在这样的过程中对于阶级专政可谓是既要掌握它、又要取缔它、消灭它，以至于完全消灭整个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和人类活动分裂、对立现象为止。

四. 革命运动早期的民主集中问题

我们在上面论述了民主集中的一般理论和谈论一些比较成熟的相关历史经验，但我们也得了解革命运动时期早期的民主集中问题，因为在那些阶段中民主集中制还是很不成熟或者是尚未出现的。

a. 采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直到1905年俄国革命运动时期，面对革命的高涨和合并的需要，民主集中制的完全框架才首次被列宁提出来的，而这个框架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比较成熟姿态要求实施高度的民主制和集中制。那么在其他情况下时我们应当怎样实施民主集中呢？

党的组织原则

鉴于：

- (1) 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
- (2) 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固然有困难，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实行的；
- (3) 把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公开机关混同起来，对于党是非常危险的，将会使党容易受到政府的破坏，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

- (1) 党组织的选举原则应该自下而上地贯彻执行；
- (2) 只有在无法克服的警察阻挠和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放弃这一原则，实行二级选举或者对选出的机构进行增补等等；
- (3) 迫切需要保持和加强党组织的秘密核心；
- (4) 为了举行各种公开的活动（出版、集会、结社、特别是工会等），应该成立专门行动组，但是这些部门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危害秘密支部的完整性；

(5) 党的中央机关应该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党的全体代表大会应该选出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指定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等等。

-列宁《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
1906年3月20日（4月2日）

1906年，面对沙皇政府的激烈镇压和革命运动的蓬勃需求，列宁在提出了实现民主集中制的要求的同时也考虑到了现实条件，认为虽然困难但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以及对代表大会提出了实现自下而上选举的原则，以及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放弃这个原则考量。可见，在面对特殊的情况下时，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和内容也就要受到限制，它不可能不考虑条件的随意发展和应用。

并且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此时列宁使根据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比较有力的党而整体存在以及现实条件来考虑运用民主集中制的情况。而在一般专制的条件下，当这种党还更为弱小，或者党组织的现实框架还基本不存在的时候，亦或者是更为弱小的革命组织的时候，运用民主集中的条件则会更差。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并不是要不分条件的采用全面的民主集中制。它必须要考虑现实条件来决定民主集中制的程度和方式。

并且我们也要注意，列宁在这里提出内容中谈到了秘密机关和公开机关两种党组织，这两种组织是不能够混淆起来的，对于这两种组织来说如何民主集中的问题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考虑民主集中制采用问题时还得考虑不同组织的条件。

b. 集中和集中制

除了以上的内容以外，如果我们再看看更早的内容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的不同情况。在这些情况中，民主制、民主集中制还并没有得到采用，或者说还没有采用的条件。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这样一种把秘密活动的一切线索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强有力的严守秘密的组织，这样一种必须集中化的组织，也许会过分轻易地举行过早的进攻，也许会轻率地使运动激化起来，而当时政治不满的增长以及工人阶级怒潮的高涨等等还没有达到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这样做的地步。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抽象地说，当然不能否认战斗组织可能会去作轻率的战斗，这可能会遭受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失败。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决不能只作抽象的推测，因为任何一次战斗抽象地说都有失败的可能性，而除了有组织地准备战斗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减少这种可能性。只要我们把问题提到现代俄国条件这个具体基点上，就会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正是为了使运动具有稳固性，防止轻率进攻的可能性，才绝对需要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而现在正是在缺乏这种组织的情况下，在革命运动迅速地自发增长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两个相反的极端（它们是应该“殊途同归”的）：一会儿是毫无根据的“经济主义”和稳健的说教，一会儿是同样毫无根据的“激发性的恐怖手段”，即企图“在虽然已发展和加强起来、但还近于开端而不近

于结局的运动中，人为地引起运动结束的征兆”（维·查·的文章，《曙光》第2-3期合刊第353页）。《工人事业》的例子表明，现在已经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屈从于这两个极端了。这种现象是不奇怪的，所以会有这种现象，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因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永远也不能使革命家感到满意，于是也就始终会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产生两个相反的极端。只有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定地实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并能满足所谓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

其次，有人还会反驳我们说：这种组织观点是同“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如果说前面那个责备是俄国的特殊产物，那么这个责备就带有国外的特点。只有国外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除向自己的编辑部发出其他指示外，还能发出下面这样的指示：

“组织原则。为了社会民主党的顺利发展和统一，必须强调、发展和维护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原则，这一点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在我们党内发现了反民主倾向。”（《两个代表大会》第18页）

关于《工人事业》究竟怎样同《火星报》的“反民主倾向”作斗争，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现在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经济派”所提出的这个“原则”。每一个大概都会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试问，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么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广泛原则”只不过是一句响亮的空话。不仅如此，这句空话还证明人们完全不了解目前组织方面的迫切任务。大家知道，在我们这里，在“广大的”革命者中间流行的那种不守秘密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已经看到波夫怎样痛苦地抱怨这一点，他完全正确地要求“严格地选择成员”（《工人事业》第6期第42页）。可是有一些以“对实际生活的敏感”自夸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的不是必须严守秘密和极其严格地（因而也就是比较狭隘地）选择成员，而是“广泛民主原则”！这真是胡说八道。

关于民主制的第二个标志即选举制，情况也并不见得好些。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章程第1条写道：“凡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既然整个政治舞台都公开摆在大家面前，就像戏剧舞台摆在观众面前一样，那么一个人承认不承认党纲，帮助党还是反对党，大家都可以从报纸上，从公众集会上看得出来。大家都知道，某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后来又经历过什么变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品质一般说来又是如何，因此，全体党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

把这种情况拿到我们专制制度的国家中来试试看吧！要所有“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来监督秘密革命家的一举一动，这在我国是否做得到呢？既然革命家为了工作，必须使“所有的人”中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怎么能要求所有的人来选举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呢？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工人事业》所讲的那些响亮词句的真正意义，就可以知道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种毫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永远保持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转移实际工作者的视线，使他们放弃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这种重大的迫切任务，而去拟定关于选举制度

的详细“纸上”章程。只有在国外，由于没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实际工作来做的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这种“民主制的儿戏”才能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各种小团体中间广泛流行。

-列宁《怎么办》
1901年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明显发现，在1901年的时候，在面对秘密组织和革命组织问题的时候，列宁同志完全否定了广泛的民主制，这一时期也还没有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但他把这一时期的秘密组织和革命组织的情况和当时可以公开存在和活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区分了出来。在当时俄国的专制条件下，必须需要一种组织来实现重要的革命工作，而这种组织只能是秘密的。同时，这种秘密组织是一种集中化的组织，是一种坚强的革命组织，他要严格的挑选自己的成员。而“广泛民主原则”，即公开性和选举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广泛民主制在这里则变成了非常有害的东西。

所以，列宁同志在提出民主集中制之前，在更早的革命运动时期争对不同条件而提出过相反的集中化的组织。这种组织为了适应于专制下的革命斗争的需要，需要严格的保守秘密来完成革命任务，而革命家在这样的组织中活动必须使得其他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这样的组织下难以实现广泛的民主制，并且那样的广泛的民主制也会成为有害的儿戏。

而对于集中制的提法，列宁则在1903年的会议争论上谈到过相关内容。

现在来谈自治问题。李伯尔同志说，联邦制是集中制，而自治是分权制。难道李伯尔同志以为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些六岁小孩，用这种诡辩就能哄住吗？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障碍，这难道不清楚吗？我们的中央将得到直接了解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利。如果有谁建议在崩得内部实行这样一种“集中制”，使崩得的中央委员会不通过科夫诺委员会就不能和所有的科夫诺小组和同志取得联系，那么崩得分子只会一笑置之。现在再顺便谈谈委员会。李伯尔同志激昂慷慨地大声说道：“既然崩得是服从于一个中央的组织，那还要谈论崩得的自治干什么？你们总不会让某个图拉委员会实行自治吧？”李伯尔同志，您说错了：我们毫不动摇地一定也要让“某个”图拉委员会实行自治，实行不受中央的琐碎干预的自治，当然，仍然有服从中央的义务。“琐碎的干预”这个说法，我是从崩得的传单《自治还是联邦制？》中借用来的。崩得提出这种不受“琐碎的干预”的自由作为一项条件，作为对党的一项要求。提出这种可笑的要求本身就表明，崩得在所争论的问题上有多么糊涂。难道崩得竟认为，党会容许一个对党的任何组织或团体的事务进行“琐碎的”干预的中央存在下去吗？难道这实际上不正是代表大会上已经谈到的那种“组织上的不信任”吗？崩得分子的一切建议和一切议论中都流露了这种不信任。实际上，为争取完全的平等以至为争取承认民族自决权而斗争，不是我们全党的义务吗？因此，如果我们党的任何一部分没有履行这项义务，那么按照我们的原则，它必然要受到谴责，必然要由党的中央机关去纠正。如果明明完全有可能履行这个义务却故意不去履行，那就是背叛行为。

-列宁《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问题的发言》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

李伯尔和崩得用类似“联邦制是集中制，而自治是分权制”的提法，用把民族问题中自治和联邦的内容混淆进党的组织问题中的诡辩方法来维护自己在组织上的分权要求，也表现了他们组织上的不信任。而列宁驳斥了他们的内容，明确了集中制的内容和重要性：“集中制要

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壁障。我们的中央将得到直接了解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利。”

可见集中制是一种特殊的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适用于专制条件下的革命组织，适用于秘密组织等等情况，这种制度完全反对广泛的民主制。这种制度要求所有单位按照集体的要求来进行集中，并且减少不必要的民主方法，或者把民主的方法限制到一定的范围内。而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斗争的需要，它又要提高组织集中的程度，使组织之间不存在壁障，使得中央了解每一个单位情况。

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说，许多组织都还不存在广泛的实施民主制的条件，这是因为积极的革命分子的缺乏和成员质量差异较大的缘故，我国目前还没有职业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把不同情况的群体区分出来。因此考虑到专制的条件和秘密的革命组织的需求，很多时候需要让最具有革命素养的同志把重要的工作负责起来，形成稳固的和安全的核心。不能让相对落后的同志在组织工作、秘密保护、安全工作等方面拖了组织和其他进步同志的后腿，在法西斯专制时期，这只会对革命事业有害。所以我国革命分子在目前往往需要进行集中制，依靠少数同志的力量把各项工作带动起来，尤其是组织工作，然后进行培养新的同志的工作。

使先进的和积极的同志可以放开手脚去做，而如果组织氛围建设得好，落后同志要么被带动起来成为先进，要么认清自己的能力和素养，在合适自己的岗位工作或边缘化。这也是一个组织正常的新陈代谢。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抛弃落后同志，任何时候我们都是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落后同志，组织要多关心，帮助他解决思想或其他社会方面的问题，之后再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逐步改善他工作上的问题。

c. 集中制的基础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集中制并不是完全的排除了民主的因素，因为民主和集中是不可能做到彻底的互相排除的。我们如果看看列宁同志的其他内容就可以发现，集中制的基础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的民主因素。

我们要问问读者：“阿雷奥帕格”同“反民主倾向”有什么区别呢？很明显，《工人事业》的“体面的”组织原则恰恰是既很幼稚，又不体面。说它幼稚，是因为谁也不会听从“阿雷奥帕格”或者有“反民主倾向”的人，除非“周围同志们对他们的智慧、毅力和忠诚表示信任”。说它不体面，是因为这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段，利用一部分人爱慕虚荣，一部分人不熟悉我们运动的实际情况，一部分人缺乏修养和不熟悉革命运动的历史来投机取巧。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如果以为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就会使革命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

已久的相当普遍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偏离同志关系（要知道，“民主制”，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谴责。你们要是注意到这一切，那就会知道，这些关于“反民主倾向”的论调和决议散发出来的那种在国外玩弄领袖儿戏的气味，该是多么腐臭啊！

-列宁《怎么办》

可以看到，在集中的秘密组织的条件下，有一种东西比“民主制”还要重要，那就是同志之间的充分信任。这种信任在专制的条件下是无法被民主制来代替的。同时，民主制的也是同志关系概念的一部分，或者说同志关系本来就包含着民主的因素，也只有包含着民主因素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同志关系。而这种真正的同志关系就是集中制的根基。

这也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共产主义者要求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实现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共产主义者也应该是追求消灭人类一切剥削现象和剥削关系的人，他们之间互相关系必然首先是以此以上追求为基础的关系，这种关系在阶级社会下只能是民主集中的。而只有这种关系才能够代替在特殊时期代替民主制本身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有代表这些因素的活的人在特殊阶段能够比民主制本身更为重要。

可以说，在革命运动的特殊时期、在革命组织的早期阶段，它所执行的集中制虽然一方面强调了集中的重要性，而另外一方面也离不开一定的民主因素。自然，在这个过程中，集中是主要的，但包含着民主因素的同志关系也是不可以排除的。而也只有这种包含着民主因素的同志关系的存在，才能够保证不断发展的早期革命事业能够在日后长出民主集中制的果实。

五.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主集中问题

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三段中引用的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代表上的讲话一样，如果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阶级得不好，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式的专政。历史也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质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会变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并且问题不仅仅限于一般的民主集中制，在没有采用民主集中制度的革命组织、政党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z把问题提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切民主集中问题上来，看看问题是怎样运动的。

a. 民主集中的质变

1962年，作为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了“三自一包”的农村经济政策（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同样对于城市的经济政策他也提出了许多观点比如：“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太不发展”，“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达了几百年了，而我们才只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对于国内问题的主要矛盾判断他作了和今天的习近平相似的结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

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些观点毫无疑问是修正主义的观点，这些政策实施也等同于资本主义政策的实施。

同一时期，苏联的赫鲁晓夫也在苏联及国际上鼓吹：“全面国家”、“全民党”、“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平过渡论”等修正主义观点和政策。

对于以上内容，我们不过多解释这些内容为什么是修正主义的，这需要读者自行通过其他手段和学习来了解。我们要指出的重点是，这些观点是和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也是和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格格不入乃至根本冲突的，但是这些观点却在不同时期开始成为了原本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推行的政策，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来执行着反社会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当时，的确也是受到了党内许多人的认可，代表了一定的党员的意见。

除此之外以前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后都遭遇到了这样的现象。这表明着，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期内，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可能集中出反无产阶级利益的内容，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可能转变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

而当邓小平、叶剑英等修正主义分子得到华国锋的认可后，通过政变手段对其他无产阶级革命派及革命群众进行了“揭批查”和“清洗三种人”等等镇压、清洗政策，并在此之后进行了更彻底资本主义政策。可以发现，在这些情况下时，修正主义分子也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迅速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情况说明，民主集中一质变，无产阶级专政也要遭到质变，整个国家也就要遭到质变。

另外一方面，即使是处于革命时期，对于一般的革命组织和一般的尚未赢得革命胜利的革命党来说也有这样的风险。过去的第二国际就在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的影响下质变为了修正主义的国际，影响了一大批政党的质变；而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政党都遇到过与各种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这说明民主集中时刻都遭遇着代表其他阶级利益路线的威胁而有质变的风险，因此就有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

如果我们来看看最新鲜的例子和我们目前情况最贴切事实，那么斗争公社、东风和燎原的故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最近典型。比如在斗争公社的分离事件中，在大群的老管理和支持他的部分管理的配合下，他们迫害了清白的同志，并完全不考虑几十位同志的反对意见下做了同样迫害这部分同志的选择；而在东风事件中，大群老管理也歪曲了当事人的意见，并在通过他们对组织集中权力的掌握在各机关其他同志那完全污蔑和歪曲了东风的同志。在这两场事件中，自然可以看作是组织负责人革命素养低下、性质恶劣，以及组织给予普通成员的民主权利不足的象征，但同样可以看作燎原的民主集中的阶级性质已经变化，其专政的性质也已经变化。

当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朝着其他的方向集中之后，整个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就开始质变。这也类似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但已经不涉及单纯的经济，所以我们要用到另外的概念来和上层建筑对比起来。民主和集中，就它们统一起来后的内部关系而言，也可以看作是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运动，集中是上层建筑、民主是下层建筑。上层建筑在这里作为下层建筑一般性的集中表现或者作为整个下层建筑的一般性指导，它有着决定整个下层建筑运动方向的作用。但同样，下层建筑也在不断的影响上层建筑，为上层建筑的运动提供各种可能的依据和材料。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集中是要求把民主的统一为一般性的要求来进行一致的活动，而这个一般性主要是阶级性的。但有的时候，集中也有可能统一为其他的一般性，甚至是与本身阶级一般利益所直接相对立的那种一般的阶级性，这种过程不可谓不是鸠占鹊巢。当然造成这个结果的因素有多个方面，比如参与民主集中的阶级成分问题、社会经济基础的影响、理论和政策的错误、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等等。但我们不打算从这些方面来一一考察，因为这会偏离本文主旨，因此我们在下文主要考察民主集中本身的问题。

b. 民主集中里的矛盾和斗争途径

虽然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有质变的风险，但这个质变之中也有着深刻的矛盾和斗争。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在这里斗争只有两种表现形式，首先直接表现为一般性的矛盾和一般性的矛盾的斗争，这也是主要的斗争形式；然后是一般性的矛盾和特殊性的矛盾的斗争，但在阶级社会，任何的特殊性都不得带有一定的一般性，因此这也是以特殊性的形式来表现出的一定的一般性矛盾和直接的一般性矛盾之间的斗争，因此在民主集中中的斗争表现形式上就会这两种矛盾形式的斗争，而矛盾也只有直接的一般性矛盾和带有特殊性形式的一定的一般性矛盾两种。

历史已经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在运动着的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的过程中有这样两种对立的矛盾，各种民主需求有着至少两种一般性，这些一般性之间完全是互相矛盾的；而这种不同的民主需求反应在集中上的表现也是如此，集中也有着至少两种根本不同的一般性选择，不管集中为任何一种一般性都会和另外一种一般性的集中需求相矛盾，也就是阶级矛盾；并且不管是哪一种一般性的集中都会和另一种一般性的民主相矛盾。这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将会贯穿于民主集中运动的整个过程之中，在不同的民主需求之间有关于这种不同阶级性的民主的斗争，在集中之间有关于代表不同阶级性的集中之间的斗争，在集中和民主之间更是有着不同阶级性的民主和不同阶级性的集中之间的斗争。阶级矛盾在民主集中的运动过程中有着三种矛盾关系，因此就有着三种关于民主集中的阶级斗争的途径。

c. 共产主义运动中民主集中的多个阶段

而在民主集中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条件下和不同时时期中有着不同的程度和表现形式民主集中。比如在专制条件下和革命运动早期阶段的时期，革命组织主要需要集中制的，依靠发达的同志关系及同志之间的信任这种民主的萌芽再加上高度的集中来适应革命的考验并为下

一个阶段的民主集中的发展提供条件；而在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有力建立起来的时期，在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高度结合起来的时期，革命力量追求把民主集中大力的发展为民主集中制，但它还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采用民主集中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和无产阶级专制的性质，它更是要求全面的发展民主制和高度的集中制，使最广大的无产阶级能够最深刻的参与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使民主集中制尽可能的不要受限制；而在社会主义逐渐迈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民主集中在全面的发展的过程中自身也在不断的消亡，最后民主集中制只会随着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而溶解。

因此，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力量来说，民主集中至少有着这样四种阶段发展：

1. 早期的集中制
2. 受限制的民主集中制
3. 全面发展的民主集中制
4. 消亡中的民主集中制

六. 斗争对于民主集中的作用

在上面第五段的内容中，我们在论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主集中问题时已经发现许多种矛盾以及多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因此也就会有着各种各样的斗争。斗争的作用已经在前面的论述中逐步的被展现出来了，因此我们也要专门考察斗争在民主集中中的作用。

a. 斗争对于民主集中的性质作用

在世界历史上的一切共产主义运动中都会有关于运动性质、领导运动的组织的性质、关于国家的性质的斗争。而在这些大的斗争中，自然也有民主集中问题中的斗争。在民主集中的领域内，时刻存在着影响民主集中阶级性质的矛盾，这些矛盾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只有通过和这些矛盾展开斗争并取得一定的胜利才能够保证民主集中的一定性质。

比如针对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政策和要求、代表落后作风和习惯政策和要求、国际资本主义的渗透影响、错误的理论等等。过去有人在共产党内部提出过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三自一包，也有人为了屈服国际资本主义提出过三和一少的外交政策，也有人为了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落后的生活作风要求废除党的许多纪律，也有拒绝组织工作的合并要求保护分散主义和小手工利益的，还有人反对建设社会主义而提出唬人的对外不断革命的理论的。总之，在和这些要求之间，共产主义者要和这些错误进行斗争，如果不能战胜这些错误保证民主的无产阶级性质和集中的无产阶级性质，那么民主集中的无产阶级性就无法保障。

因此，斗争在民主集中的第一个作用和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保证民主集中的阶级性质，而阶级性质问题又是阶级社会最重要的社会问题，阶级的民主集中的性质一变化，阶级专政的性质也自然要变化。因此，这个问题在大的政治方面决定着一个社会的阶级性质，在小的政治方面决定着最微小的社会组织的性质。

b. 斗争对于民主集中的发展作用

除了上面所讲的作用以外。我们根据列宁在 1905 年要求合并组织内容的提法中、七千人会议毛主席强调全面的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的提法上、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民主集中的几个发展阶段所能看出，斗争还有着这样的作用：即推动无产阶级民主集中的发展。

在以上曾指出的情景下时，这种斗争也同样是一种阶级的斗争，但它不仅仅是关于保证民主集中性质的斗争，而也是要求发展民主集中的斗争。列宁早期依靠合格进步工人、职业革命家建立起了坚强的集中制的秘密革命组织；后来列宁又依靠布尔什维克和当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反分裂要求来和孟什维克的分散主义、反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对抗，依靠庞大的革命力量实现了初步的民主集中制；毛主席通过更广泛的发展工农群众，团结大多数人民群众进行斗争，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实现了更全面的民主集中制。

在这些过程中，可以看到这种斗争是争取民主集中发展的必要手段，这种斗争的胜利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斗争对于民主集中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推动阶级的民主集中的程度和形式的发展。并且，这种斗争也是要求阶级的一般性发展的斗争。

c. 斗争对于民主集中和专政关系的作用

民主集中是和阶级专政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是民主集中，那么对于另外一个阶级来说就一定是阶级专政。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民主集中和阶级专政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阶级斗争要求对于敌对阶级采取严厉的专政手段，而民主集中要求自身阶级要进行最充分的民主和最高度的集中；同样，敌对的阶级也会采取这样的方法和对立阶级进行斗争。这里就产生了民主集中和阶级专政的不可调和的第一个矛盾。关于这个矛盾的斗争就是不同阶级的民主集中需求与一定的专政之间的斗争，是争夺国家机关斗争，这种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

而在另外一方面，由于民主集中和阶级专政的关系也是民主集中谁和专政谁的问题，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民主集中谁和专政谁的矛盾。斗争在这里的作用也就是解决民主集中谁和专政谁的问题，这种斗争也是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这里的作用就是决定民主集中和阶级专政的总阶级性质。这种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通过相对隐蔽的或不激烈的形式来完成，比如苏联到中国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用各种不光彩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复辟目的。

七. 社会生产中的民主集中问题

我们以上的所有内容都是针对政治方面的活动而言的，在绝大多数时候，民主集中问题也主要是政治问题。我们上面的所有内容也是为了把政治方面对于民主集中的一些比较纠缠在一起观念区分开。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民主集中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的时期内也不得不和经济基础方面联系起来。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上层建筑必然要和经济基础发生关系，在实现了自己的阶级国家时，这种关系就越密切。对于民主集中的问题，在1901年列宁在《怎么办》里的地方，1905年列宁在对孟什维克的争辩中都是以政治的层面提出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比如在中国，它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特别密切，因此我们这里还要专门拿一个段落来说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及关系。

a. 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条件中不存在民主集中的空间

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是所有制关系的一个伟大变革，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同样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虽然随着所有制的变更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为此，需要简要地回顾一下社会生产中相互关系演变的历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赤裸裸的不平等关系。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这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关系是明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是完全通过商品关系即作为物和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平等的实质被平等的假象掩盖了。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纷纷著书立说，在物和物的关系上大做文章，企图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阶级对立实质，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这个旧案翻了过来，“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商品变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学中最难的问题就豁然开朗了。

-上海公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976，张春桥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小组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前的时期，准确来说是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之前的时期，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基于不平等的所有制而进行的。在奴隶制社会是奴隶主指挥奴隶进行生产劳动的关系，封建社会是地主主要通过利用土地关系来强迫农奴为他劳动的关系。资产阶级就是以商品关系，用看似平等的实则不平等的价值交换来雇佣无产阶级为他进行剩余劳动，这也是一种雇佣奴隶的关系。

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劳动者来说完全不存在民主集中，只有以各种形式和程度上被统治阶级奴役来进行劳动的可能。因此在经济领域特别是一般劳动领域里，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是不可能用民主集中来改变劳动情况的。马克思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来形容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整体体现为生产的盲目性和无计划性，这是因为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资本家为追求私人利润，完全根据市场价格的涨落、利润的高低而缩小或扩大生产规模，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生产失调现象以及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同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家也会在生产领域无法无天的剥削、压迫劳动者。对于资本家来说，只有狠狠的剥削工人，利用

不平等的相互关系才能够获取利润、才有条件和竞争对手进行竞争。对于工人之间的关系来说，在资本主义下也变成互相竞争的关系，市场经济使工人的劳动变成了互相竞争的商品之一，产业后备军越庞大，工人的劳动力就越廉价、工人就越贫困和失业严重。

b. 社会主义所有制下民主集中

而到了在社会主义时期，情况已经根本不同了。中国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上层建筑作用领导全国劳动人民要求对整个国家的所有制进行改造。在这些地方党内的民主集中就表现为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它对经济基础的改造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官僚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极端反动的统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官僚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针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毛主席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就明确规定了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的政策。

官僚资本在旧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本中占到百分之八十。没收了官僚资本，变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把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并且给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为改造中小资本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中小资本在旧中国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本中虽然只占百分之二十，但为数众多，范围很广，遍及各个角落。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必须在没收大资本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对中小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我国是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实现对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只表现在接私股份取得固定的股息上，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已完全属于国家和全体劳动人民。国家可以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合营企业进行统一的经济改组，如合并、转业等。所以，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实现，标志着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在国家规定的支付给资本家的定息年限已满，并且停止支付定息的时候，公私合营企业就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用赎买的办法，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来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它有利于分化资产阶级，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且避免因所有制的变革而可能出现的生产混乱和中断现象，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但这决不是说可以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其实，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为头子的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刘少奇一伙在全国解放前夕，竭力制造资产阶级“剥削有功”的反革命舆论，叫嚷要“让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几十年”。“可以和国营企业并行发展”。猖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正确方针。在这一斗争中。刘少奇一伙党内资产阶级充当了党外资产阶级的靠山。我国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粉碎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反抗，在一九五六年取得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

-上海公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比如在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得到发展，比如《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文件中，就要求把小型的生产合作社发展为大型的人民公社。在这一时期，也推动了农村的所有制进一步改变。但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党内同时也有相反的力量，比如刘少奇就阻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进步，他多次妨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贯彻政策，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就代表着资产阶级的一般性来和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内的共产主义的一般性作斗争，反应在对经济基础关系的方面表现就是提出了反动的经济路线。

同时由于所有制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条件。

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建立，意味着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同资产阶级、地主、富农之间在旧社会里那种被统治和统治的关系，颠倒过来了。这种颠倒，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是一种经济上的强制力量，它使剥削阶级丧失了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迫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他们的统治和改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则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主人。劳动人民之间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新型的相互支援、共同协作的革命同志关系开始诞生了。

-上海公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首先就废除了私有制时期的那种传统的剥削的关系，使得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得到了改变，并有了进一步改变的基本条件。因此，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就有了改变生产领域中的关系的可能，因为生产领域中的劳动者已经成为了国家的统治阶级。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已经彻底解决了生产领域中的问题，或者已经完全就消灭了不平等和剥削现象。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存在着两种形式，还存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还存在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劳动者在相互交换劳动的过程中，通行的仍然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这些经济条件决定了，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劳动者之间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他们之间的革命同志关系，有一个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完善的。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他们必然要破坏和腐蚀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使之变为资本主义相互关系。因此，新型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是逐步限制和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反对并最终地战胜资产阶级包括党内资产阶级的过程。

.....

党内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同其他剥削阶级一样，也要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至于无偿地占有他人劳动的方式，则依各种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不过是分享垄断资产阶级的残羹剩汁，因而只能作为后者的附庸出现。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党内资产阶级则已成为全国物质财富的占有者，囊括工农创造的一切剩余价值，并且在这个阶级内部论功行赏、坐地分赃。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党内资产阶级还不是全国物质财富的占有者，他们一般是在商品制度这块土壤上，发挥着孵化新的资产阶级的功能，通过扩大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占有大量社会产品，并且采取各种隐蔽的手段，对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纯收入进行再分配，攫取他们能够攫取的一个份额，并且把这一部分转化为剩余价值。党内

资产阶级原来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对于占有社会财富表现得特别贪婪，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特别迷恋。他们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这是这个行将灭亡的阶级的经济特征。

-上海公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可见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还存在着商品交换、商品制度、按劳分配等资本主义法权的影响，各种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还残留在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之中。这些因素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会要求革命这一方面的资本主义因素，在党内关于这些地方的集中问题上，也存在着民主集中制内部的阶级斗争。

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也谈到，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关系的基本特点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和共产主义因素相矛盾、相斗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主集中便是有利于共产主义因素来和资本主义因素进行斗争的重要方法，但这并不说民主集中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关系或相互关系了。民主集中主要而言是上层建筑而非经济基础，虽然在社会主义时期作为劳动者本身也可以开始利用这样的方法来改变生产关系了，这其实是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时期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更广泛的结合和界限的缩减，因为劳动者本身就是统治阶级，也可以利用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的办法来改变生产关系。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身却又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或阶段，比如我们知道包含着按劳分配因素的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前提下也算作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只是它的阶段还较为低级，资本主义因素还较多。而要从作为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开始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阶段中，生产关系必然要经历多次的变化。

c. 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所反应出的问题

我们只需要看看历史上的经验就会发现好几种不同的情况。

两年来我们已经有了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建设的经验。因此，可以而且应当认真提出共产主义劳动问题，确切些说，不是共产主义劳动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劳动问题，因为这里指的是从资本主义中生长出来的新社会制度的低级发展阶段即初级发展阶段，而不是高级发展阶段。

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些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讲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按照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按照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需要。

大家都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还远远不能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

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由整个先进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工会）和国家政权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是在这条路上前进了一步。

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

另一方面，“大事业”成功之后，即推翻资本家所有制并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的国家变革实现之后，要在新基础上建设经济生活，也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

星期六义务劳动、劳动军、劳动义务制——这就是具体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和共产主义劳动的各种方式。

在具体实行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的缺点。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

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失望或者张皇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建立新的劳动纪律，建立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新形式，创立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新方式和新方法——这是一项需要许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

这是最能收效最崇高的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推翻了资产阶级，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抗，为自己争取到了使这种工作有可能进行的基地。

我们一定用全副精力来进行这一工作。有韧性，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修正，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些品质是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前经过10年、15年以至20年的磨炼才得到的，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在两年中历尽空前未有的穷困、饥饿、破坏和苦难，使这些品质受到了进一步磨炼。无产阶级的这些品质就是无产阶级一定胜利的保证。

-列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
1920年4月8日

在这一时期，列宁同志提出了改造社会联系和吸引人民参加劳动的方式和方法的长期方向、但另外一方面，列宁同志在另一方面又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开始采取了一长制、委任制等方法。当然，这是服务于当时国内的困难和针对战争局面所考虑的。

这一时期，列宁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批驳了那种认为集体管理是工人管理，个人管理不是工人管理的错误看法，指出一切问题的解决应当服从生产的利益。同时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要用一长制取代集体管理制的问题。他批驳了反对派提出的一长制同苏维埃民主制相抵触的错误论点，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不是由管理生产的原则，而是由所有制的形式来决定的。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政治制度是民主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管理上不要权威，不要责任制。一长制只是组织和领导生产的一种具体管理制度。他说：“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同个人管理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

可以说列宁在特殊时期采用的一长制而在后来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使得在当时有益的制度变成了后来使苏联源源不断的在经济各领域诞生新兴资产阶级的制度。

苏修叛徒集团使社会主义相互关系蜕变为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大力推行修正主义的“一长制”。按照他们的“一长制”。厂长是企业的全权领导者、工人只有服从厂长命令的义务。根本无权过问企业怎样管理的问题。赫鲁晓夫公开宣称在企业管理方面“向资本家的好榜样学一学、这并不算什么过错”。（关于苏共党纲的报告“苏修御用经济学家则说这种“一长制”渊源于大机器工业的性质、取决于生产必须严格保持一定的协调。这就是说，只要是大机器工业，就非实行“一长制”不可。这是地地道道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企业管理性质的修正主义谬论。诚然。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建立集中统一的指挥系统，以便协调企业内外、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集中统一的权力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那就取决于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集中统一指挥的职能，同资本的职能结合在一起，企业的权力，集中掌握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手里，表现为资本对劳动力的反动专横统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集中统一指挥的职能，同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结合在一起，企业的权力，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手里，才能保证企业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苏修叛徒集团鼓吹、推行修正主义的“一长制”，就是要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的独断专行来保障官僚垄断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来压迫和剥削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从根本上剥夺工人群众掌握企业的权力。

-上海公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而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革命者有了更深刻、更系统的认识，并且把生产关系的问题解决得更好了一些。

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前进和倒退，是同能否正确处理人们的相互关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人们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限制，那末，共产主义因素就会大大发扬，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比较有保证，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比较巩固，分配关系也会趋向完善。反之，如果强化和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让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雇佣关系和竞争关系泛滥起来，工人群众的主人地位和革命积极性就会受到压抑；一部份群众的思想就会被腐蚀，资产阶级腐朽庸俗的思想作风，就必然会在人们中间滋长起来；干部和群众、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的新型关系就会变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对立的阶级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会受到损害，甚至蜕化变质；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也会在保留“按劳分配”的外壳下，变成一小撮特权阶层占有广大工人、农民劳动成果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

.....

不断调整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逐步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在一个企业内部，还是在各个企业、各个经济部门之间以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都必然要直接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因素——劳动者。因此，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利于充分调动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经济部门的力量，有利于充分利用和挖掘经济潜力，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无数事例证明，不解决相互关系问题，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中，朝着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同志关系逐步前进的时候，企业的生产就蒸蒸日上，当这种相互关系遭到破坏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企业内部人们的相互关系，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是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是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根本途径。“鞍钢宪法”是企业内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根本大法，也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基本纲领。

-上海公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可以看到，在生产关系方面，在相互关系方面，苏联一开始由于条件限制和革命环境需要考虑采用了一长制，这个制度在早期为苏联革命提供了助力，但另外一方面这个制度有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因素，推动了一大批新兴资产阶级在苏联产生。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需要不断的革命，不断的消灭资本主义因素以往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否则资本主义的因素就会积累更强大的力量进行复辟。

中国用“鞍钢宪法”取代了苏联的一长制，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生产关系恰恰是通过全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更充分发展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来发动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方式达到的。也就是毛主席曾在七千人大会所说的：“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知道，在上海的公社运动中，上海工人阶级的联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独立的民主集中制来和中央的修正主义对抗，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全面的在上海实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革命。对于文革时期各地革命派来说也是如此，关于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和阶级专政的斗争贯彻了中国各个地区的各个社会领域。因此，民主集中在社会主义时期成为无产阶级可以更充分利用的上层建筑 and 重要斗争工具，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也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关系。经济基础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增加，就会导致民主集中里有更多的资本主义力量来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对抗，要求争取代表自己利益的民主集中；而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民主集中同时也会照顾自己的经济基础，不断的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改变为适应自己的一般性的阶级需要的。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文化大革命在各地表现不同，革命派取得胜利的地方很少，中国当时在许多地区还没有能够真正落实这种制度，并且社会上还有其他许多方面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鞍钢宪法因此还不能算共产主义运动在生产关系方面革命的全部内容，只能算进一步推动革命的又一步。未来的革命者还需要更多的进步。

八. 剥削者的民主集中问题

除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问题以外，我们这里也简要谈谈其他阶级的民主集中问题，受限于材料我们只是指出他们的民主集中大致特点就行了。

根据上文我们已经得知，民主集中一种上层建筑，它和阶级专政相联系，它也主要是一个阶级的内部的问题，并且它经济基础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而在其他阶级那里，由于他们的一般利益是私人利益，这种特殊的利益导致他们无法把民主集中发展到像无产阶级那样的程度。因为如果把私人利益当作一般的阶级利益，那么这种一般的私人利益同时又和各个私人自身的私人利益相矛盾，这就导致这些阶级的民主集中始终是一种自私自利和另一种自私自利的斗争，也就是短期、片面的自私自利和长期、全面的自私自利的矛盾。由于私有制和私人利益的缘故，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整体团结是不可能的，他们必然要以私人利益划分为各种不同的集团进行斗争，国际上以民族为划分，国内以各种垄断集团为划分。并且由于私人盈利方式、方法的不同，在其内部还会发展各个有着特殊私人利益的不同阶层，彼此产生利益矛盾。从这一方面来看，管理垄断资产阶级的确算得上是目前资产阶级的最高发展阶段，因为他们放弃了一般形式的私人所有制，首先采取阶级占有（即国有制等）然后采取各种方法进行分配，也包括各种私人方法等，因此只有这种特殊的资产阶级能够发展出某种程度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集中的最高阶段，标着一个阶级的高度团结。古代的奴隶主、地主也有某种程度的民主集中，但远远达不到民主集中制的高度。

另外一方面民主集中也受到一个阶级所依赖的那种生产关系所影响，奴隶制依赖奴役奴隶、因此多采取奴隶主之间的民主集中，有奴隶王朝和共和制等形式，但这都受限于较小的生产范围内，这是因为奴隶制的生产范围也是狭小的，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进行小生产，又极不发展生产工具，劳动成果有奴隶主占有，劳动目的又多为奴隶主的日常消费和奴隶制国家的各种需求，奴隶主之间势力对比的主要方法就是奴役劳动力的数量，因此总是大奴隶主最有话语权。而在封建社会，则是使农民依附于土地进行小生产的生产关系，自然经济是这个时期的社会主流，民主集中反大地主之间的不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需求，因此封建阶级内部也往往依赖血缘、等级方法来区分地位，并用地位差距来决定集中权利，即使是在实现了科举制的中国，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而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期，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他们已经不需要直接奴役人口或者使农民依附在土地上，资本主义生产依赖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大大的发展了社会生产资料、交流工具、交通工具，市场经济依赖密切的社会沟通，用看似平等实则不平等的等价交换原则来剥削无产阶级，所以在以上这些条件下，资产阶级实现了更彻底的民主制度，在中国甚至实现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骇人听闻的压迫现象，也没改变他们的私有者面貌，他们依然不可能发展真正的民主集中，他们要把劳动者和无产者排除在外，他们政治、经济地位的源泉就是压迫劳动者，他们必须要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专政和压迫。因此，即使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的民主集中制也是排除了劳动者的民主集中制，他们民主集中制一天也离不开对我国劳动人民的压迫，他们由于自身的私人利益也不可能消灭民主集中制本身，因此他们民主集中制只是一种对私有者来说特别成熟的上层建筑，实现剥削者内部的最合理的相互关系的样板。

九. 我们今天的民主集中问题

就燎原的情况来说，燎原完全是老管理的集中制，而非民主集中制。当然，老管理们也许会说，我明明是民主集中制。可结果就是这样的民主集中制可以在少数两三人的意见下随意开除好几十个人，他们可以随便污蔑造谣其他同志而完全不需要尊重其他大多数同志的意见。集中制形成的在燎原中的各个秘密机关和组织所造成隔阂，已经变成了老管理利用这种秘密关系来造谣和污蔑其他同志的重要方法，他们利用燎原组织分工和手工业现状造成了一个内部洗脑过程。自然，我们并不是说集中制在一切地方和一切条件下都是不行的，至少过去很多的革命组织都在早期阶段实施过集中制，对于列宁来说也是如此。但至少对燎原拉说，光谈集中制就已经无用了。因为老管理的革命素养低下、机会主义的统治横行，燎原的集中制在这已经成为了老管理祸害我国革命者、毒害燎原组织、和对我国革命事业产生恶劣影响的重要工具。因此，在这样情况下，应该加大燎原内部的民主制作用。

这样的事实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使是在专制的条件下，即使是在需要严格发展秘密革命组织情况下，如果一个革命组织的重要活动分子的革命素养低下和组织的革命路线越丧失的情况下，民主因素的作用就越发凸显了。在燎原这样的情况下，除非改换为更优秀的革命者负责燎原的各级重要机关，否则就必须要加强燎原组织内部的民主制作用。

列宁在 1905 年面对孟什维克分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工作的时候，为了满足俄国革命的需要他不得不提出建立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而对于燎原这样更幼年无数倍的情况下，由于老管理的素养缺失，不得不更早建立民主集中制，否则我们很难想象燎原能够停止污蔑我国其他革命组织、停止糟蹋自己的同志、并且能使自身更进一步。

而对于革社来说，我们依然是集中制为主，但建立了一定的民主方法，并且保持随着组织规模的发展而往民主集中制过渡的架势，但目前来看还差得远。但对于革社来说，这样的情况目前已经够用了。而在我们的看来，目前的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更是实现了标准的民主集中制，只是各组织积极程度不同，实现它的程度、形式还不够充分，因此它是受限制的民主集中制。这样的情况就目前来说也基本够用了，特别是在民主方面已经完全够用了，但在集中方面它还有待加强组织之间的团结和统一行动。

而对于我国其他的革命组织来说，由于绝大部分组织都是像我们这样的狭小的，还有很多更为狭小，因此集中制依旧是最适合当下我国的革命环境来和警察斗争的。但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我国革命分子的初步性，也许警察已经把不合格的组织给排除了，达到了另外一种物竞天择的筛选方法；但另外一方面对于组织内部问题较多、成员有所不足的情况下也应该加强内部的一些民主因素，限制素养还有一些缺乏的同志，保证他们能够在革命事业中较长稳步的成长。并且对于革命组织来说，特别是对于秘密组织来说，要重视对成员的筛选工作，排除不合格的人士和机会主义者加入组织，我国革命的事业或革命组织的民主集中不是欢迎这些人的。因此对于许多组织来说，会存在着鲜明的内部成员差异，即有一部分同志较优秀、较活跃，另一部分同志就要差些，工作不够积极、较难保守秘密、其他素养较缺乏等等，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能一概视之，也需要适当的区分开来，需要进一步集中优秀的同志，另外一方面又给予这些同志成长空间和适当的民主空间。

因此对于我国今天的革命者来说，需要审时度势的采用合适的民主集中的方法和制度，妥善的处理组织问题，既不可以冒进、也不能够落后事实需要。

十. 革命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观

本文内容涉及较多，因此需要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从成熟的系统性观点出发来考察本文的问题，并且作者也希望能够帮助读者理清这个问题的脉络，能够建立起对这个问题的完整的科学看法。

首先，民主和集中的现象和需求是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一同产生的，它必然也要随着阶级社会的灭亡而灭亡。

民主和集中是对立统一事物，民主是代表着一定单位的各种社会需求，集中则是要求把这些需求统一起来，化为一般的需求。集中只能够满足一般的需求，而这种一般的需求只能主要是阶级利益。民主和集中的矛盾是一般和特殊之间、共同和个别之间的始终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另外一方面有着不同分工、工序之间的矛盾。同时，民主集中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虽然代表一定的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但它本身并不是政治、经济、文化，它只是一定的阶级用来改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工具之一，它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然后民主和集中首先具有着阶级性，它是伴随着人类活动之间的根本对立而产生的。一定的阶级的民主集中总是具有着一定阶级的一般利益，而这种民主集中总是和另一些阶级的一般利益所相互矛盾的，总是和另一种民主集中相矛盾。而拥有着私有利益的阶级来说，民主集中永远解决不了他们的矛盾，他们也永远不了解不同民主集中之间的矛盾，而无产阶级因为其特殊性质则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并把民主和集中一同消灭在阶级社会的最后历史中。

民主集中制有这样的政治特征：

1. 民主集中制是最高程度和最后形式的民主集中。
2.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完美结合，其最完全的体现就是最广泛的直接民主和最高程度的集中的结合。
3. 民主集中制的一般政治内容的特征有这些重要部分：（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
4. 民主集中制有着深刻阶级性质，现实不存在一般的、无阶级性的民主集中制，这就可能会有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民主集中制。
5. 民主集中制和社会经济制度以及阶级专政的问题相联系，它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经济建设和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

民主集中制和阶级专制相联系，它和阶级专制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互相依赖、不可分离。一定的阶级在对自身实现民主集中的时候，他同时也要对另外的阶级进行阶级专制。一定阶级的民主集中的内容要靠阶级专政来实现。因此，民主集中和阶级专政的关系也是民主集中谁和专政谁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无产阶级是有史以来最特殊的阶级，也是阶级社会最后的

阶级，他必然会由于他自身的特性和斗争需要而在消灭所有剥削、压迫和不平等现象后又最终消灭整个阶级专制和自身的民主集中。

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共产主义运动早期，集中制是革命无产阶级所需要的革命组织制度，而不需要广泛的民主制。但这种制度也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即同志之间的关系和同志信任，这种因素是未来建立民主集中制或往民主集中制过渡所需要的重要条件。

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在一定的情况下会产生质变，质变为其他阶级的民主集中，最终还会导致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质变。在这个质变的过程中有着深刻的阶级斗争，主要为一般性的矛盾和一般性的矛盾的斗争，然后是以特殊性的形式来表现出的一定的一般性矛盾和直接的一般性矛盾之间的斗争。而矛盾也只有直接的一般性矛盾和带有特殊性形式的一定的一般性矛盾两种。在另外一方面，在斗争途径方面则有三种，在不同的民主需求之间有关于这种不同阶级性的民主的斗争，在集中之间有关于代表不同阶级性的集中之间的斗争，在集中和民主之间更是有着不同阶级性的民主和不同阶级性的集中之间的斗争。

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力量来说，民主集中至少有着这样四种阶段发展：

1. 早期的集中制
2. 受限制的民主集中制
3. 全面发展的民主集中制
4. 消亡中的民主集中制

这四种阶段在历史上代表着四种革命时期，第一个主要是在一般专制条件下的早期的秘密革命组织发展的阶段，第二个则是革命运动开始蓬勃发展、革命组织之间需要联合和合并的阶段，第三个则是社会主义时期需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保证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阶段，第四个则是人类迈向共产主义阶段的情况。

对于民主集中问题来说，斗争，主要是阶级斗争是特别重要的，这种斗争首先有决定民主集中的性质的作用；其次斗争有推动民主集中进一步发展和使阶级一般性发展的作用；最后斗争有使改变民主集中和阶级专政整体性质和内容的作用。

对于经济方面来说，民主集中是上层建筑。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没有在社会生产方面发挥改造作用的空间。在社会主义时期，民主集中在这个时期也成为了一般劳动者可以直接利用的上层上层建筑和重要斗争工具，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可以利用民主集中来改造社会生产关系。

对于其他阶级来说，民主集中受限于他们的私有利益和生产方式，他们始终不能够彻底的发展民主集中，始终是代表私人利益和镇压劳动者的民主集中。作为最高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民主制也没有改变这些性质，只是使得资产阶级更成熟了，内部管理更完善了，但也是对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者的镇压和剥削更全面了。

就我国目前总的情况来说，集中制是更普遍需要的情况，但在部分情况下也需要发展一定的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实际需要。所以对于今天我国的革命者来说，则需要审时度势的采用合适的民主集中的方法和制度，妥善的处理组织问题，既不可以冒进、也不能够落后事实需要。

历史模仿家

革社线下工作同志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们的一些历史模仿家们，他们不是按照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解决我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是按照列宁的词句去拙劣的模仿俄国革命。这种教条主义危害很大，“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这种教条主义在融工问题的表现就是硬要照搬俄国的方法，这种模仿究竟拙劣到哪种程度，从一些同志在连有组织的工人斗争和工人组织都还没有或者非常欠缺的时候，就硬要照搬《怎么办？》中的一切和模仿俄国革命家的厂外的政治行动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不对这些迂腐的偏见进行清算，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

一. 融工就是经济主义？

一些同志认为融工的提法本来就是经济主义。在他们看来，融工的提法是 cosplay，不是为了革命的任务和利益，而是为了满足知识分子的虚荣心，获得某种身份的认可。他们指责融工这种经济主义是为了把知识分子变为工人，是为了满足知识分子的心理，是为了改造知识分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试想，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想要实现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的结合，最好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到工厂中去，他们为了更好的全力实现这个结合，他们去到工厂里工作，去到厂里组织和教育工人，去建立我们的工人组织和革命组织，去培养我们的工人工作者，去利用起他们的力量，去把他们的经验分享给其他同志，去为了未来的建党工作建立组织。他们的经济主义到底表现在哪里呢？到底有什么理由指责这样的同志是经济主义呢？**当不加分析的给融工本身扣上一顶经济主义的帽子时，无论那些去融工的同志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进到厂里，无论他是按照怎样的方式在厂里工作，他都被迫成为了经济主义者了，他都要被“当代火星派”扣上经济主义的帽子了。**试问，这是列宁主义者该有的分析问题的方式吗？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吗？这难道不是在拙劣地模仿火星派吗？

我们为什么要融工？我们的目的很明确，“我们融工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的结合，为了使无产阶级组织成为一个阶级，为了摆脱远离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阶级的现状，为了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一些同志会说，现在个别小组的融工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理论和我国工人阶级的结合。对。但这是在说废话。谁也不会痴心妄想靠几个小组就能完成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问题在于，我们当下最紧要的是和工人阶级结合，是建立我们的工人组织和革命组织，只有在具有了这些稳固的据点和实在的物质力量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在实质上建立一个政党，然后扩大我们的力量，实现我们对无产阶级的领导。

只有融工这一种方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的结合吗？一般地说，实现这种结合的方法当然不唯一，现实生活会为我们提供很多思路，这种思路可能是通过一些合法的工人组织

和工人接触，通过一些厂外活动和工人建立联系等等。我们不仅不反对其他种种方法，而且还会在实际活动中积极探索其他方法。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放弃在目前看来是最直接可行也最高效的方法，转而采用其他的间接的缓慢的方法呢？**如果没有小组先以工人的身份到厂里进行活动，我们有多大可能在厂外建立起厂内组织？**这种单纯的厂外活动方法，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到了如何利用厂外活动，这需要最觉悟，最有魄力的革命分子进入工厂准备好厂内条件，这才有可能把厂外力量运用起来，才有可能创造厂外活动的条件。我们在提出我们的行动建议时，就应该明确的提出怎么做，而不是用既这样……又那样……的糊涂话造成实践的混乱。我们明确表示，在现阶段，应该优先进入工厂进行活动，同时建立起工人组织和革命组织，这个过程可以而且应该依靠厂外活动的帮助，但若没有厂内活动，那就是空喊革命，葬送革命。因此，现在必须把进厂融工作为我们的主要方法，我们不允许用其他糊涂观念搞乱我们行动的方向。

二. 应该怎么借用俄国经验？

还有一些同志想要照搬列宁和其他俄国革命家的做法。持这种观点的同志通常只看到俄国革命家厂外活动的一面，他们不分析我国的具体条件，就盲目地使用俄国的经验。他们反对“过分看重”厂内活动，他们认为“列宁等俄国革命家就没有在厂内活动很久，你看他们都在厂外活动，我们也应该学他们”。这简直是对历史和我国情况的极度无知，他们极度的死板和教条。

这些同志不明白，列宁在彼得堡的活动时彼得堡的条件与我们现在大不相同。在“八十年代中期，工人阶级已经走上有机组织的斗争的道路，走上有机组织的罢工这种群众性发动的道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而到了九十年代初——也就是教条主义者所拙劣模仿的列宁等其他俄国革命家开始活动的年代——“已经不像八十年代初那样主要是靠知识分子宣传家去寻求同工人建立联系，而是工人小组在为自己挑选宣传家，并且在挑选时对宣传家的世界观的要求相当严格”（《苏联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恐怕就是最教条主义的人，也不敢说我国工人的组织和斗争水平能够达到八十年代的俄国，更别说教条主义者常拙劣模仿的九十年代了。教条主义者要求我们到厂外活动，空喊政治灌输，他们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政治不足的缺点，他常常要我们像列宁一样活动。我们来看看 1895 年的列宁是如何工作的，他在 1895 年“把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当时已经有二十个左右）〈黑体是我们加的〉统一成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而为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作了准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请问那些让我们像列宁等俄国革命家一样在厂外活动，空喊政治政治灌输的教条主义者们，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工人组织可以利用，我们是否有可能不进厂就有可能带领工人阶级进行斗争？

列宁在彼得堡的活动时期和我们现在有一个根本差别，**列宁可以利用现成的有斗争意识的工人组织，而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组织。**俄国革命家活动时期的条件和我们大不相同，教条主义者的革命主义的词句在我们这里完全不中用。**问题甚至不在于我们为什么不能那样做，问题在于铁的现实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这样做不行！**教条主义者不是用理论服务实践，不是用理论指导实践，而是让实践去拙劣的模仿理论中的个别词句。我们几乎没有厂外灌输和厂外活动的条件，没有在厂外实现工人阶级和理论的结合的条件，没有在厂外帮助工人建立组织的条件，也没有在厂外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这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革命家必须要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列宁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他认为“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具体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我们的纲领》）我们应该运用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不是列宁的词句去具体的分析我国革命的道路，去提出中国革命家的方法，而不是盲目地模仿俄国革命家。

三. 中国革命家该怎么做？

中国革命家不仅要建立工人革命组织，还要建立工人组织。彼得堡有工人组织，而中国没有，所以我们不止不能盲目照搬俄国革命家的方法，甚至在相当程度上都不能像他们那样做。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能解释世界，还要能够改造世界。右倾机会主义者很清楚的看到了工人运动和组织情况的落后，他们很聪明的选择了“先等等看，先过好自己的个人生活或者先做些其他微不足道的革命工作”。这种等等主义的庸人论断，固然不值一驳，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根据这个现实得出我们的行动策略呢？

十月革命后，第二国际的庸人指责俄国革命的条件不成熟，“列宁回答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把事情颠倒过来，先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然后一日千里地前进，来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来造就很多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和行政干部呢？”（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我国目前固然是没有工人组织，俄国革命家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既有的工人组织，可是那有怎样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家不能在他的活动中，同时建立两种组织呢（工人组织和革命组织）？既然没有现成的工人组织，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建立工人组织也作为我们革命家的工作之一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建立起从一开始就比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工人组织与革命政党的关系都更近的工人组织呢？

即使是1897年的列宁，也不忘“在工人中间成立小组，使他们与社会民主党人中心小组建立经常的秘密联系”（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而我们的很多“政治主义者”却丝毫不谈中国没有工人组织的问题。由于我们所处的特殊阶段和特殊条件，中国的革命家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内，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完成这样的前置工作。可是这样做有什么错呢？我们在向工人宣传时，一刻也不忘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我们在组织工人时，一刻也不忘在有条件时就要建立起革命组织；我们在厂内做这些工作时，一刻也不忘利用厂外的力量和厂外活动的可能；我们在厂内活动时，一刻也不忘只有尽快摆脱这种不得不进行的手工业的工作方式，我们的事业才有前途。我们不准备等待工人阶级自己建立组织，我们准备一方面把工人组织起来，另一方面直接用社会主义意识来教导他们，直接从我们发展的组织中培养我们的革命家，直接把建立工人组织和建立工人革命组织都当作我们的任务。政治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看到这些前置工作的“政治含量”太低了，他们就要跳起来教育我们，就让他们教育吧，列宁常常引用一句俄国谚语“鹰可以飞的比鸡低，但鸡永远不可能飞的比鹰高”，我们把这句话送给列宁的词句的学生。

四. 被经济主义吓破了胆的“列宁主义者”

鲁迅曾这样讽刺反动派：“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我们的历史模仿者一看到经济斗争，就想到经济主义；一看到工人组织，就想到不够革命。他们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拙劣地模仿列宁的个别词句。所不同的是，反动派怕的是革命，教条主义者怕的是“不够革命”。

我们在前文已经证明，我国革命目前处于和八九十年代的俄国完全不同的阶段，我国的工人阶级远不如当时的俄国工人阶级有斗争性和组织性。教条主义者不敢认真思考现实，不敢彻底的思考他们的路线，他们起初鼓吹“厂外灌输论”，即革命家不用抛弃他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他只要利用他的空闲时间在工业区进行活动，就能够完成灌输，就能够培养工人阶级，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彻底揭露了这种路线的空想性和荒谬性。列宁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在一篇文章中曾讽刺过自由派人士彼特龙凯维奇为“戴白手套的革命家”，这个彼特龙凯维奇被自由派们赞为革命家，但他向其他一切自由派一样带上白手套去进谒沙皇，出卖革命（列宁《戴白手套的革命家》）。我们的厂外灌输论的鼓吹者不就是这样的“戴白手套的革命家”吗？他们一方面自己不愿意做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另一方面却打击做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的人！

教条主义者的厂外灌输论在被稍有常识的同志揭露后，，扭扭捏捏地承认也需要一些厂内活动。他们改头换面，变成了既要厂外活动，也要厂内活动，拿这样的折衷主义货色来糊弄人。我们从来就没有否认需要厂外活动，从来就没有否认需要借助厂外的活动和力量。问题的根本在于哪一个是主要的？在现阶段，如果没有厂内活动建立起的工人组织，如果没有厂内活动建立起的条件，如何仅通过厂外的工作影响到工人？如何仅在厂外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如何仅在厂外建立我们的革命组织？

厂外活动当然是重要的，但在没有厂外活动的条件时，硬要鼓吹厂外灌输论是什么意思？在目前最紧要的是进入到工厂活动，并且由这些革命家同时建立起两种组织的时候，硬要过高的称赞厂外活动是什么意思？同志们，你们被经济主义吓破了胆，你们不敢进行一点彻底的思考，你们不敢也不愿意做最紧要的革命工作。但请你们不要拿出这些东西来蛊惑人心！

附录：

到工人中去的同志的来信：

- 1、少数工人可以直接灌输，但即便接受了社会主义，如果该工友不了解如何团结工人、不知道怎么开展斗争，他仍然不是先进工人。
- 2、多数工人直接灌输观点是行不通的。需要通过现实斗争促进工人团结起来，看到自己力量，成功后再去总结和反思，工友就能够容易接受，同时也促进工人掌握斗争方法，这样的工人是先进工人。
- 3、培养工友成为社会主义的战士，必须要要有三个方面：思想方面、行动方面和集体生活方面。要把日常的零碎的灌输和系统的学习结合起来，不可偏废，不能以工人口头的只言片语作为其思想先进的依据，而要看他整体的思想表现（例如会不会分析社会问题的根源，能否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行动上，先进工友要主动自觉地和周边工友交朋友，跟进情况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或者团结的思想，要积极调查研究发现自己工厂的矛盾，斗争中要勇敢。

必须自觉地、有计划地开展工作，促进核心组织和群众组织成长。还有，必须在集体生活中培养工友，增强工友的保密意识，增强工友的纪律意识；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习惯于过组织生活，有了问题必须要通过集体讨论和集体决策来解决。一句话，我们必须要在具体的革命工作体系中锻炼自身、培养工友。单纯教会工友左派言语，是一个进步，但这仅仅是开始，如果工友不能主动促进组织成长、不会过集体生活，这种左派言语也仅仅是一种发泄。

4、先锋队是非常重要的。但先锋队必须在工人的日常斗争和组织生活中培育出来。脱离培养组织教育工人，不具备开展经济斗争、发展工人骨干的能力，这种小团体距离先锋队还差很大一截。

东风的同志的来信：

对于斗争的发起，在白区进行地下工作的我们要时刻牢记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发动斗争，力求斗则必胜。没有足够的取得斗争胜利的把握，我们则应该选择等待时机。也许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这里足够的把握当然不是指九成十成必胜的把握，而是经过我们努力和争取，有较大的取胜把握就可以行动。同时也要预计好失败后撤退的方案。而今天，如果我们要给斗争从初级到高级，或者说从简单到困难进行一个大致的排序的话，我们应该这么说：生活斗争（例如争取一个休息的凳子），经济斗争（例如讨薪），政治斗争（例如对防疫的封锁方案提出抗议进行游行），以及武装斗争（例如组织红军占领都市）。而随着斗争从简单到困难，其所需要面对敌人的力量也是由小到大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取得斗争的难度也是从小到大的。而取得斗争的胜利不仅仅需要看斗争中敌人的力量是否强大，还要看我们的力量是否强大，还有我们能够争取到的中间力量是否强大。那么，对于我们是否需要担忧经济斗争带来的经济主义的问题，回答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们应该根据局部的敌我力量对比，考虑发动何种的斗争。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我们首先就应该分析，当前大多数的工人运动中，面对的敌我力量对比往往是悬殊的，这时发动生活斗争，以及经济斗争便是合乎客观情况的。那么，如果在局部，发生了重大的敌我力量对比改变，以至于我们的力量强过了中特的力量，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发动政治斗争，自觉地、有意识地将我们的斗争进行升级。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一些同志对于害怕自身“不够革命”的担忧，以至于终日批判经济主义以至于要反对经济斗争的言论，我们要说：请放宽心，并且投入到紧张的斗争中去吧。

该如何融工以及不该如何融工？

革社线下工作同志

融工是我们目前最紧要的任务。现在一切觉悟的马列毛主义者都不否认需要融工，一切觉悟的马列毛主义者都认为只有和工人阶级接触，我们的事业才有前途。但同志们对融工路线的看法远不如对是否需要融工这个问题的看法一致。融工，——归根到底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我们深知实践的欠缺将会多大程度上导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空想，因此，我们不准备讨论融工的细节问题。马列毛主义者的一切行动策略都应该建立在对现实的科学的分析之上，虽然我们探讨不了关于融工的细节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并且也能够借助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为我们指出融工的方向和路线。

我们为什么要融工？确定融工的目的是制定正确的融工路线的基础。我们融工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的结合，为了使无产阶级组织成为一个阶级，为了摆脱远离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阶级的现状，为了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明确这样的目的，我们的融工才不至于变成盲目的“打工”。这样的目的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总的来说是两种类型的组织，即工人组织和革命组织。为了建立以上两种组织，我们必须到工厂工人中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以建立我们的组织。我们需要尽量利用起一切能够接触工人的平台和渠道，并且利用这些平台和渠道向工人进行宣传和鼓动，发展出我们的第一批先进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手工业的工作方式，也就是要避免把宣传和鼓动的对象只集中在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我们要尽可能的扩大我们的宣传对象，在宣传方法上要尽可能的做到程序化和专门化。

在扩大宣传对象的问题上，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那些同志利用起了厂区的轮滑队，他们加入其中以后成功把宣传对象扩大了几倍，要充分利用或者想办法建立这样的平台和渠道，这样就能把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程序化和专门化也很重要，革命分子到工厂去，决不只是为了成为工人的朋友的，我们不能把时间和精力过分的放在交友方面。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和工人搞好关系——恰恰相反，博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对于我们开展工作非常重要——而是说如果我们只有和每个工人成为被朋友才能或者才开始开展宣传工作，那我们就是在按照手工业的方式工作。我们当然要避免那种一见面就和工人谈革命的鲁莽行为，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通过实际的工作经验，总结出一种程序化和专门化的宣传方法，要能够在最快的筛选出我们所需要的先进工人。不要在一个人身上花费太多精力，要扩大我们的宣传对象，要总结出程序化和专门化的宣传方法。我们要“广撒网，多敛鱼，择优而取之”，不怕漏掉几个，也不怕看错几个，革命工作容不得我们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完美，这种细致与我们的革命工作是不相容的。

要利用好工人阶级本来的身份，做到工作的可复制性。通过“广撒网，多敛鱼，择优而取之”，我们就初步筛选出了第一批先进工人，接下来我们应该对这批先进工人着重培养和发展。我们要把他们中特别优秀者培养成我们一样的工作者并且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工作，绝对不能培养完就不管了。工人阶级，由于其本来的工人身份，只要他掌握了基本的理论和工作方法，并且愿意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服务，那他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共同事业，就能逐步参与宣传工作、组织工作，甚至未来到其他厂区进行同样的工作也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根据其觉悟程度和工作能力妥善安排就行了。这就是到工人阶级中工作的好处，学生阶层或知识分子阶层由于其主客观原因，暂时缺少魄力或者没有条件到工人中去做组织工作——而这是我们当前最紧要的工作——，他们更容易妥协动摇，不能投入到需要扎根的真正的融工工作中。而工人阶级不同，工人阶级没有那些顾虑和限制，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更容易为工人阶级事业服务，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们很容易加入我们的事业。绝不能想着只靠几个不能扎根的、间歇性的和无科学计划的去融工的知识分子去完成这一切工作，这是手工业的工

作方式。要充分利用先进工人的工人身份的便利，要充分利用先进工人对工人生活和思想状况更了解的优势，要充分利用先进工人对我们的支持。

要明白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先进知识分子到工厂里去，不是为了成为工人本身，也不是毫无目的毫无规划的做宣传和组织工作，而是把普通工人变成先进工人，把先进工人培养成合格的工人革命家。他应该是“火星”，他应该起到“牵引线”的作用，他应该而且必须能够培养出一批像他一样工作的工人同志，然后把这些合理的安排这些同志的工作，充分利用他们的力量。

要反对一种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把“扎根”的融工方式庸俗化了。布站老管理认为“革命者只有长期锚定某个行业长期耕耘，几年、十几年的干下去，才能成为该行业的明白人，熟悉产业情况、熟悉行业趋势、更加熟悉该行业工人阶级的状况，最终成为地下网络的有效节点。”根据这种观点，好像革命家在一个工厂或一个行业呆的越久，就越证明其踏实和具有革命坚韧性，这是不对的，这是对“扎根”的工作方法的歪曲。扎根并不是要某一个革命家长期“扎”在某个工厂或者行业，扎根指的是把社会主义意识扎进工人阶级中去，把我们的组织扎到工人阶级中去。革命家，当他在一个工厂或者行业已经建立了具有继承性的组织之后，他就可以并且也应该离开这里去其他地方发挥出他的作用。做一个行业能手当然有助于我们的工作，但革命家的任务不是只做一个行业能手，他不仅需要成为那样的“明白人”，他更需要完成的目的是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

适应着布站的庸俗扎根观点的，是其熟人网络的观点。布站老管理在其反对佳士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捍卫了的扎根的正确观点，但是在其对扎根的工作方法的阐述中，又包含了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萌芽。他们认为熟人网络“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你是好汉我挺你”，把“包括‘熟人网络’在内的‘地下网络’发展壮大才是马列毛主义的融工战略”。在这里完全没有区分出革命组织和工人组织，好像革命家只要扎到工厂里和越来越多的工人搞好关系就行了。革命的工作在这里完全是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区别和提升。这种观点在其他地方也有体现，比如“当工人阶级的权力机构从一个工厂发展到整个工业区，从一个工业区发展到全国范围时，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之所以资本主义，正是因为在这个生产关系之下的工人，不可能通过仅仅通过熟人网络就建立起革命的联系和组织，就能自觉地组织起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资产阶级专政之所以为资产阶级专政，正是因为它不可能允许我们自由的发展，一个工厂一个工厂那样的夺权是最为理想但也是很偶然或很狭隘的情况内，通常的情况是，资产阶级面对我们实力的增长会进行各种镇压和敌对活动，这就还要考虑到战斗的情况。通常在革命爆发时，也不一定需要每个工厂都有工人阶级的权力机构。并且，这里的所指的“工人阶级的权力机构”还是那种“熟人网络”或“地下网络”，他和俄国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是距离十万八千米的。这种东西是完全称不上权力机构的，这种松混淆了革命分子工作和群众工作的东西，这种松散到要让个体进行无目的、分散的、无科学计划的扎根的混合物，甚至连工人日常需要的罢工活动也是很难普遍组织起来的，至于让它完成革命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们反对布站老管理的错误的扎根观点，但绝不是反对扎根本身。离火提出了反扎根的路线，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们应该去工厂和工厂附近（如住宿区）接触、教育、组织工人，要利用知识分子本身的理论素养、实践能力和相较工人更加充裕的时间，从第一次深入聊天接触和第一次派“传单”开始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尝试把工人组织起来，同工人一起进行理论学习。”这完全是在知识分子的书房里臆想出来的东西，这表现出对我国的政治环境和工厂状况惊人的无知。首先，我国绝大多数工厂都禁止非本厂员工的进入，而工人实际工作的车间更不允许他人进入，这就几乎完全排除了在广场内进行宣传鼓动的可能。其次，难道能够设想仅仅靠着在工厂附近遇到的（而且每此遇到的都是不同的人！你无法保证这次见面的人就是上一次的那个！）几个工人就能完成需要政治灌输的工作吗？每个这样的工人可能来自不同的工厂和车间，宣传和鼓动的材料都大不相同，而且任何宣传和鼓动都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再者，我国现在的政治环境下的绝大多数情况中都不允许鲁莽的“派传单”工作，以及这种活动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可能达到我们目前最需要的目的。若是没有若干在工厂内部工作的工人同志帮助我们进行掩护，望风，散发等活动，仅靠几个在厂外活动的知识分子，如何散发传单？如何保证在散发完传单后脱身？最后，进行政治灌输后呢？散发完传单后呢？

假设按照最好的情况，工人阶级觉醒了并且群情激愤，谁去组织他们，组织如何建立？布站曾经完全错误的批判到工人中去为“泛左翼融工”，但这个评价完全适合于离火提出的融工路线，因为在这条路线中，没有仔细考虑接下来的组织工作。

离火提到了“‘融工’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进厂做工能够培养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进厂做工是一种更贴近工人阶级、更加深入实践的方式。”这正是指扎根的观点，离火也认识到布站老管理的扎根方法不可行，他们在批判“到工人中去”时，恰恰是在批判“布站老管理”的融工观点。他们认识的“仅有进厂是不够的。已有的融工经验表明，如果仅仅停留在交朋友，做服务，做合法的工人工作，进厂的同志的有限精力下在这些工作中白白消耗，没有成果，往往是最早坚持不住并退出相关的革命事业的。”

但是离火在批判布站和到工人中去的错误时，连布站老管理正确的东西也抛弃了，而他们也因此比布站更倒退了一步。我们知道，布站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扎根路线脱离了我国革命的实际，他们那种渐进的，盲目的发展路线只会无限期的拖延革命，只会把我们有限的革命力量“白白耗费”。但问题的解决不应该是去厂外寻找办法，不是扎根本身有问题，而是布站的扎根方法有问题。如何不“白白浪费”“进厂的同志的有限精力”呢？那就要充分利用本文所说的“工人阶级本来的身份”，而不是离火所说的“利用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要充分发挥出革命知识分子的“火星”的作用，但是在厂内，而不是厂外。要提出明确的组织思路，要有目的的进行融工工作，尽快把你所发展出来的先进工人纳入到工作中，让他们帮助以至替代你进行工作。

列宁在一篇对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纲领的批判的文章中指出，“既然已经谈到鼓动、宣传、罢工等等，那么闭口不谈革命组织就简直不可宽恕了”。无论是布站老管理还是离火，在他们的文章中谈论融工路线时，都缺少建立两大类型的组织——工人组织和革命组织——的观念和明确思路，更别说到去利用起这两种组织的力量了。在布站老管理方面，是用熟人网络或暴力组织这种混乱的观点模糊了两种类型的组织的实质，并抛弃了真正有效的工作。在离火方面，放弃了厂内工作而转向厂外，而这无异于让工人阶级自己去建立组织，在今天的情况下，这种放弃深入工人阶级的工作来建立工人组织的方法本质上就是不要组织。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完全没有讨论如何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也没有讨论如何宣传鼓动等问题，这不只是因为我们缺少实际经验，还因为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本质。今天我国融工的关键的是在工厂中建立两种组织，即工人组织的组织和革命分子的组织，然后充分利用这两种组织的力量扩大我们的力量和活动范围。至于如何组织斗争，如何宣传和鼓动，这反倒是技术性的问题，实践的经验会解决这些问题。过分的看重罢工或某次厂内斗争是不对的，这种斗争只有在有助于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且有利于建立组织时才有意义。

揭穿大群最新污蔑的实质

革社 (RSF) 编辑部

最近布站更新了一篇短篇时评《目前工人运动状况分析——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文章内容却和批判东风强行关联在了一起。为什么要说强行呢？因为作者完全没有从事实出发而把引用的材料强行用来批判东风，并提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论断，任何稍微了解一些具体事实的人都能觉得莫名奇妙。同时我们也能发现在本文的编者按完全能起到本文线索的作用，它确实反应出了本文的中心内容，但这些内容是极其主观主义的，并且个编者按我们知道是由大群的老管理和其他比较核心的成员所共同写成的。这同时也反映出了大群目前的一些严重的问题。

一. 习惯性的撒谎造谣和虚空打靶

编者按：

1. 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的区别不在口头上，而是在实实在在做的事情上，东风等一大批泛左翼组织，自己组织内部都散如沙子，却妄想通过爬行的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不过是死路一条。
2. 没有革命的组织，就没有革命的未来。西方的政党尚且知道主动带领群众罢工，怎么东风就不醒悟呢？融工就是要加强工人的斗争意识，不断推进地下节点的构建。
3. 要搞好融工首先就得把组织搞好，东风组织那样的机会主义路线最后也只是将努力付诸东流。工人运动正盛起，但还不足以燃起燎原之火，工人经济斗争有他的局限性，这需要融工来推进。
4. 融工是革命活动中的重要一步，不得马虎，口号上喊得响亮的东风组织，一到实际活动就暴露出其机会主义者本质，导致无产阶级力量造成损失，革命是一个长远的任务，远非一夜之间可以达成，革命者仍需忍辱负重，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 《目前工人运动状况分析——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从第一条我们就可以看出，虽然这段文字中他们强调了实践的作用，但我们只要一回顾事实就能发现，统一战线的各组织（包括东风）虽然相比大群的燎原组织而言都是非常年幼的，往往只有半年、一年，但在实践上我们可以说他们现在是不逊色燎原的。我们知道布站、燎原、马列毛大群、星火导刊为同一组织所管理，一般称呼其为燎原组织。星火导刊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布站也是历史悠久。虽然在群里组织等方面东风和统一战线相比燎原有较大的影响力差距，但在线下方面又走到了成熟的燎原（十几年的历史）的前面去了。在线下组织方面，燎原的管理不久前还在实践上反对学生们搞线下的马列毛组织的，关于这一点接受过他们审核或参与过大群工作的同志都深有感触，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改得如何了，但这说明他们是远远落后于已经发展起学生线下组织工作的东风和其他统一战线组织的；而在工人组织工作方面，高喊了十几年要扎根和发展工作组织的大群到今天都没有任何能让我们看到的实践经验，但却高喊自己的有了组织工作，这实在让人疑惑。这和统一战线中正在筹备融工的东风、革社，以及已经发展了工人组织工作的“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如果谈实践，那么大群的实践是落后的、甚至是没有的，至多只能说他们在搞聊天群和论坛的实践上比我们的经验和积累更多一些。所以这里首先就制造了第一个谣言。

然后他们又说东风等泛左翼组织内部散如沙子，这就是第二个造谣以及虚空打靶。虚空打靶在于把东风等组织打成泛左翼组织，造谣在于散如沙子，这当然不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做了。以他们的说法来看，燎原是不散的，但以我们了解来看，内部错误的斗争和人为制造的分裂现象从来没有断绝过的燎原是没有资格说别人散如沙子的，我们都知道“东风”、“斗争公社”还有许多革命力量都是被大群老管理自己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所逼出来的。

最后他们还造谣说我们要“妄想通过爬行的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我们从来都是抱有诚恳的希望和积极行动，用力所能及的工作来提升自己觉悟、组织，以期有一天我们能够有资格彻底的维护工人利益时才能和更广大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们一同领导工人运动，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是实践这个过程的一份子，我们从来不认可自己对工人阶级有天然的领导权，我们虽然力图成为其中一部分，但我们知道那是要通过我们的实践和工作来证明的，我们也不认为我们今天的工作是足够的。并且从以上我们谈到过的事实来看，恰恰是大群的老管理们“妄想通过爬行的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因为他们自己是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这些工作的，但却要打击力图做和力图做好这些工作的其他革命分子们，这样的人确实在未来只有“死路一条”。

第二条我们也能够看出，他们首先主观的认定东风和我们不懂革命的组织的组织的重要性而造了一个谣言，然后又莫名其妙虚空打靶，引入了他们历来的扎根观“地下节点”，这和我们的扎根观又是不同的。“地下节点”的扎根观恰恰是要人缺乏有效目的的扎根几十年的散漫的搞“熟人网络”，这恰恰是不要革命的组织的体现。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在《关于“扎根”的线下组织工作路线的问题》详细论述过了。

第三条的可笑之处在于把上面的问题又重复了一遍以更严重的情况表现了出来。弄不清明确的组织工作路线的人说别人是机会主义路线，十几年间没有好好作有组织融工工作的人要其他准备那样做和正在那样做的人不融工。他们虽然认识到了现在的工人运动存在经济主义，但又莫名拿这一点去攻击正视以及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第四条中看他们继续污蔑东风，用不存在的情况来打击东风后说“革命是一个长远的任务，远非一夜之间可以达成，革命者仍需忍辱负重，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单独看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不得不把这一段内容和他们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看，那就变得非常讽刺了，在其他地方正确的话在这里就成为了为他们的丑恶现实遮掩的面具，变成了他们虚伪面貌的反应，大群的老管理们用忍耐、积蓄、等待等手段来拖延他们去作的真正“扎根”工作，而他们又以此为理由打击别人。

只要把这个编者按的实质内容全部理解了我们就能发现这里除了造谣和虚空打靶之外就没有别的内容了，用革命的辞藻堆积起来的满是主观主义的攻击。他们用这些辞藻来掩饰自己的丑恶、来试图欺骗更多的普通群众，大群老管理和他们走狗的虚伪也在于此。

这个编者按的内容对于本文完全可以起到指导线索的作用，因为它很优秀的指出了本文的核心内容。所以我们在下文还可以看到更多的这样的内容，如“最近，随着东风等其他组织对大群融工路线的攻击，导致在墙内已经被确定的融工路线收到了很大冲击，大量的融工工作者受东风等组织影响，抛弃了步步为营的融工策略，而转向了边打边跑的策略。这种策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所以，我们需要对当下工人运动状况进行分析，来看看东风和大群哪个融工路线更符合当下情况。”等等。像这样完全捏造、不着边的说辞在下文还有很多，大群不仅用撒谎来编造他人，也有撒谎来编造自己、吹嘘自己，最后就是虚空打靶。如果我们多翻翻他们文章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内容，正如我们在《全面批判布站老管理目前的机会主义线下组织工作路线》一文中所揭示出来的一样，习惯性的撒谎造谣和虚空打靶就是他们对待其他许多我国革命力量的方法。

二. 强行关联所反应出来的问题

其实以上这些涉及的内容已经包括本文的一半了，剩下那一半内容也是相似的，通过列举出了我国一段时间内工人运动的一些变化情况莫名起来把东风关联起来，强行的输出了类似的观点。如：

通过这张图，我们可以发现，原本的工人运动活跃地区只剩下广东还剩下79次，其他的地区瞬间降到10次以下，说明虽然我国工人运动活跃，但规模小，无组织，像一摊散沙。这样的工人队伍肯定是一吹就散，一打就破，就像纸老虎一样，这也是为何很多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主义，工人运动结束后便失去组织的根本原因。而在这种状况下，东风等组织不但不想办法在融工中解决这种状态，反而希望融工组织倒退回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落后状态。这是让人愤怒的。先锋队的责任就是领导无产阶级完成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跟在无产阶级后面，拿无产阶级当挡箭牌和小白鼠。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政治筹码。而他们如此关心工人，却连这样显而易见的结论都没看到，说明他们才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大群的融工路线，提出了进行有组织有纪律的融工路线，解决了当前工人运动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把无产阶级从“纸老虎”变成“真老虎”，是符合当前局势的。

因为主观主义，因为**习惯性的撒谎造谣和虚空打靶**，所以他们就要给自己所能找到的一切社会材料用貌似革命的公式解释后树立起一个主观的互相对立的双方，一方革命、一方丑恶，革命的是自己、丑恶的是他人。这也是人类在婴幼儿时期或者部分流氓习气严重的人那才能明显表现出来的一种世界观：即以自我为中心、非此即彼、撒泼打滚、无理取闹。

我们很遗憾，今天不得不和大群老管理及他们的走狗这样货色的进行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在今天的必要性也反映着我国革命组织发展的极不成熟的现状，我国目前的一些革命组织的就是被这样一群幼稚的流氓所控制着。

三. 垃圾为什么能发出来？

既然这篇短文的问题这么严重，以至于称得上是达到了不堪入目的垃圾的东西为什么会被大群老管理正式发布出来呢？

了解一些具体情况的同志们都知道，燎原内部是有一种要求新同志写时评的制度的。写时评本身不是坏事，可是在大群老管理的各种政治影响下却写出这样的东西，和其他革命组织的时评水平形成了极其明显的对比。这篇文章只会是大群的一个同志为了应付时评任务所写出来的。据斗争公社和东风乃至更多有所了解的同志们的实际经验出发，大群老管理对时评工作的态度，与其是作为宣传工具，不如说是作为一个老管理强加给其下属的义务。在老管理看来，时评可以注水，可以对宣传毫无作用，甚至可以转载，但是不写时评却是会成为态度问题，说明你不愿意投身于组织的日常工作。自然，不参与现实革命组织工作的人不应该被称为合格的革命分子，但大群的老管理们却把革命工作歪曲为了为他们的官僚主义利益所服务的工作，所以就变成为了他们的流氓利益和主观思想所进行创作的时评工作。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篇文章居然还能受到大群老管理和他们走狗们的认可而写上了编者按后正式发出来，说明这篇文章中的一切不堪入目的内容也是符合大群老管理不堪入目的思想的。而赞成其他新同志去写这种东西的老管理及其走狗们自然也是官僚主义的，他们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赞成其他同志创作和发表这种垃圾出来。我们难以想象现在大群的组织内部到底乌烟瘴气到了怎么样的地步，他们内部的阶级矛盾（大部分同志和官僚主义的矛盾）不可谓不深厚。

今天，这样主观主义的垃圾（文章）在主观主义的垃圾（大群老管理及其走狗）的主导下发表了出来。根据以上的所有内容，我们总结为一个过程：在非常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大群老管理及其走狗的统治下，在非常乌烟瘴气和阶级矛盾深刻的时评文章生产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水平极其低下或者同样非常主观主义的审核的共同努力下，这样的垃圾陈放在了我们面前，大群老管理们用这些垃圾来糟蹋我国革命分子的智商和时间。这也是大群老管理对大群的再一次作贱和糟蹋。

我们号召真正革命分子们和进步群众们，号召燎原内部的其他进步同志们要积极的大群老管理极其走狗进行斗争，和这些流氓的官僚主义主义者进行斗争。

第二部分 路线斗争

政治是最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把第二部分当作刊物第一部分的补充内容；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在这一部分中具体收录最近重要的或关乎我们的路线斗争的文章。

在这一期中路线斗争的内容仍然是关于线下组织工作和融工方面的问题的。新十月频道发表的新文章引起了关注，并一开始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但这篇文章的问题很多，继离火先生的问题之后继续延续了之前的错误，并且继续污蔑和歪曲了我国其他的革命分子及他们的工作。革社和其他统一战线的同志们第一时间选择站了出来指出这些问题。本期详细收录这一时期的路线斗争有关文章。

而因为各方面原因，这一时期“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也正式加入了统一战线。我们团结了起来要纠正这个错误。现在已经不是离火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新十月频道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呼吁更多的同志们、进步群众们能够团结起来对付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继续从理论上、实践上、宣传上驳倒这些错误。希望新十月能够今早改变这些错误。并且我们也希望新十月的先生能够严肃认识到自己所提出的部分观点、路线的严重错误和自身频道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并能有较快的、较彻底的改正。

融工分享——我们是如何进行融工的？

来源：新十月

作者：合火

愿意“到工人中去”的左派青年热烈地讨论着、期盼着、实践着融工。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们在工人中也工作了一段时间，有收获，也有问题。这里，与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以期跟大家共同进步。

一、初期的工作和问题

为了解所在区域的情况，我们前期通过调研和进厂进行了普遍的调查。

调研——从街头到访谈

调研可以由厂外的同志在工业区进行的，可以了解该工业区的主要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思想状况。

一段时间后，调研材料已经有了量的积累。但我们发现调研效果有限，具体体现在所能获得的信息局限于工厂分布，工人一般工资概况，整体人数等信息，其他的更为详尽的信息比如工厂内的矛盾，工人的组织性，工人的积极分子等，即使是调研到了中层管理，也没有办法了解。

因此在对该工业区的产业以及工人现状有了一定了解之后，调研的目的就变成了与更多的工人接触，进一步了解工人的处境，发掘先进或者有斗争性的工人，并通过深度访谈进一步接触巩固。

然而访谈工作的推进比较慢。首先是工人并不会信任只有一面之缘的我们。其次，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交流的话题并没有引起工人人们的兴趣，这次话题包括“劳动法”，“工人生活”等等政治不敏感的一些话题。在经历被访谈工人们鸽了数次之后，同志们热情也有些被消磨了，有不少人表示调研在进一步扩展联系、组织工人方面没有成果。

除了问题，我们也有许多收获，我们发现我们工业区的工人普遍对现状不满，有一定的政治意识，比如，我们已经数次听到工人说“要是革命我一定参与”或者直接骂G C D等

的话，这些对现存制度不满，有政治意识的工人存在给了我们很大的激励。同时给我们带来反思——“我们是不是与工人交流的时候太保守了？”

进厂——交友、斗争和灌输

与调研同步进行的还有进厂。不可否认，进厂确实是一个接触工人的好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通过不间断的、直接的政治灌输改变了一些人的想法，或者发现了一些先进工人。

在厂里，需要有意识地去交朋友，因为工作岗位的原因，我有意识地与工人聊天，交了几个不错的朋友。

有一次，我们通过一场个体的经济斗争发现了一些有斗争意识的工人，并在跟进过程当中能发现他们是有工联意识（要工会要团结的意识）的，渴望建立工会，保障自身权利，于是我们就为他们开办了劳动法的相关课程。这些工人以正式工为主，年龄也普遍偏大，有家庭，但这个课程没有持续太久，一个是工人确实对长篇大论的劳动法不太感兴趣，被吸引过来的工人仅仅只是想解决自己当下的经济问题，而大部分工人并不认为劳动法能够解决大家的问题，在调研中我们最常听到的话就是“劳动法没用”。另一个是来的工人数量有限，而我们还需要刻意提前做准备，正如“到工人中去”所说，我们这是“陪太子读书”。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亲近我们，或者有政治意识的工人，有的人已经能够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有一定的了解，并在闲聊过程中愿意说自己是信仰镰刀锤子的。有的人虽然没有这样的意识，但会不断地“试探”（这里我说的试探是一种询问的，不是说他们是密探或者工贼）我们，问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碰到了许多工人对我们的“试探”，在谈论到未来生活的时候，会有人问我们：“我们知道现在状况很糟糕，但是你们想怎么办？”遇到这种“试探”，我们在思索之后，往往哑口无言：一是我们没法简单给出一个暴力革命这样寄托于未来革命的回答，实际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革命时刻何时会到来；二是我们没办法提出着眼于工人阶级利益的，符合当下革命条件的政治任务和政治目标，讲不出具体的改造世界的内容；三是我们仍然保守地不敢踏出政治宣传这一步，我们惧怕安全风险，害怕这会有不好的后果。

每次调研或者聊天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事后都会反思检讨，并一次次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对工友做政治灌输？这个度在哪里？如果工人们已经有了政治意识，我们哪怕与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似乎都不能满足他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们说清楚该怎么办？”

初期的工作思路及具体问题

整体来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工作的方法就是和到工人中频道去所提倡的工作方法（[1]）是同样的：先调研，对一片工业区有初步的了解，决定重点要接触的工人是哪些，又是要进哪个厂。之后是交朋友，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个过程中，如果认识的工友能够接受政治灌输，那我们就进行灌输，他还不能接受政治灌输的，我们用讲劳动法，讲团结，讲斗争的方法来发展他们。第三步是进行斗争，争取权益，在这个基础上让一些左右摇摆的工人们更认可我们，并尝试进行政治灌输。

在这样的工作中，我们会遇到以下具体的问题：

1、 调研能够了解到当地工业区的信息以及工人的思想及生活状况，这很重要。但调研这样的接触方法远不足以让工人信任我们，如果没有合适的组织方法，那么就白白浪费了我们认识的大量工人。调研只是工作的第一步，更进一步地需要将工人组织起来。

2、 进某个厂长期做普工对于该厂内的经济斗争的发动、工人政治组织的建立以及政治灌输并非最有利的方式。进厂过程中，普工往往会被限制在自己的工位上，单凭社交圈子能够认识到的工友有限。即使我们可以对身边的工友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收获的也就仅有一两位而已，更别说有时候我们个人能力有限，没有办法对工友做到政治灌输。其次，斗争需要各种有利条件的成熟，所谓长期“扎根”在一个厂，并且希冀在该厂内发动经济斗争从而发觉培养积极工人的思路，前期准备过程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着眼于本厂内一次成功的经济斗争的准备会使得革命者不小心滑向经济主义，在长久的准备中看不到成效，造成人员的不断流失。比较好的做法应该以地区性小组为核心，互有分工，长期“扎根”一个地区，在较有条件的厂进厂工作的同时，长期关注本地区的工人斗争事件，跟踪并介入斗争，进行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使得左派在斗争中积累经验，扩大联系，最终能够领导工人运动。

3、 在与工人交朋友以及将工人进一步组织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人组织中时，我们发现单纯的吃喝玩乐或娱乐活动对革命工作本身的帮助是微小的。工人有先进、中间和落后之分，愿意斗争、有较强政治意识的工人往往不是喜爱吃喝玩乐的工人。大多数情况下，交朋友，吃饭聊天对于我们的革命工作都是帮助十分有限，与我们相熟的、能够一起吃饭、喝酒的工友未必能够与我们一起做事。以娱乐、吃饭等活动拉拢来的工人多数大多只是因为喜欢吃喝玩乐。我们社会主义者应当明确自己的目标，如果把大量的工作时间放在交朋友上，那就本末倒置了。

4、 我们发现工人并非没有政治意识，并不是所有工人都厌恶政治话题的探讨。而且工人的政治意识并非有些左派所说的是都是维护现阶段统治的，通过我们的调研以及与工人的接触，我们能够发现有许多工人是对贫富差距大、阶级固化、法律不保护工人等现状不满的（至少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是这样，其他地方可以具体分析），工人的思想是混乱且不成体系的，我们要做的是发掘并发展工人思想中积极的一面。现阶段，我们完全可以与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人并非不能接受。但我们也确实听到有不少工友问“怎么办”的问题，而这是我们没法回答出来的。

5、 通过我们的个体经济斗争实践发现被经济斗争吸引而来的未必是能够进行政治灌输的先进工人，也有可能只是想通过斗争保障自己的利益，但在政治上又趋于保守。我们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解放而斗争，但我们知道不打破旧制度是绝对没有办法真正保障工人的阶级利益的。而有些工人可以认可团结与斗争，却未必会认可社会主义。就好像一场白纸运动会吸引各种政治立场的人，但未必会是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并非政治灌输的前置程序，但是可以是更好地实现政治灌输的和建立工人斗争的必要条件。

6、此外，工人工作的政治路线问题也事关工人工作的成果。关于工人工作本身，各种不同的路线导向的结果也不同，从不同派别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左派对于如何融工是有自己的不同观点的，不同路线决定了组织与斗争的性质、规模与效果。

二、反思：为什么说存在经济主义倾向及改进的方向

工作中的问题让我们开始反思，之前左派强调的进厂思路总结起来有几点：

一是左派强调通过进厂接触工人，通过各种合法组织形式扩大交友范围，但是没有对工人阶级的具象认识，没有看到工人中的先进、中间和落后之区分，不同的组织、交友方式接触到的工人性质也不一样；二是左派强调通过革命者在特定厂长期工作、制造斗争来唤醒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和阶级觉悟，但是没有认识到经济斗争的复杂条件，没有认识到只着眼于个别厂内的经济斗争的发动工作方向反而使革命者在长期的准备工作中陷入了经济主义的窠臼，并在陷入迷茫而出现革命意志的衰退；三是一味强调进厂融工，忽视本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组织建设和理论修养的提高，把理论准备不充分、社会经验不足够的年轻革命者鼓动进厂，忽视其自身的理论修养和政治远见的培养，忽视核心组织理论建设，核心成员对于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现状和我们革命的方向缺乏认识，而厂内的同志更是在工作压力、生存压力和经济主义的工作中逐渐迷茫，开始走向革命的反面了。

这就是我们对上一轮左派融工实践批评为经济主义的原因。当然，有不同想法的，欢迎大家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我们认为：

首先，从政治觉悟来看，工人中有先进、落后和中间分子的区分，在一个地区尚未开展广泛的群众鼓动工作之前，左派人数和精力有限，重点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发掘先进工人，开展先进工人的教育，将先进工人组织起来，为之后群众性鼓动工作做准备。

其次，在利用合法活动和社团上，不应当把扩大和巩固合法社团的工作作为革命工作的重心。而在合法社团的选择上，文化类社团组织的效果好过娱乐类的活动和社团。接触并发掘先进工人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可以直接进厂、比如可以通过调研，再比如可以通过面向工人的娱乐性质的活动或组织。但是既往的左派实践表明，以上方式的接触到先进工人的可能性较小，娱乐活动吸引来的都是喜爱吃喝玩乐的工人。而既有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表明，文化类的活动是接触并发掘先进工人的有效方式，所以不管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小组还是中国共产党小组都是从学校这种文化类的组织开始做起，彼得堡有自己的星期日夜校，长辛店也有工人的劳动补习学校。革命者在工人夜校里不仅教工人识字，也教导工人革命的道理，发掘并培养出最早的先进工人。文化类的活动可以吸引来本来就对时事、读书和讨论感兴趣的工人，在活动的组织中，可以启发工人的意识，让工人实现智识的增长，提高对政治的兴趣，并向工人讲解革命的道理。

意识上的觉醒是工人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的必要条件，革命者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文化类的活动是能给灌输工作提供窗口的活动。

在这里，有些同志会提出疑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时代不同了，目前没有工人夜校可以利用；二是认为现在搞类似于工人夜校的文化类活动存在安全风险。我们认为工人夜校可以利用的空间就是公开进行读书学习等文化类活动，借此传播革命道理，启发工人意识。即使没有工人夜校的名称，换一个名字，也可以开展此类活动，有此类活动空间的组织也可以进行利用。关于安全风险，我们认为现实中确实存在，但是远没有想象中可怖，在网络监管所不能到达的实体空间存在广阔的天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革命工作者需要对敌人的监管技术有足够的了解，了解官方监管的重点是什么，技术是什么，盲点在哪里，做到避其锋芒，求得空间。

但是，文化类社团也是合法社团，只是我们接触先进工人、对工人进行鼓动的一个凭借。我们应该认识到，革命工作任务是提高工人觉悟，而不是本末倒置将重心放在合法社团的建设之上。

列宁在批评经济派的时候也批评过这一点。19世纪末的俄国没有建立革命工会的空间。一些经济派所谓的把工人“组织起来”，就是组织到各种辅助类的合法团体——例如工人储金会中去，列宁对此作了批判，认为“这又是在分散力量，混淆文化主义的活动和革命工作之间的区别”。并提出“革命政党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合法团体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工作，把它们作为进行鼓动的基地，作为建立联系以及进行其他工作的方便的隐蔽所，但是，只能为了这些目的。用社会党人的力量去帮助成立合法团体，是非常不合算的；使这些合法团体具有独立性，是错误的；认为在合法团体中可以‘完全摆脱业主的干预和压迫’，是很可笑的。”（[2]）

再次，从工人运动来看，我们认为革命工作者的目标就是要领导工人运动，将工人运动组织为阶级斗争，这自然少不了学习并进行经济鼓动。但是既往的左派鼓动经济斗争的思路就是长期（三个月、半年、一年多或者三年都有）“扎根”于某个特定的厂，试图在厂内制造斗争并发掘积极工友进行政治灌输。通过长期“扎根”的同志的分享，我们了解到，这些同志在厂里的工作中心就在于“交朋友”、拉圈子、搞文娱活动、学习劳动法、鼓动经济斗争。但是这些工作的效果并不见成效：交朋友、拉圈子只能就近从接触到的人里面拉；搞文娱活动虽然扩大了接触面，但是多是喜爱吃喝玩乐，压迫不深重、政治不觉悟的工人；学劳动法、搞经济斗争，在“扎根”的期间内，争取不到多数群众，条件并不成熟，搞不起来经济斗争。而与此同时，革命者在本厂“扎根”期间，整个区域的工人自发经济斗争却不断涌现，今天这个厂罢工了，明天那个厂有矛盾了，但大多都不在自己所在的厂。最终，厂内工作者在这样长期的以搞娱乐活动交朋友和制造经济斗争为重点的厂内工作中看不到成效，被消磨了革命热情，甚至丧失了革命工作的信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产生了迷茫和动摇。我们认为一定时期内厂内的工作的重点的偏向使得实际工作者落入了不讲政治鼓动，只讲经济鼓动的经济主义窠臼。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进厂经济斗争并非没有成功的个案。成功的个案中，组织者首先都具有丰富的打工和斗争经验，厂内客观条件较为成熟，在厂内的工作时间也比较长，斗争中占有较大的优势。但是这样的斗争在左派融工实践中显得尤为稀少。而即使在成功的经济斗争之后，对工人的政治教育也缺乏方向，一些同志表明成功的经济斗争后组建的一些学习只是在做原著和历史的学习，对于我们革命的方向和诉求并无明确的指引。

可能会有些热心同志为上述思路做辩护，说厂内经济斗争只是一个工作阶段，斗争后还会做灌输，所以不是经济主义。但是既往左派实践来看，左派青年知识分子进厂，长期（三个月、半年、一年多或者三年都有）以厂内经济斗争为重点的结果就是精力被以经济斗争为重心的工作占据。这些工作包括扩大群众面的合法娱乐活动和法律宣传切入的经济鼓动。结果，在多数情况下，不仅本厂斗争条件不成熟、组织不起来，自身的政治学习和小组宣传也没有精力去提高去进行，多数人都在这种没有成效的工作中走向了迷茫和动摇。从融工路线上讲，这就是一种忽视马克思主义宣传、忽视政治鼓动而着眼于合法活动和经济鼓动的经济主义的工作方式。

还有同志出来回应，力图证明自己斗争过，灌输过，力图说明没有把自己经济斗争固定成为一个流程。可是一旦把厂内工作分解为步骤，一旦把经济斗争作为灌输的前面步骤之一，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厂内在一定时间内（1年-3年都是有可能的）没有条件搞斗争，迟迟不能突破经济斗争的步骤，厂内的左派青年的工作重点将长期围绕交友和经济斗争展开，忽视左派青年自身的理论修养提高，忽视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政治鼓动。这就是存在只重视经济鼓动而忽视政治教育和宣传的经济主义的错误。

我们认为，某个地区的革命者在进行经济鼓动时应该着眼于整个地区。我们鼓励左派青年进厂，但是即使是进厂的左派青年，眼光不应该只局限于本厂的工作，而应该在着手本厂工作的同时，注意地区的经济斗争的动向，对有经济斗争发生的工厂做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不断积累经验，成长为一个革命家并领导工人运动。

而在这个过程中，更需要注意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应该同时开展，我们不能忘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曾经我们认为，大多数工人们如果不去进行经济斗争，是很难进行政治教育的，但经济下行的时候，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工人的政治意识是会增长的。那么到底是应该按部就班，先组织广泛的经济斗争，等工人们有了广泛的自发运动之后，再去广泛地谈政治教育和灌输？还是应该从工人政治小组开始做起，在马列毛主义的领导之下，谈论左派的任务和目标，谈论社会主义，并从小组宣传走向鼓动？如果按照前者，是否会让左翼在新冠疫情中的无所作为一样，让我们错失革命时机？我们认为，不应当放低对工人自觉性的要求，或者说，不应当放低对我们社会主义者自己的要求，如果大多数工人只能着眼于眼前短暂的利益，那我们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用理论结合实际来阐述我们的政治任务和政治目的。比如说，当下，大量工厂停工待业，加班也越来越少，工人会迫切要求加班，甚至于有可能发起要求加班的经济斗争，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顺应工人的要求，发展要求加班的经济斗争，还是向工人进行教育，指出来更符合工人利益的应当是缩短工作时间且提高基本工资？后者更为艰难，需要工人们有广泛统一的认识，有一定的组织度，并且这也是讲劳动法讲团结讲斗争没有办法灌输的，甚至于在斗争中，这样的诉求实质上就是与资本主义的制度产生了冲突，有很大概率发展成政治斗

争。我认为，这种正确但不符合工人当下最直接利益的斗争，才是我们应当发展的斗争，为了实现这一点，这就需要对工人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灌输，并且要从阶级长远利益的角度来阐述我们的政治任务和政治目的。

让我们再次用列宁在《怎么办》中对革命者提出的告诫作结，“因此极为重要的是要明确，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多数）在1895-1898年间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即“自发”运动（[3]）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极其广泛的纲领和战斗策略，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既然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最后，在融工过程中，需要有组织有纪律、有远见、理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作为核心。在既有的左派融工实践中，本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建设是决定融工实践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了解到之前进行融工工作的本地马克思主义小组建设存在如下情况：核心组织建设缺乏政治性，缺乏理论争鸣、形势研究等政治宣传工作；本地小组存在关门主义倾向，对外联系少，以安全为由拒绝交流，拒绝进一步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合作。这样的缺点导致本地马克思主义小组开会滑向事务主义的工作，成员理论修养和政治素养得不到提高，缺乏理论争鸣。内部关门主义，缺乏对外交流和碰撞，更缺乏争鸣和理论的提高。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发展工人的政治组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需要我们了解劳动法，了解斗争策略，了解全中国甚至世界的政治，知道各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和策略，要求我们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工人进行说明一切现象。还需要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对工人进行教育，这样的教育是没有办法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做到的。这对于单独进厂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超高的政治素养以及时间精力以及生存压力的要求，因此进厂融工实际上只是工人工作的一个分工，在融工人员的背后，还需要其他社会主义者在政治教育，组织斗争各方面的帮助，也就是说，这需要一个当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才能做到。而面临江河日下的情况，要开展全国范围内地政治鼓动，进一步地需要政党才能做到。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革命组织优先于工人工会组织的建立。列宁在《怎么办》里明确了这一观点：

“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

“而我们如果从建立那种好象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两种目的都实现不了，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泽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

关于为什么革命组织要优先于工会组织建立，《列宁工会思想历史》中已经做了解释，我们不妨做个引用：

“在一般的情况下，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大都经历了先建立工会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道路。但是，在20世纪初，这种传统道路已经不符合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因为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已与早期的欧洲工人运动在主客观条件方面大不相同：俄国资本主义已迅速跨过了工场手工业阶段而进入大机器生产阶段，俄国工人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确立了主导地位，并在俄国得到广泛传播；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与俄国工人运动汇合；俄国也有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小组以及一个形式上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可以不走西方工人运动的“先建工会后建政党”的老路，而可以直接采用西方工人运动的最先进的理论和最高级的组织形式，使俄国工人运动大踏步前进。况且在沙皇专制条件下，工人阶级用经济斗争的手段难以争取到结社、言论、出版等政治权利，俄国工人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展开“统一的阶级斗争”，才能使沙皇政府让步，逐步争取到各项政治权利。因而，对于当时的俄国工人运动来说，既要争取建立工会，又要建立革命政党，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革命政党。列宁号召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社会民主党小组，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和真正建立社会民主工党这一任务上来。”

三、针对经济主义的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做了些尝试，也试着学习了一些曾经的经验，由此形成了我们新的工作方法。

1、在合法活动和社团的利用方面，我们利用文化类的社团接近群众，并将之作为工作的依托，而不是本地工作的重心。我们开办了“工人夜校”。我们开始主要与工人们谈论政治事件，而不是主要讨论“劳动法”，“如何维权”等等，并直接利用政治事件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样一来，我们交流的尺度就大了很多，不会再局限在工厂的斗争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抛弃了工人政治意识的“阶段论”（即政治教育必须在经济斗争之后才能进行），认为当下的工人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政治鼓动的。经过了我们的一些实践，也确实可行的，甚至于当我们尝试举办一些文娱活动的时候，有工人会主动说：“我们不是想要参加这些娱乐活动，我们就是为了了解这些政治性的东西来的。”同时，在与工人交流政治事件的时候，我们不会仅停留在政治揭露，我们会积极地发动工友们讨论该怎么办，而我们自己也会直接地提出社会主义观点地解决方法。（至于安全就是另一个技术问题了）

2、在工人经济斗争方面。有了工人夜校，对于一些特定工厂之外的工人，我们也能够定期进行交流，发现矛盾。工人夜校是一个初步的筛选，我们尝试让有政治意识的工人们聚集在我们身边。而对于有政治意识且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工人，我们会尝试进一步组织出工人的政治小组，并发动参与的工人们进行详细的厂内调研，观察厂内矛盾，以了解区域内各厂的情况，为随时介入并领导区域内经济斗争做好准备。

3、关于工人的秘密组织。我们希望能学习《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书中的经验，先组织一个工人政治小组，对先进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托工人核心组织开展鼓动，领导并促进广泛的经济斗争，锻炼工人阶级并扩大影响力。是的，我们说我们要优先政治教

育和政治鼓动，但不代表我们忽视经济斗争的作用，经济斗争能够吸引工人当中的中间派，并把先进工人锤炼成革命家。假如爆发了自发的经济斗争，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工人小组，那我们必然没办法获得自发运动的领导权，只能任由本该属于工人的斗争果实被中层管理人员篡夺（这也是自发的工人运动的共性），工人们政治意识与政治组织也没有办法发展起来。

总结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工作的总结与反思，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我们频道在创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主义。近来看到左派对于如何融工的问题有了广泛的讨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甚至于“到工人中去”也开始一再强调自己是做了政治灌输的，也欢迎有融工经验的同志们投稿分享。

[1] 到工人中去，《我们是怎样进行融工的？——兼谈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的关系》

[2] 1899年，基辅委员会起草了一份传单——《宣言书》。列宁认为其内容有很多地方和经济派的《信条》相同，表明了基辅委员会的机会主义观点，于是写下了《论〈宣言书〉》一文进行批判。宣言书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要帮助成立储金会”。列宁认为这个关于合法社团的观点是狭隘的。

[3] 在《怎么办》中，列宁对比了俄国60、70年代工人以“骚乱”形式表现出来的工人抗争和90年代以“罢工”形式表现出来的工人抗争后，认为90年代俄国工人进入了与资本对抗的有组织的斗争阶段，这正是俄国“自发”运动开始的阶段。工人阶级抗争从骚乱走向有组织罢工这种发展也是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规律，中国改开以来工人运动进入有组织罢工的“自发”运动应该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发生的。

新十月的先生们究竟想做什么？

革社（RSF）编辑部

最近，新十月频道发表了《融工分享——我们是如何进行融工的？》一文，这篇文章的可谓是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引起了许多组织的同志们的重视。

统一战线多个组织的多位同志们在第一时间对这篇“著作”做了探讨，虽然产生了分歧，但我们大部分组织和同志们还是不认可这篇“著作”，并提出了许多的问题。这篇文章在一些次要的方面固然提出了一些还不错的观点，比如“工人有先进、中间和落后之分”等，但这不能掩盖他在其他方面的一塌糊涂。本篇文章把之前新十月的离火先生在《去进行政治灌输吧》中的错误继续扩大，提出许多迷惑性强但实际严重错误的观点，这是我们本文接下来要一一指出的。

除此之外，本篇文章的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错误的类比了不同的历史条件，机械主义的代用了俄国二十年代的革命条件到今天的中国。在具体的重要观点方面，作者完全没有区分厂内的革命分子和一般群众的区别毫不重视厂内的革命组织工作和厂内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工作，更区分不出职业革命家和今天的革命分子的区别，把革命分子的工作和职业革命家的工作混为一谈，抛弃了群众工作。另外一方面，本文还非常模糊和大致的提出了他们的工作成果作为证明（主要是工人夜校），这个成果可谓是让人震惊！足以说明新十月的先生们的工作已经全面的超越了我国自“佳士”到今天的包括“到工人中去”等正在融工的所有左翼组织的线下工作成果。但在这些成果中涉及到革命分子个人具体工作和以及如何通过实践证明这些观点和完成这些成果的地方完全没讲清楚，对于这种“工人夜校”的现实性更是谜底重重，难道新十月先生们不想我国的革命分子们学习一下吗？

按照统一战线各组织中有工人工作经验和正在进行线下工作的同志们的经验来看，以及新十月的先生们在这篇文章的种种模糊的说法，这些工作成果是很可疑的。我们相信任何理性的从今天的工人生活状况和工人普遍实际觉悟水平、以及革命分子的工作条件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人都能察觉到这个成果报告的有许多不靠谱的地方，完全不能够为其观点作证明，也完全不能够证明是我们现在的一般条件能够做到的成果。也就是说，我们怀疑新十月的先生们现在的文章有水分，为了否定“到工人中去”和扎根工厂的路线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在本文中使用了夸张的做法。

继续否定“到工人中去”同志们的工作、继续否定厂内扎根、做错误的类比、可疑和模糊不清的工作成果。在这种时候，共产主义应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所以本文采用了这样的标题“新十月的先生们究竟想做什么？”希望新十月的先生们能够解释清楚我们以上的质问，并说明自己的目的。

一. 调研的问题

新十月的先生们首先提出了“调研可以由厂外的同志在工业区进行的，可以了解该工业区的主要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思想状况。”

在后面的内容中他们提到了这种调研的一些效果和遇到的情况。但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调研是怎么做到的，今天不去厂内进行劳动来养活自己的专门的调研者的基本生活开支由谁来承担？他经济来源是什么？这种调研者是怎么采访到这些工人的，在普遍进行996工作制度和严格管理工人活动的我国工厂中，工人活动闲余时间极其狭小、并且活动空间也极其狭小的，这些调研者目前是怎么调研这些工人的？这些问题我们还不得而知。

然后是关于新十月调研遭遇的问题。

“首先是工人并不会信任只有一面之缘的我们”，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然后后文又说“我们已经数次听到工人说‘要是革命我一定参与’或者直接骂共产党等的话，”这是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哪怕是厂内的工友，都不一定会向彼此说这样的话，工人会向陌生人这样的倾诉是普遍的情况吗？我们还知道在后文中，新十月的先生们把俄国二十世纪初的革命环境代用到了我们今天一般情况中来，难道这说明我国工人运动的浪潮突然高涨了吗？

那我们就再一次引用实际数据来说明：

在这八年所有工人运动的诉求中，欠薪讨薪类的运动就占 10343 起，占比 79.93%。其他的原因诸如加班、社保公积金、迁厂关厂、经济补偿金、裁员、社保等等加起来也只占 20.07%。无论怎么看，我国现在阶级斗争的性质都是经济斗争，还没有政治斗争的一点点地位。

从规模而言，其中有 10984 起都是 1 到 100 人的小规模运动，占比 84.89%；101 人到 1000 人的中等规模的罢工有 1786 起，占比 13.8%；超过一千人的只有 164 起，占比 1.27%。还有 3 起运动没有查到规模。所以，从我国工人运动的规模而言，小规模运动仍然是主流，超过一百人的中等运动则少见，而超过一千人的较大规模的运动更是稀少无比的。但从总的规模来说，八年发生了 12940 起工人运动，相比我国 7.33 亿就业人口来说，工人运动还是很少见的现象。按照大多数规模不超过 100 人而言，就算都按 100 人算，八年内只有 129.4 万人次参与了工人运动，就算乘以 50，也对我国 7.33 亿就业人口来说还是非常稀少的现象。工人运动不管是从规模还是数量上来说都是远远不足的，129.4 万人次只占我国就业人口的 0.17%而已，这还是用八年的总数来统计的，就算真实情况要比这个多得多，每年参与斗争的劳动者也应该难以超越 1%很多。如果拿历史上的数据做对比，1922 年 1 月到 1923 年 2 月，在持续的 13 个月里，当时全国发生大小罢工 100 余次，参加人数在 30 万以上，而这个时期中国只有 200 万工人，当年就有 15%的工人参与了罢工。1900 年俄国工人数量为 205 万人，1905 年全俄政治大罢工就有 200 万人参与，算是整个俄国工人阶级都被调动了起来。我国今天的无产阶级占全国劳动者比重的 61.3%-86.6%之间，取中间数则是五亿多工人，这样一看我们就能知道我国今天的工人运动距离革命时期还差多远了。

-革社（RSF）第三期月刊《我们今天离革命的距离和革命的组织工具》

从 2023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2 日期间发生的工人群众运动，我们收录了总计 185 起，比上月的 194 起略有减少，其中参与人数超过 100 人的有 23 起，比上月的 39 起明显减少，这个月的工人运动出现了减弱的趋势。

地区分布也出现了明显变化。以往占据绝对多数的广东省，在本月仅发生了 29 起，不足总数的六分之一，较上月发生在广东省的 72 起有了显著下降。山东省则出现了大幅增长，本月发生了 21 起。其余省份在本月发生的工人运动数量分别为：河北 12，湖北 10，河南 9，福建 8，山西 7，黑龙江 7，陕西 7，四川 7，辽宁 6，江苏 6，北京 6，天津 5，广西 5，重庆 5，吉林 5，江西 5，上海 4，新疆 4，湖南 4，浙江 3，贵州 3，甘肃 2，云南 2，海南 2，安徽 1。广东省的数量占比大幅减少，而总数减少的幅度并不大，这反映出除广东省以外，其他地区阶级矛盾的激化。

从行业分布来看，建筑业发生了 116 起，跟上月数量相比几乎没有变化，仍然是工人运动最主要的领域。制造业发生了 34 起，比上月的 48 起有小幅下降。其余行业的工人运动数量如下：服务业 21，交通运输业 8，教育业 4，文化娱乐 1，林业 1。从企业性质来看，民营企业发生了 113 起，国有企业 63 起，与上月数据基本一致。而外资企业发生 2 起，港澳台资企业 2 起，事业单位 3 起，中外合资企业 2 起，比上月有所减少。

工人群众采用一般的传统方法进行抗议游行来维权的有 138 起，占总数的 74.5%，比以往有所下降。而采取静坐抗议的有 48 起，比上个月的 21 起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是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选择以静坐的方式来争取权益。进行罢工的有 24 起，比上月的 60 起大幅减少，仅占总数的 13%，阻塞交通的有 6 起，威胁跳楼的有 2 起，这反映出工人群众运动的激烈程度在本月有了明显的减弱。此外，联系媒体的有 14 起，要求劳动司法机关介入的有 12 起，上访的有 5 起，申请仲裁的有 1 起，寻求不同部门的援助、争取扩大影响力、获得更多群众的支持，仍然是工人维权的重要方式。工人群众的主要诉求还是在经济方面，其中要求解决欠薪问题的有 173 起，迁厂或关厂问题的有 14 起，要求经济补偿金的有 10 起，要求加薪的有 1 起，要求解决社保问题的有 2 起，要求管理层监督的有 4 起，要求提高加班待遇的有 1 起，要求解决裁员问题的有 1 起。

-革社（RSF）第八期月刊《2023 年 9 月中上旬到 10 月中上旬工人运动的趋势》

结果可以看出在目前一切的工人运动中，经济斗争都还是工人运动的绝对主流，至少目前还未有政治斗争的任何一点地位，也就是说我国工人阶级到目前还是没有政治斗争和革命的思想，这是现实条件，不是用空想和生搬硬凑的条件可以代替的。并且如果以一个劳动者或一个对现实情况有基本了解的人的实际经验或理性思维来看，能对陌生人大谈要参加革命和辱骂共产党的工人在今天的条件下绝对是非常罕见的或者是很难当真的玩笑话。

并且就算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不能把工友的一时口舌之快当成政治觉悟的体现了。做群众工作也要注意这一点，不论是对工人还是白领、学生，不能一听到他说了一些口头上的东西就马上引为同志，还要更具体地观察他的品质和在事务上表现出来的路线。

凡此种种，以上这些做法只能说明新十月同志们的调研结果的真实性的有问题，或者说夸大了调研的成果。

二. 书呆子的反思

在说了以上情况之后，新十月的先生们就提出了新的情况，说“通过一场个体的经济斗争发现了一些有斗争意识的工人，并在跟进过程当中能发现他们是有工联意识”。但大部分工人又对劳动法不感兴趣，认为“劳动法没用”等。今天的作为社会人群中占极少数的革命分子都知道劳动法没用，但今天的广大工人是否认识到劳动法没用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新十月的先生告诉我们，今天具有工联主义的工人认为“劳动法没用”，那他还是工联主义的工人吗？

然后新十月告诉我们有的工人“信仰镰刀锤子”，有的人没有这个意识但会问他们怎么“该怎么做”。以至于达到了这样程度“我们该如何对工友做政治灌输？这个度在哪里？如果工人们已经有了政治意识，我们哪怕与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似乎都不能满足他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们说清楚该怎么办？”

但本文后面却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现实行动的问题，确实只是提出了厂外融工、工人夜校、本地小组和革命家组织等长期路线和工作方法的问题。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做法呢？

我们先不去说新十月同志们的这些说法可信不可信，我们先假设他是完全真实的。在工人们认为劳动法没用、政治灌输不够、问你们想怎么办时，新十月的同志们在反思自己的路线。这就忘记了革命者最基本的工作，即参与现实的斗争。虽然我们认为新十月提出来的这个情况可能是目前很难遇到的，但就算真的出现了这种无论怎么用劳动法和政治宣传都不够满足工人的情况时，我们第一时间想到也应该是用斗争来满足工人。即组织这些工人进行斗争来

争取满足他们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这种斗争既有可能是经济斗争也可能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更能够使工人得到成长，更能够完成我们今后的一切经济的或政治的任务。

然而此时的新十月的同志们还在反思这是太“经济主义”了的缘故。然后就开始往长期的和未来的问题思考了，但恰恰忘了眼下的斗争需要。如果真如新十月的同志们所说的情况，我们的第一个反思应该是当时我们为什么没有组织群众去进行斗争。

所以我们看到了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在需要斗争的时候组织工人进行了斗争。而新十月的同志们遇到了他们自己所说的那种工人问他们该怎么办、怎么给工人宣传劳动和政治灌输都不够的情况时却恰恰忘记了斗争。当火烧到新十月的同志们的屁股时，他们还在坐下来慢慢思考这火要怎么才能灭掉，正在灭火的人的灭火方式是不是有问题。

当“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组织工人进行斗争的时候新十月的同志们还在当书呆子般的思考对方和自己以前是不是太“经济主义”了。的确，你们是太“经济主义”了，“经济”到就连眼前的斗争都忘记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十月从一开始放给“到工人中去”的“经济主义”的箭结果都插到了自己身上，而且是那种最严重的经济主义，即不在工人需要斗争的时候组织进行斗争的经济主义。甚至可以说这是投降主义的做法。

三. 所谓的初期工作思路的问题

新十月在“初期的工作思路及具体问题”部分中说到“先调研，对一片工业区有初步的了解，决定重点要接触的工人是哪些，又是要进哪个厂。”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新十月的同志并没有提到结论，所在工业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要进厂的工厂情况是怎么样的？到工人中去此前的文章对这些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工时、工资、待遇等基本情况，阶级结构和矛盾分析而新十月的同志并没有就此做出任何说明。文章中提到过几次“个体经济斗争”，那么这个个体经济斗争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文章中也并没有说明，要知道在左派眼里，参与融工过程中任何的经济斗争都是值得观察和记录的，就现阶段而言，到工人中去的文章对这些也是有详细说明的，但新十月的文章中也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的说明。

新十月的同志们说他们这个时期的方法和到工人中去频道所提倡的工作方法是同样的，所以他们也大致这样说“之后是交朋友，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个过程中，如果认识的工友能够接受政治灌输，那我们就进行灌输，他还不能接受政治灌输的，我们用讲劳动法，讲团结，讲斗争的方法来发展他们。第三步是进行斗争，争取权益，在这个基础上让一些左右摇摆的工人们更认可我们，并尝试进行政治灌输。”。

但我们已经知道了，新十月的调研工作做得没有到工人中去彻底、我们没有看到新十月有和“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同样程度的调研，甚至在关键时刻忘记了组织工人们进行斗争，这怎么能说和“到工人中去”的方法一样呢？这不是恰恰阉割掉了最重要的部分吗？学生不按老师的方法去尝试做同样的工作，就急忙忙的说老师的方法有问题。

然后新十月的同志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调研只是工作的第一步，更进一步地需要将工人组织起来。”

“进某个厂长期做普工对于该厂内的经济斗争的发动、工人政治组织的建立以及政治灌输并非最有利的方式。”

认识到需要组织是对的，但是又恰恰忘记现实的组织条件。新十月认为不需要进厂做工人，但工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广泛性组织，那么工人任何有组织的斗争都是发动不起来的（包括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所以最缺乏组织工作的地方，新十月恰恰否定了，认为普工只能受限

于工作条件只能宣传很少的工人，但他们忘记了，如果在厂外工作宣传工人也是困难的，而要在厂外广泛的组织起工人那就更加不可能了。所以他们关注于长期工作和扎根工作中的种种弱点，而又选择性的忘记了间歇性工作和厂外工作更严重的问题以及产内工作在今天工人工作的第一性问题。

所以，像这样的内容：“在此期间着眼于本厂内一次成功的经济斗争的准备会使得革命者不小心滑向经济主义，在长久的准备中看不到成效，造成人员的不断流失。”更是没有道理的指责。难道厂内的工作除了准备经济斗争外，组织工人的工作和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工作就不必要了吗？在这样的工作中即使在没有斗争的时期，人员也可以做到增加而不是减少。只有怀着只想立即搞出事情而讨厌做长期组织工作的小资产阶级急躁病分子才会看不到经济斗争的成效就流失。也就是说不想扎根的人就会流失，如果用排斥去做扎根工作的融工观和急于求成的思想来看融工问题，那么一切融工工作都是不能扎根的。而如果从现实的条件来考虑，要达到马列毛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非得先从合格的扎根工作开始不成。

在“初期的工作思路及具体问题”部分中第三点说到，“工人有先进、中间和落后之分，”这是对的，然而在第四点中，又说工人并非没有政治意识，“并不是所有工人都厌恶政治话题的探讨”，这其实是自相矛盾或者重复的，既然“工人有先进、中间和落后之分”，那就和“并不是所有工人都厌恶政治话题的探讨”是一样的，第四点后面又说，“我们能够发现有许多工人是对贫富差距大、阶级固化、法律不保护工人等现状不满的”，那么这个“许多”占的大致比例是多少？既然前文说了“工人有先进、中间和落后之分”，后文也说发现许多工人对现状不满，那为什么不再进一步，通过调研总结一下工人中三个成分所占的大致比例呢？新十月的同志并没有贯彻第三点谈到的问题。最后又遇到这个他们没有办法回答“怎么办”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是光用嘴巴答不出来的，是用进行斗争的行动答出来的。

后面的第五点说到，“通过我们的个体经济斗争实践发现被经济斗争吸引而来的未必是能够进行政治灌输的先进工人，也有可能只是想通过斗争保障自己的利益，但在政治上又趋于保守。”这里也可以看出新十月的同志并没有贯彻第三点的观点，并且对工人的觉悟期待过高，哪怕是工人中的先进部分，现阶段而言，他们能参与经济斗争就是好事，就是在向前走，如果他们现在就能明白政治斗争的重要意义，那还要共产党人干什么呢？那左派还呼吁融工干什么呢？这些工人恰恰是我们需要通过现实的斗争组织和团结起来，然后通过长期的政治教育来改善他们的思想的。新十月的同志是有些左倾错误的，就像他们此前对到工人中去的经济主义批判上一样，也像下文对存在经济主义倾向的反思一样，由于文章并没有详细记录所谓的“个体经济斗争”，下文所说对存在经济主义倾向的反思也显得不知所云，难道进行了经济斗争就等于经济主义吗？为什么组织工人进行了政治教育、组织工作、并进行了经济斗争的“到工人中去”的路线是经济主义的，而有以上问题的新十月就不是经济主义了呢？

关于“初期的工作思路及具体问题”第六点的说法，我们认为还需要补充，除了正确的路线外，还需要正确的工作，否则路线就是永远是空的。

四. 错误的反思

工作中的问题让我们开始反思，之前左派强调的进厂思路总结起来有几点：一是左派强调通过进厂接触工人，通过各种合法组织形式扩大交友范围，但是没有对工人阶级的具象认识，没有看到工人中的先进、中间和落后之区分，不同的组织、交友方式接触到的工人性质也不一样；二是左派强调通过革命者在特定厂长期工作、制造斗争来唤醒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和阶级觉悟，但是没有认识到经济斗争的复杂条件，没有认识到只着眼于个别厂内的经济斗争的发动工作方向反而使革命者在长期的准备工作中陷入了经济主义的窠臼，并在陷入迷茫而出现革命意志的衰退；三是一味强调进厂融工，忽视本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组织建设和理论修养的提高，把理论准备不充分、社会经验不足够的年轻革命者鼓动进厂，忽视其自身的理论修养和政治远见的培养，忽视核心组织理论建设，核心成员对于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现状和我们革命的方向缺乏认识，而厂内的同志更是在工作压力、生存压力和经济主义的工作中逐渐迷茫，开始走向革命的反面了。

如果泛泛而谈的说这三点对于许多还没有融工的经验的同学来说的确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他又没有局限于泛泛而谈，如果参考具体情况，具体指向新十月一向热爱批判的“到工人中去”的情况来说的话，就没有什么进步意义，甚至还继续污蔑了对方，也就是所谓的虚空打靶。拿现在融工工作走在前列的到工人中去举例，虽然他们文章中没有明说工人中思想先进中间落后的区分，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是这样做的，在发展工友的时候当然是以有先进思想的优先，他们对积极的工人展开政治教育，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看到工人之间区别等等。并且排除所谓吃喝玩乐的工人是错误的做法，工人在工厂中的工作是很累很消磨精神的，工人们在一定限度内吃喝玩乐放松一下不是正常现象吗？我们不能现在就去强迫工人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只能逐步的教育和改变他们的生活变好。如果要团结起大量的工人参与斗争，我们就不应该放过每一个工人，如果是要进行革命分子的组织工作，我们才对工人进行严格的筛选，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要构建两种不同的组织，但都是我们要做的。在这里新十月的同志没有区分出革命组织和工人群众以及构成这两种组织的工作。

第二点中，“没有认识到只着眼于个别厂内的经济斗争的发动工作方向反而使革命者在长期的准备工作中陷入了经济主义的窠臼，并在陷入迷茫而出现革命意志的衰退”这个类似的观点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我们有了批判，故不在重复。

第三点的问题，呼吁进厂融工和本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建设不冲突，厂内的组织也不同于厂外的组织，工人自己的组织只能是扎根于厂内存在的、而不是厂外的。厂内的工作也不止是经济主义的，也有政治的内容，有艰苦的革命组织和工人组织工作需要革命分子去作。而后面说的鼓动经验不足年轻人进厂，这个问题提出来指导意义并不大，不能够用来作否定进厂融工的必要性。就要参与融工的分子的问题来说，有条件的融工的就去融工，没有条件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完全不用去融工，但知识分子和学生不应该以此否定需要革命分子去融工的必要性，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正常的同志都知道不能这样草率盲目的鼓动同志融工，要根据同志的具体情况而来，有少数幼稚的泛左派会犯这个错误，但这是比较明显的错误，没有必要放到对所谓左派融工思路的总结上来，它不占主流也不是目前最先进的思路。

五. 文化社团的问题

其次，在利用合法活动和社团上，不应当把扩大和巩固合法社团的工作作为革命工作的重心。而在合法社团的选择上，文化类社团组织的效果好过娱乐类的活动和社团。

这个话的确是有部分道理的，如果在有选择的条件的情况下，如果以团结进步工人的工作方向来看，那么我们也的确应该选择比娱乐活动类社团更能帮助到我们的文化社团。但很多时候事实往往也没有那么简单，首先我们需要两种组织工作，第一是组织起进步工人的革命组织工作，第二是组织起绝大部分工人的工人组织工作。在第一部分上我们需要找到进步的工人，在这一个方面来说可能更需要文化类社团一些，但如果反过来情况就不同。其次，每个厂区的情况都大不相同。有的时候能利用的合法条件不是由我们决定，这个很多人也知道，在如台资工厂或一些中小工厂中，娱乐社团都是普遍缺乏的，能利用的文化类社团更是罕见的现象。在这个情况时我们只能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就利用起来，也要避免过度挑剔不存在的条件的情况。

接触并发掘先进工人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可以直接进厂、比如可以通过调研，再比如可以通过面向工人的娱乐性质的活动或组织。但是既往的左派实践表明，以上方式的接触到先进工人的可能性较小，娱乐活动吸引来的都是喜爱吃喝玩乐的工人。而既有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表明，文化类的活动是接触并发掘先进工人的有效方式，所以不管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小组还是中国共产党小组都是从学校这种文化类的组织开始做起，彼得堡有自己的星期日夜校，长辛店也有工人的劳动补习学校。革命者在工人夜校里不仅教工人识字，也教导工人革命的道理，发掘并培养出最早的先进工人。文化类的活动可以吸引来本来就对时事、读书和讨论感兴趣的工人，在活动的组织中，可以启发工人的意识，让工人实现智识的增长，提高对政治的兴趣，并向工人讲解革命的道理。

新十月的同志们没有说明清楚这里的文化类活动或者说这种文化类组织究竟是在厂内的还是在厂外的。如果在上一段的讲述利用文化类社团的情况的话，这种组织就是厂内的组织，场内的组织就一定要厂内的同志和其他工人们来完成这种工厂，而厂外情况则有所不同。而后面大段讲述了这种文化社团的作用和他的地位的时候也没有给我们讲清楚这一点。

所以新十月的先生这里一边反对“到工人中去”的读书是只是马列毛名著的经典，达不到效果。另一边又提出了文化社团，实际的上是做同样工作的东西。但这个文化社团也是，我们知道这是为了否定“到工人中去”在《一种公开和秘密结合做工人工作的方法》中关于如何建立、发展和利用工人轮滑队的经验。最后这个文化社团在后面似乎就变成了工人夜校。

六. 反扎根的问题

再次，从工人运动来看，我们认为革命工作者的目标就是要领导工人运动，将工人运动组织为阶级斗争，这自然少不了学习并进行经济鼓动。但是既往的左派鼓动经济斗争的思路就是长期（三个月、半年、一年多或者三年都有）“扎根”于某个特定的厂，试图在厂内制造斗争并发掘积极工友进行政治灌输。通过长期“扎根”的同志的分享，我们了解到，这些同志在厂里的工作中心就在于“交朋友”、拉圈子、搞文娱活动、学习劳动法、鼓动经济斗争。但是这些工作的效果并不见成效：交朋友、拉圈子只能就近从接触到的人里面拉；搞文娱活动虽然扩大了接触面，但是多是喜爱吃喝玩乐，压迫不深重、政治不觉悟的工人；学劳动法、搞经济斗争，在“扎根”的期间内，争取不到多数群众，条件并不成熟，搞不起来经济斗争。而与此同时，革命者在本厂“扎根”期间，整个区域的工人自发经济斗争却不断涌现，今天这个厂罢工了，明天那个厂有矛盾了，但大多都不在自己所在的厂。最终，厂内工作者在这样长期的以搞娱乐活动交朋友和制造经济斗争为重点的厂内工作中看不到成效，被消磨了革命热情，甚至丧失了革命工作的信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产生了迷茫和动摇。我们认为一定时期内厂内的工作的重点的偏向使得实际工作者落入了不讲政治鼓动，只讲经济鼓动的经济主义窠臼。

新十月这段话的问题在于他融合了许多偏见的地方，他为了反对他们的偏见而又把正确的内容给否定了。正如我们在《关于“扎根”的线下组织工作路线的问题》所谈及的那样：“两者都是错误的，但对扎根的理解可谓是完全不同；前者是根本的反对扎根的观点、根本的反对以到工厂中去为主的融工路线，后者是实际的违背了自己的观点、从实际工作上和实际行为上背叛了自己以前提出来的路线。所以，布站老管理和离火先生（新十月）各自谈的“扎根”是完全不同的内容。”布站的老管理提出了错误的扎根方法，并且自己也没有付诸行动。我们也反对这一点。但新十月的反对方法是倒退一步，彻底的反对扎根，甚至把布站老管理的问题和正在实践的“到工人中去”混在了一起反对，也反对了革命分子需要扎根工厂本身的行为。

然后他们其他同志的分享得知这些同志只是扎根在工厂搞经济活动，而且不见成效，搞文娱活动但又吸引的是落后工人，学习劳动法和搞经济斗争又争取不到群众搞不成经济斗争，最后往往错过了附近工厂的矛盾还“丧失了革命工作的信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产生了迷茫和动摇”“实际工作者落入了不讲政治鼓动，只讲经济鼓动的经济主义窠臼”

这里的大部分内容显然是和“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的经验相反的。“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搞出了经济斗争，吸引了许多工人，也通过政治教育等工作发展和组织了一些进步工人，他们在长期的扎根工厂的工作种也没有产生像新十月的先生们一样的情绪。并且这整段和“到工人中去”完全相反的实践结果是根据“通过长期‘扎根’的同志的分享”而得知的，这种证明是无力的。如果新十月想要反驳“到工人中去”的实践经验，那应该拿出切实的，最好是对等充分的材料来证明。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进厂经济斗争并非没有成功的个案。成功的个案中，组织者首先都具有丰富的打工和斗争经验，厂内客观条件较为成熟，在厂内的工作时间也比较长，斗争中占有较大的优势。但是这样的斗争在左派融工实践中显得尤为稀少。而即使在成功的经济斗争之后，对工人的政治教育也缺乏方向，一些同志表明成功的经济斗争后组建的一些学习只是在做原著和历史的学习，对于我们革命的方向和诉求并无明确的指引。

这里的“个案”应该就是针对“到工人中去”同志们的实践了。新十月用前面“通过长期‘扎根’的同志的分享”的情况来说，这些实践和斗争是不能成功的，然而面对“到工人中去”成功的事实就把他说成是“个案”。然后说明这些个案是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条件，在新十月的先生们自己列出来的条件中：“成功的个案中，组织者首先都具有丰富的打工和斗争经验，厂内客观条件较为成熟，在厂内的工作时间也比较长，斗争中占有较大的优势。”恰恰大多数是需要革命分子扎根工厂才能够达到的。

然后新十月的先生们又缩小了“到工人中去”政治工作的意义，说他们只是“一些学习只是在做原著和历史的学习，对于我们革命的方向和诉求并无明确的指引。”他们忘记了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也发展出了优秀的进步工人分子，做了一定的组织工作，并且这些力量可以参与到未来更广泛的革命事业中去。

那么该怎么办呢？我们也知道新十月的先生们之前指出来的方法里有什么呢？利用工厂合法的文化社团和文化类活动。“文化类的活动可以吸引来本来就对时事、读书和讨论感兴趣的工人，在活动的组织中，可以启发工人的意识，让工人实现智识的增长，提高对政治的兴趣，并向工人讲解革命的道理。”那么这个内容是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没有做过或者通过他们的方法做不到的吗？显然不是这样。新十月的先生们否定和歪曲了“到工人中去”工作成果的意义，并把人家工作的意义缩减为只是经济主义的，然后自己提出了一个和人家现有工作成果之一所要达到的结果差不多的工作方法并认为这是更好的方法。包括之后提出的“工人夜校”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新十月认为扎根工厂路线的经济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偏见所造成的。所以新十月在之后继续泛泛的谈扎根工厂路线的经济主义。

还有同志出来回应，力图证明自己斗争过，灌输过，力图说明没有把自己经济斗争固定成为一个流程。可是一旦把厂内工作分解为步骤，一旦把经济斗争作为灌输的前面步骤之一，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厂内在一定时间内（1年-3年都是有可能的）没有条件搞斗争，迟迟不能突破经济斗争的步骤，厂内的左派青年的工作重点将长期围绕交友和经济斗争展开，忽视左派青年自身的理论修养提高，忽视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政治鼓动。这就是存在只重视经济鼓动而忽视政治教育和宣传的经济主义的错误。

厂内的工作者在没有斗争的时期完全可以进行组织工作，对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政治鼓动都是厂内工作的一部分，不能泛泛谈没有这么做的情况来否定工厂里能做这个工作的可能，毕竟“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就做了这样的工作。所以认为扎根工厂一定是经济主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几乎所有的工人斗争都还是经济斗争，如果不参与经济斗争那就等于说不要参与现在的一切工人斗争。不参与现有的一切斗争，而只是准备搞还未到来的政治斗争，那政治斗争就永远不会到来，那才是真正的经济主义。所以，现实的经济斗争我们也应该参与，并利用经济斗争来发展一切政治斗争的因素，这样才能够现实的准备起未来的政治斗争。因为政治斗争的条件应该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性、组织性、觉悟性，这种条件只有通过扎根工厂的路线来达到，只有通过厂内坚固的进步工人的组织工作和广泛的工人组织工作来提高组织，通过长期的组织工人一同斗争和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来达到。如果认为在厂里的同志进行经济斗争是经济主义，那么就等于说我们不要进行现在的斗争。

七. 组织工作的问题

我们在全文中可以看到，虽然新十月的先生们在有的地方认识到了革命组织和工人组织区别。但又在很多地方搞混了。在反思进厂思路和文化社团的地方就没有区分出来，认为娱乐社团只是接触了更多的工人但没有办法区分出优秀工人，又把到工人中去的工作贬低为经济主义的。说明对于现实的工厂内的组织工作，新十月的先生们是没有区分出这两种组织工作的，也没有意识到这两种工厂内部的组织的重要性。并且他们实际上又把革命组织和革命家组织弄混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问题：

我们认为，某个地区的革命者在进行经济鼓动时应该着眼于整个地区。我们鼓励左派青年进厂，但是即使是进厂的左派青年，眼光不应该只局限于本厂的工作，而应该在着手本厂工作的同时，注意地区的经济斗争的动向，对有经济斗争发生的工厂做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不断积累经验，成长为一个革命家并领导工人运动。

某个地区的革命者即使在这个地区组织了起来，如果没有各个工厂中扎实的工人组织工作，这个鼓动的设想也还是做不到的。我们很难想象工人没有在工厂内被革命者较广泛的组织起来的条件下，怎么被厂外的革命者普遍和有效的鼓动起来。如果没有指出这两种现实的厂内组织的普及为依据，厂外鼓动整个地区的工人就是没有现实根据的设想。

但后面新十月的先生们又重视起革命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区别了，但他是通过厂外的方面来重视的，所以他们提出了“本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设想。但我们要说明的是，这种本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如果没有厂内组织的坚实基础，他的一切工作效果是不能够实现的，并且脱离劳动的人的经济来源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并且他们实际上又把革命组织和革命家组织弄混了，他们这里提到的是革命组织，但是引用列宁的话却是革命家组织。

所以我们要为大家解释这个区别：

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

—列宁《怎么办》

在组织方面，正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聪明人”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至于他们是从学生中还是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因此我认为：

- （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
- （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
- （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
- （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
- （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

—列宁《怎么办》

他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经验和技能，他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知识，他亲眼看见其他地方和其他政党的卓越的政治领袖，他自己也力求提高到同这些领袖一样的水平，力求做到既了解工人群众，又具备新鲜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也具有无产阶级在同训练有素的大批敌人作顽强斗争时不能没有的专业技能。倍倍尔和奥尔一类的人就是这样并且也只是这样从工人群众中选拔出来的。但是，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多半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却应当由我们的组织来有步骤地进行。凡是有些才干和“有希望的”工人鼓动员，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 11 个小时的工。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使他随时更换自己的活动地点，否则他就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不能同宪兵至少周旋几年之久。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广愈深，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有才干的人也就愈多，不仅有有才干的鼓动员，而且有有才干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褒义的“实际工作者”（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在我们那些多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支队伍，因为这支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信任。我们真正的过错，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走上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专业技能的道路，却经常用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的愚蠢议论来把工人拉向后退。

一 列宁《怎么办》

按列宁的定义来说，正式的革命家组织，自然是以革命为第一目组织目的的组织；并且他的成员是以革命为个人职业，靠无产阶级或者其他需要革命的群体的经费养活着的组织，其成员也是被这样养活着的。但使这种组织普遍出现的现实性条件只能是足够的厂内工人组织的基础。并且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列宁的阐述里，这种领导现实工人运动的职业革命家往往也是从广泛工人运动中踊跃出来的，工人参与斗争越多这种人就越多。他们是受工人阶级提拔出来的积极分子，由其他工人阶级和党的经费维持生活，让他们摆脱在工厂里做工的情况。

今天的中国革命分子普遍的非职业性、没有专门的经费、脱离群众组织的大地注定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我国还没有普遍的产生这种组织和职业革命家的条件。但如果以革命为第一目的组织，其成员还不是这样职业的、专门的、由群众组织养活的那它也能达到革命组织的程度。但这种组织的成员主要是兼职的革命者，他在现实生活中是工人或是学生，还需要靠别的身份养活自己。这种组织虽然有了部分革命家组织的特征，但它终究不是革命家组织，达不到革命家组织的程度，完成不了革命家组织才能够完成的工作。所以，一字之差相距千里，不能把革命家的条件放在革命组织的身上。

并且从布共的经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讲到党本身的结构和成分时，列宁认为党应当由两部分组成：

- （一）人数不多、经常进行工作、作为骨干的领导工作人员，这里主要是职业革命家，即摆脱了其他任何职业而专搞党的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具有最必要的理论知识、政治经验、组织技能，并且善于同沙皇警察作斗争，善于避开警察的耳目；
- （二）广泛的地方党组织网，人数众多并且受到千百万劳动者同情和拥护的党员群众。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党也有这样两个部分，职业的革命家和普通的党员群众。放在没有构成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今天，构成这两种成员的组织也就是革命家组织和革命组织的区别。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弄明白了，新十月没有分清革命家组织和革命的组织的区别。所以经常想做厂外的职业革命家想形成厂外革命家组织，但我们又发现职业革命家组织如果没有厂内的革命组织（先进工人的组织）和广泛的工人组织为基础则难以普遍的实现。所以今天想要去在厂外实现革命家组织还是做不到的，而革命组织在厂内就可以实现了。至于厂外的革命组织，目前只能起到辅助厂内革命组织的作用而不能代替其不可或缺的独立地位，因为广泛的工人组织目前主要需要依靠扎根厂内的组织工作才能实现。我们很难想象在今天的条件下，厂外的分子怎么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厂内的工人普遍的组织起来，并且在没有组织起广泛的工人的前提下一大堆厂外的“职业革命家”要靠什么来养活？而今天“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已经靠自己的工作，一边通过劳动养活自己，一边通过集中进步工人的核心组织和广泛组织工人进行斗争的两种工作达到了不错的效果。

并且如果我们放弃扎根工厂的路线就等于是要继续保持我们继续和工人阶级相互隔离的状态，我们无法广泛的组织起工人，也无法在厂内实现巩固的革命组织。这就等于是让工人阶级的自发性自由发展，这就等于是经济主义，也就是说不要这种正确的扎根工厂的路线的新十月的先生们就是最大的经济主义者。他们放弃扎实的厂内组织工作，不依靠扎根在工人阶级之内的利益，妄图依靠厂外的密谋方法来推动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和实现自己的厂外革命家的身份。我们要指出，未来领导整个工人阶级革命的职业革命家只能是现在去扎根工厂的革命分子和通过我们的扎根工作在工厂中发展出的进步工人们来主要构成，实现未来我国整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人组织基础和培养出职业革命家和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团结恰恰需要我们今天通过扎根厂内的革命组织工作来达到。而新十月的先生们则是想反过来，反对扎根工厂的现实组织工作、要和最现实的群众工作隔离开来，还想在现在的条件下就成为职业革命家而领导工人进行斗争，这只能是幻想。

八. 机械的类比

新十月的先生们做了许多引用和类比，但很多地方都用错了，特别是他们用了二十世纪俄国革命的条件来判断今天的我国革命需要采用的路线和方法。

关于为什么革命组织要优先于工会组织建立，《列宁工会思想历史》中已经做了解释，我们不妨做个引用：

“在一般的情况下，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大都经历了先建立工会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道路。但是，在 20 世纪初，这种传统道路已经不符合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因为 20 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已与早期的欧洲工人运动在主客观条件方面大不相同：俄国资本主义已迅速跨过了工场手工业阶段而进入大机器生产阶段，俄国工人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确立了主导地位，并在俄国得到广泛传播；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与俄国工人运动汇合；俄国也有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小组以及一个形式上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因为如此，在 20 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可以不走西方工人运动的“先建工会后建政党”的老路，而可以直接采用西方工人运动的最先进的理论和最高级的组织形式，使俄国工人运动大踏步前进。况且在沙皇专制条件下，工人阶级用经济斗争的手段难以争取到结社、言论、出版等政治权利，俄国工人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展开“统一的阶级斗争”，才能使沙皇政府让步，逐步争取到各项政治权利。因而，对于当时的俄国工人运动来说，既要争取建立工会，又要建立革命政党，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革命政党。列宁号召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社会民主党小组，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和真正建立社会民主工党这一任务上来。”

我们曾在《关于在今天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一文中讨论俄国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的发展过程。我们要指出的是，俄国的工人在八十年代就普遍具有了工人自己成立的工人斗争组织，工人运动很发达，这种斗争组织不是西方式的合法工会，但却胜似工会，实际具有了工会的许多作用。俄国在九十年代中期就有了列宁创办的“工人阶级斗争解放协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现实组织，九十年代末就有了全俄普遍的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工人运动；到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立了，工人已经在党的组织下开始进行了普遍的社会主义运动。新十月的先生们用这个时代的特征来套用今天的中国的情况显然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第一，我们还没有发达的工人运动，还没有普遍的工人自己的斗争性组织。第二，我国还没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工人运动和进行这种运动的现实组织。第三我国还没有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形成广泛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认为不应该用俄国有了这些条件后的革命方法套用在今天还没有这些条件下的我国来使用是完全合适的。就算要对标，我们就算要对标也应该是对标俄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运动条件，这样更恰当一些。

所以我们还在更基础的阶段，需要革命分子进入工厂同时作组织最广泛的工人的工作和建立工厂中的革命组织的工作，只有通过扎根工厂做好这样的基础工人工作才能够建立起未来实现革命家组织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今天我们需要革命分子主要把工厂内的工作做好，提高工人的组织水平、斗争水平、政治觉悟水平。至于我们需要不需要工会，目前来看是需要的，但那最好是我们自己的工会，是革命者和进步工人的工会；而建党的工作和更广泛的政治斗争的工作则的确应该和这样的工作同步进行，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做这一方面的基础还更低，需要从厂内组织开始。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新十月先生们的类比是机械的类比，是教条主义的做法。是背诵过去某段历史的结论强行拿到不同条件的今天来套用，放弃了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是遵守马列毛主义的字面而不遵守马列毛主义的灵魂。是背答案来做题而没有发现题目已经不一样了的书呆子。这和他们之前在《去进行政治灌输吧》一文中所犯的问题是一样的，也是我们在《关于“扎根”的线下组织工作路线的问题》和《融工中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的问题—兼对离火《去进行政治灌输吧》一文的批判》中所批判的内容是相似的，但他们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发展得愈发严重。

九. 模糊不清的“工人夜校”

后文提到的工人夜校问题，新十月的同志如果成功举办了工人夜校，那将是轰动性的成果，然而文章中对夜校的模糊描述，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其真实性，或者新十月的先生们夸大了他们的工作成果。任何有过工厂工作经验的同志都知道，要举历史意义的那种办工人夜校在现阶段是几乎不可能的，是难以实行或延续的。那么新十月的同志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他们发明的新办法，但却并没有很好的给我们解释清楚。说：“我们开始主要与工人们谈论政治事件，而不是主要讨论‘劳动法’，‘如何维权’等等，”。缺少使其他同志进行实践学习的部分，缺乏可供学习的细节，这很难让人信服。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疑问。

在合法活动和社团的利用方面，我们利用文化类的社团接近群众，并将之作为工作的依托，而不是本地工作的重心。我们开办了“工人夜校”。我们开始主要与工人们谈论政治事件，而不是主要讨论“劳动法”，“如何维权”等等，并直接利用政治事件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样一来，我们交流的尺度就大了很多，不会再局限在工厂的斗争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抛弃了工人政治意识的“阶段论”（即政治教育必须在经济斗争之后才能进行），认为当下的工人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政治鼓动的。经过了我们的一些实践，也确实可行的，甚至于当我们尝试举办一些文娱活动的时候，有工人会主动说：“我们不是想要参加这些娱乐活动，我们就是为了了解这些政治性的东西来的。”同时，在与工人交流政治事件的时候，我们不会仅停留在政治揭露，我们会积极地发动工友们讨论该怎么办，而我们自己也会直接地提出社会主义观点地解决方法。（至于安全就是另一个技术问题了）

“在工人经济斗争方面。有了工人夜校，对于一些特定工厂之外的工人，我们也能够定期进行交流，发现矛盾。工人夜校是一个初步的筛选，我们尝试让有政治意识的工人们聚集

在我们身边。而对于有政治意识且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工人，我们会尝试进一步组织出工人的政治小组，并发动参与的工人们进行详细的厂内调研，观察厂内矛盾，以了解区域内各厂的情况，为随时介入并领导区域内经济斗争做好准备。

1. 一开始谈到了“利用合法活动和社团和文化类社团”。如果前文新十月对文化社团的提法就是利用厂内条件所创办的。而后文来看“工人夜校”又似乎不是在厂内的，这里没有明确的指出来是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这个“工人夜校”到底是通过哪种组织方式和哪个渠道建立出来的。如果是依靠工厂内的合法社团那就是和“到工人中去”一样的办法，那也是扎根工厂的工作之一，如果是厂外的方式那就应该明确指出来。

2. “不是主要讨论‘劳动法’，‘如何维权’等等，并直接利用政治事件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样一来，我们交流的尺度就大了很多，不会再局限在工厂的斗争当中”

这种内容的灌输厂内的工作也可以做到，不一定非要把这种灌输工作和厂内的条件对立起来。“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就做过这样的工作，有了不错的实践经验供我们学习，但被新十月的先生们给贬低了。

3. 工人政治意识的阶段取决于工人客观条件，他能接收到什么程度就只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有的人能接受政治灌输那就直接政治灌输，有的人不能接受政治灌输就只能鼓动进行经济斗争。工人的思想现状取决于工人现在脑子里的状况而并非取决于我们脑子里的状况。

4. 新十月说“工人夜校”能起到发现经济斗争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没有“工人夜校”就更难发现经济斗争。实际上，有在工厂扎根的工作就可以更好的发现一切斗争（包括经济斗争），只有不在厂里的人才需要厂内组织告诉他们具体的斗争。

5. 这个工人夜校还能够“对于一些特定工厂之外的工人，我们也能够定期进行交流”，也就是说在这句话的预设条件下，这个“工人夜校”已经不是单个工厂里的组织了，而是跨多个工厂的组织，或者是厂外的组织。但这就和这种组织的建立条件产生了矛盾。

6. 并且这个“工人夜校”还可以达到这样的作用：“工人夜校是一个初步的筛选，我们尝试让有政治意识的工人们聚集在我们身边”

那么就是说“工人夜校”这个组织可以聚集起厂里的工人。但实际上厂内的组织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而不一定要是“工人夜校”，如果这个工人夜校是厂外的组织，那么聚集普通工人的效果一定是厂内组织比厂外组织好。

7. “而对于有政治意识且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工人，我们会尝试进一步组织出工人的政治小组”

然后，工人夜校本身不是工人的政治组织，而是可以利用起来建立工人政治小组的过渡组织。

8. “并发动参与的工人们进行详细的厂内调研，观察厂内矛盾，以了解区域内各厂的情况，为随时介入并领导区域内经济斗争做好准备”

最后工人政治组织要被“我们”发动起来进行调研、观察、了解情况，最后为“我们”随时介入并领导区域内的经济斗争做好准备。

9. 整个组织活动的过程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轻松的。如果这个工人夜校只是可以利用的空间就是公开进行读书学习和政治交流等文化类活动，就能做到借此传播革命道理，启发工人意识的效果的话，他们过去的经验未免也太顺利了。且不论目前特色对各种公开组织的监管程度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工厂里对工人的管控比学校严厉了不止一倍）。更不要说他们怎么保证以文化类社团吸引来的本来就对时事、读书和讨论感兴趣的工人就是先进的呢，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样可能严重的渗透在这些人的观点中（毕竟他们自己在上文中的逻辑认为参

劳动保障方面的学习被吸引过来的工人仅仅只是想解决自己当下的经济问题，而未必是进步的有彻底的斗争意识的工人，那按照这个逻辑，被他们的文化类社团吸引过来的工人同样可能也好不到太多），而引流和筛选方法没有告诉我们。

10. 最后新十月的先生没有解释这个“工人夜校”的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分工如何，所以我们也知道这种组织的成员其经济性质、职业性质是如何的。也就无法判断他是兼职劳动的革命分子还是新十月先生们想成为的是没有明确经济来源和现实基础的职业革命家。也不知道这个这个“工人夜校”是如何组织这样的活动的，以及他们活动的现实可能性如何。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工人夜校”是既可能需要进厂融工利用常去条件通过文化社团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组织，又可能是厂外的组织，但它又不是单个厂的组织或工厂内的组织；它不是工人的政治组织，它是可以聚集起厂内工人的组织，又是可以筛选出有政治意识且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工人的组织，还是可以利用起来组织起工人政治组织的组织；最后它是可以让新十月的先生们更好的发现厂内的经济斗争的组织，也是能更好的让新十月的先生们能够随时介入并领导工人们进行经济斗争的组织，还是可以避免陷入经济主义的组织。

可见，新十月的先生们似乎为我们设想了一个万能的“工人夜校”。这个万能的“工人夜校”简直可以满足我国革命的一切需求。它可以把我国工人迅速的革命化、组织化，也没有敌对势力相当阻碍，甚至还可以让革命分子不用去扎根工厂而做艰苦的工作，也可以避免革命分子在经济上的考虑，又可以让革命分子们能够在厂外领导起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还可以避免经济主义。

我们只能说这是空想或者把一般的组织工作夸大、夸张后出来的东西，我们希望新十月的先生们解释清楚，最好能像到工人中去的同志过去所做的那样。

同时我们也要说的是，如果厂内的工人没有被我们普遍的组织起来，那么想要让工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就是不可能的；厂内如果没有进步工人或革命分子构成的厂内革命组织去做好普通工人的工作那么领导斗争也是不可能的；没有厂内的劳动职业革命家也是不可能出现的；没有厂内的这两种组织，厂外的一切工作包括这个不明确“工人夜校”也是不可能达到普遍的效果的。而这些工作恰恰只能通过革命分子有目的的扎根工厂的长期工作来完成的。

明明在普遍实施 996 制度和严格的工厂管理制度的条件下，在我国工人运动非常初级的条件下，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却偏偏要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套用俄国二十世纪初的革命条件来代替现实的条件，幻想主要靠类似万能的“工人夜校”来解决需要刻苦扎根工作问题，这是左倾机会主义，是极其害人的。这种内容符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或不尊重我国现实革命环境的人的左倾幻想，而有害于我们长期的革命利益。

今天新十月的先生们把“到工人中去”贬到了地底，又把没有解释清楚自己的工作成果，同时又给我们提出了许多糊涂的错误观点。我们希望新十月的先生们真正的脚踏实地，终止对“到工人中去”等我国正在踏实的和艰苦的工作的革命分子的污蔑，理清自己的观点。

谁在为工人事业而奋斗？（评《融工分享——我们是如何进行融工的？》口头政治斗争派彻底露出形左实右的狐狸尾巴）

作者：东风

我们下面来看看他们原文是怎么说的，括号内的话是我们对他们的评价：

我们在思索之后，往往哑口无言：一是我们没法简单给出一个暴力革命这样寄托于未来革命的回答，实际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革命时刻何时会到来**（这种人到底懂不懂马克思主义？难道革命导师们谁精确的推算出了革命在多少年后几月几日爆发吗？列宁还曾悲观地说：“我们这些老人恐怕看不到革命爆发的那天了”「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的规定时日——毛泽东」）；二是**我们没办法提出着眼于工人阶级利益的（？）**，符合当下革命条件的政治任务和政治目标，**讲不出（？）具体的改造世界的内容**（既然自称搞工人运动的，那么他们是否理解工人阶级？难道100多年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不是给出了照葫芦画瓢的经验？当然马列毛主义者不可能照搬，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时候确实没有此方面条件，但他们难道是悲天悯人地苦苦上帝哀求我们应该怎么办吗？今天的这个地球曾经有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口头政治斗争派不单单“不懂”政治，难道还不懂历史吗？是怎么得出“我们”甚至讲不出具体的社会改造内容的？）；三是我们仍然保守地不敢踏出政治宣传这一步，我们惧怕安全风险，害怕这会有不好的后果（惧怕危险的是你们——口头政治斗争派，你们不敢去工厂忍受一天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不敢去投身革命的浪潮，**在工厂里的革命者没有不对进步工人做政治鼓动，揭露反动的中修社会帝国主义**）。

口头政治斗争派的是怎样融工的呢？我们来看看：

2、进某个厂长期做普工对于该厂内的经济斗争的发动、工人政治组织的建立以及政治灌输并非最有利的途径。进厂过程中，普工往往会被限制在自己的工位上，单凭社交圈子能够认识到的工友有限。即使我们可以对身边的工友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收获的也就仅有一两位（？）而已，更别说有时候我们个人能力有限，没有办法对工友做到政治灌输（没有千千万万个甘当“螺丝钉”的鼓动员怎样才能向亿万工人传播革命思想呢？火星报难道只经列宁一个人的手便能向全俄国宣传社会主义吗？**没有千千万万个在工厂的布尔什维克，经济、政治，任何鼓动都到不了产业工人手中**）。其次，斗争需要各种有利条件的成熟，所谓长期“扎根”在一个厂，并且希冀在该厂内发动经济斗争从而发觉培养积极工人的思路，前期准备过程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难道我们不需要经过各种合法的、非法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中提高阶级的觉悟吗？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发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但他是人类，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吃，难道不做任何实际的、细微的、繁琐的工作就能让资本主义灭亡吗？满朝公卿，夜苦到明，明苦到夜，岂能哭死董卓？**），在此期间着眼于本厂内一次成功的经济斗争的准备会使得革命者不小心滑向经济主义（原来革命者会因为一次经济斗争的胜利，而“不小心”就滑向了经济主义，那可得当心了!!!），在长久的准备中看不到成效，造成人员的不断流失。比较好的做法应该以地区性小组为核心，互有分工，长期“扎根”一个地区，在较有条件的厂进厂工作的同时，长期关注本地区的工人斗争事件，跟踪并介入斗

争，进行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使得左派在斗争中积累经验，扩大联系，最终能够领导工人运动。（他们“聪明”地说到这儿，始终没有说怎样才能像他们设想的愿望？怎样才能像他们的愿望搞票大的？他们所说的：“长期关注、跟踪并介入”，似乎是死灰复燃的工运观察家路线？）

3、在与工人交朋友以及将工人进一步组织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人组织中时，我们发现单纯的吃喝玩乐或娱乐活动对革命工作本身的帮助是微小的。工人有先进、中间和落后之分，愿意斗争、有较强政治意识的工人往往不是喜爱吃喝玩乐的工人。大多数情况下，交朋友，吃饭聊天对于我们的革命工作都是帮助十分有限（？），与我们相熟的、能够一起吃饭、喝酒的工友未必能够与我们一起做事（**没有人是天生的马列毛主义者，如果社会主义能从工人中自发产生，那么列宁就不会提出灌输论了**）。以娱乐、吃饭等活动拉拢来的工人多数大多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吃喝玩乐。我们社会主义者应当明确自己的目标，如果把大量的工作时间放在交朋友上，那就本末倒置了。（**工人们是更愿意听长期和自己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人的鼓动宣传，还是更愿意听和自己认都不认识，素未相识的左翼少爷少奶奶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口头政治斗争派的“悲痛”“反思”：

二是左派强调通过革命者在特定厂长期工作、制造斗争来唤醒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和阶级觉悟，但是没有认识到经济斗争的复杂条件，没有认识到只着眼于个别厂内的经济斗争的发动工作方向反而使革命者在长期的准备工作中陷入了经济主义的窠臼（原来他们的认识中**只要进行经济主义斗争就会陷入“经济主义的窠臼”**，经济斗争可真是个毒草啊！我们原谅他们的无知，还是来看看什么是经济主义吧：「经济主义指工人阶级把**政治诉求从面向全世界转向争取纯粹的经济利益的现象**。而非通过革命政治来激励工人。」），并在陷入迷茫而出现革命意志的衰退；三是一味强调进厂融工，忽视本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组织建设和理论修养的提高，把理论准备不充分、社会经验不够的年轻革命者鼓动进厂，忽视其自身的理论修养和政治远见的培养，忽视核心组织理论建设，核心成员对于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现状和我们革命的方向缺乏认识，而厂内的同志更是在工作压力、生存压力和经济主义的工作中逐渐迷茫，开始走向革命的反面了（哦，原来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一味进厂”，而是要**等**，等到我们的理论都充分了，一切安排好了，即没有“工作压力”、也没有“生存压力”了，那么我们现在**终于能进厂了**。）。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样指责进厂的革命小组的：

最后，在融工过程中，需要有组织有纪律、有远见、理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作为核心（原来他们是知道马列毛主义的。我们要说：**要有纪律性的革命家组织而不是空谈家的茶馆**）。在既有的左派融工实践中，本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建设是决定融工实践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了解到之前进行融工工作的本地马克思主义小组建设存在如下情况：核心组织建设缺乏政治性，缺乏理论争鸣、形势研究等政治宣传工作；本地小组存在关门主义倾向，对外联系少，以安全为由拒绝交流，拒绝进一步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合作（这是你们——口头政治斗争派，真正的革命组织早就走向着团结走向着统一战线，革命者终将会走到一起的，因为革命者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而牺牲，而机会主义只有自己

的小算盘，自己的派别活动、组织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有句俗语叫做“左派无限可分”。)。这样的缺点导致本地马克思主义小组开会滑向事务主义的工作，成员理论修养和政治素养得不到提高，缺乏理论争鸣。内部关门主义，缺乏对外交流和碰撞，更缺乏争鸣和理论的提高（是谁在理论争鸣？是谁在传播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

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引用”列宁的话的：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革命组织优先于工人工会组织的建立。列宁在《怎么办》里明确了这一观点：

“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

“而我们如果从建立那种好象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两种目的都实现不了，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泽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

（难道今天的工厂里的小组不是秘密的革命家组织？后面他们引用的列宁的第二段话。我们今天**难道有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吗？与其说其不愿意睁开眼睛看看现实，不如说其是先画靶子后射箭。）

是否愿意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检验革命者是否能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奋斗终身的**最低条件**。

一点细小的、微不足道的事务性的革命工作都不愿意做的左派，我们能相信他是革命者吗？不如说是**好高骛远的空谈家**。

世界上没有一个群众运动没有大多数群众的参与而能成功的，工人运动正是群众运动的一种，如果不能团结大多数工人，那么罢工、经济、政治，任何斗争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今天口头政治派所说的：什么你们不搞政治（鼓动）斗争，你们是经济主义，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的群众运动的基本原理，幻想着自己振臂一呼，十月革命就爆发了。而今天工厂里的同志们无时无刻向进步工人们揭露中修、资本主义…的罪恶，**难道这不是政治鼓动、难道这不是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吗？而在口头政治斗争派想当然中，经济主义的帽子就从天而降到每一位工厂中的革命者头上了，结果今天的“口头政治派”不愿扎根工厂、不愿融入群众、不愿参与现实的斗争、不愿把组织工作、政治鼓动、政治灌输的工作贯彻到最广大的群众中去，所以他们甚至不如俄国的经济派。**”

第三部分 社会社评

我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我国人民群众生活脱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着各种反动政策，残酷的剥削、压迫着我国人民群众。并且还利用各种反动舆论或艺术作品来灌输各种反动思想给我国无产阶级及更广大人民群众，并且习惯性的控制社会舆论、歪曲事实，以此达到维护自身反动意识形态进而维护统治的目的。我们应该揭穿他们的鬼把戏，唤醒我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我们在这部分集中了一些相关文章及评语，供大家参考。

评李克强之死以及相关运动

革社（RSF）编辑部

2023年10月27日，我们的阶级敌人之一，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最近突然死亡。在他死亡之后，国家机关并没有高调的为其宣传，并且政府还罕见的选择了大程度的限制社会影响。

各校园和政府单位中也立即出现了针对此事的管控行为：

接上级通知

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于今日逝世。

根据工作指示要求，请各单位各部门做好近期的校园安全稳定工作，确保舆情等各方面安全有序。

相关悼念活动等上级指示后，统一安排。

交大党委办公室

2023年10月27日

立即下沉学生中间，关注学生对此事的思想观点及舆论观点，坚决不允许有任何线上线下不当言论，明后两天关注学生外出动向，密切留意校园内任何聚集性悼念活动，发现线索立即报告。学工部将连续三天（每天两次）调度各单位情况，进行零报告工作。

-上海交通大学消息管控

（整理版）转市宣通知：

第一，关于克强总理逝世的消息，各媒体（包括部门和社区公众号！）如转，只能转中央主要媒体的稿件（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后续会按国家领导人有关标准开展追悼，后续通知请留意。

第二，也做好评论区管理，特别注意一些评价过高的言论。

同时，近期转载的时候要避免和娱乐化的消息同框。近期有关娱乐商业活动，请与有关部门沟通好，可能得停一停。秋色、功夫电影周这些活动。

-2023年10月27日

种种迹象都在显示国家机关和各高校事先就在多个方面开始预防社会产生大规模的运动。这和去年底去世的江泽民的待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针对这两位不同人物的去世，群众运动的数量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的自由派人士趁机进行了许多活动，他们有的走上了街头对习近平政权进行辛辣的讽刺表演活动，或是聚集起来公开的纪念李克强。也有普通群众参与了进来，他们也借此机会要把自己对政府的不满释放出来，如此种种，迅速的在我国各地形成了一股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潮流。

今天我国群众的不满和李克强的死亡联系在了一起，通过哀悼等形式集中的表现了出来。这样例子，我国历史上还有很多，六四事件便是一例。仅是一个官员的死亡，就能造成这样大规模的全国性活动，足以说明我国群众运动根基之深厚，潜力之丰富。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今天群众的运动却需要用借用一个官员的死亡的方式来集中的表现出来，也足以说明我国今天的群众运动的初级性。在今天，羔羊们要借助狼的葬礼来反对今天的狼王，受压迫的群众们却试图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自然是一个历史的讽刺。但事物总要走向反面，今天不足的羔羊总能成长为明天强壮的狮子。

今天，完全矛盾的两个阶级却短暂的同一了起来，这种现象是由于我国的无产阶级运动还不发展、我国群众还没有普遍认识到自己的阶级性质和必然命运、以及我国人民的一般性民主要求、和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路线等因素所造成的；当然，这一切也不得不体现出我国革命分子工作的极端落后。

一. 李克强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

为什么我们要说李克强是狼呢？因为在把人分为不同阶级的社会里，任何政治活动总是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利益的。自由派们总是期待在狼群中有产生一两个能代表羔羊利益的狼来实现他们的自由主义幻想。我们要指出的是，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机构里，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自然产生的政治代表总是这个阶级的代表，李克强也不可避免的要为其阶级利益服务。

在李克强执政河南的时期，河南“血祸”或者说河南的艾滋村问题十分严峻的扩散开来。当时作为河南省委书记的他，虽然在2004年2月亲赴“艾滋村”之一的“上蔡县”，说了一些好话，做了一些承诺，展现了一些得到很好安置的个例，但事情全貌和河南艾滋村百姓的普遍遭遇却被他严厉封锁，各地前来河南的记者除非是在他需要场地和精心准备、挑选的情况下的才会被他偶然接待（这自然是一种表演），而对其他的采访记者则是普遍打击。而实际情况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这只能是一场表演。河南“艾滋村”问题的扩大化正是从他的任上开始的，后来的《中原纪事》纪录片中河南许多农村的地狱场景也可以看作是他造成的历史结果。

我们不妨参考自由派媒体对中国前卫生部官员采访：

7月8日，中国卫生部前官员、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及最高检察院发出题为“李克强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拒不认错应该下台”的公开信。公开信指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河南艾滋病大流行事件，至今已近20年，李克强前任李长春主政期间，在河南推行“血浆经济”因而导致河南农村爆发艾滋病疫情，李克强上任河南后，因为其掩盖疫情导致至少30万人感染艾滋病及至少10万人死亡，河南产生了数百至上千个艾滋病村，几十万艾滋病感染者和死者家属因得不到国家赔偿，加之投诉无门，在死亡线上挣扎。

公开信特别强调，1998年河南艾滋病危机爆发，李克强临危受命到河南“救火”。在该问题上与其前任李长春一样，隐瞒严重疫情和封锁真相，并打压河南艾滋病维权人士，包括河南第一个发现艾滋病病例的医生王书平、目前已经出走美国的艾滋病维权人士高耀洁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等。这也是河南艾滋病疫情向中国其他省市蔓延的原因。

此次陈秉中再促中共当局对河南血艾事件做出公正的司法判决、由中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进行独立公正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包括艾滋病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艾滋儿童及受到影响的儿童数量等；同时责成检察机关对该事件问责，并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死难者家属给予国家赔偿；为现有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治疗、出台艾滋儿童的保障方案等。除此之外，陈秉中认为“如果李克强拒不认错，就应该下台。”

作为前卫生部官员，陈秉中决绝的与体制撕裂，从2010年9月起开始举报和追诉李长春、李克强及其他河南“血祸”的责任人，已向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和前总理温家宝进行六次实名举报；去年十八大前再向两会主席团和党代表举报，后又投书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均石沉大海。今年3月15日，李克强接棒温家宝成为新一届政府的国家总理，陈秉中发出质问“李克强有什么资格坐在总理的位子上？”目前北京警方已将这位前中共官员列入“监控名单”，不时对其进行警告和传讯。

陈秉中向德国之声表示，自他举报之初到现在几年时间过去，他已经意识到中共当局根本无意正视这起人祸和对主要责任人问责，当局已将一起卫生领域公共事件转化为政治丑闻和道德危机：“对我举报的事，他们也不说是对是错，就在那儿赖着，显然是心里没有底气，根本无意解决。他们就怕揭开老底，如果揭开真相了，恐怕他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了。”

已80高龄身患重病的陈秉中表示已无畏生死，希望在有生之年揭开这起人为血祸真相，留下清晰无误的历史。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突破国内对河南血祸信息的封锁，通过各种渠道让公众知晓并倒逼政府去解决问题：“对我来说，只有坚持下去，只要大家都知道真相了，这问题就好解决了。但现在这些内容只能在国外发表，在国内都受限制，他们想尽办法把信息封锁住，但终有一天，这些真相会揭开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

河南“血祸”或者说河南艾滋村的问题本质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的恶果之一。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导致大量农民失去生活手段或收入下降、包括过去农村的社会福利消失或大幅减少导致许多农村家庭面对高额的工农业剪刀差和农业税难以为继，医疗的商业化导致贩卖人血成为了一门新的生意，而卖血过程中的卫生条件不足导致艾滋病通过血液传播大量感染贫困百姓。所以河南的农村中就大量的出现了被剥削压迫到极端贫困还不得不靠卖血为生的农民，我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这里成为了字面意义上的“吸血鬼”。李克强从来没能从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根本问题上去解决问题，他至多只能尝试去解决一些问题的表象，或者把这些表象藏起来当作没有发生。他没有消灭血浆经济本身，反而是加大对相关维权群众和进步人士的镇压和打击，他在河南造成的罪孽和我国后来新冠疫情封锁时期中屡屡产生的人祸性质类似，或者说后来新冠时期中出现的所有灾难都早已在二十年前的河南预演了一次。

自然，李克强因此遭到的控诉还有许许多多，我们这里只能大致列出万中之一的部分：

《李长春和李克强隐瞒疫情导致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罪不可赦必须问责 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投诉信》

《河南艾滋病泛滥成灾久不查处该问责谁？ 致习近平总书记投诉书》

《李克强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拒不认错应该下台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信》

《放火的州官当总理蒙冤上访的百姓坐监牢 国际艾滋病日质问党中央百姓何日能点灯》

《已经到了对河南血祸责任人立案问责的时候了 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公开信》

《有腐必反还是选择性反腐放过李克强 全国人代会继续掩盖河南艾滋病真相致习总书记公开信》

《在艾滋和丙肝双重病毒摧残下无助的村庄 在抗病一线向习总书记报告》

自然我们列出这些并不是为了证明习近平比李克强好，习近平对人民造成的祸害只会更大。但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等其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明显包庇了李克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毫无疑问的是和受害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对立的，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一同的祸害人民群众。

在李克强主政河南时期，也普遍的出现了农民抗税问题。我们这里也采用自由派媒体的信息（这可以预防部分自由派的偏见）：

河南农民暴力抗税

中国农民负担过重已不是新闻，农民抗税事件也时有发生。河南省信阳地区的数百名农民一月四号因反抗地方政府征收拖欠税款，与税务人员和警察发生冲突。下面是本台记者嘉远的采访报道。

VOICE：透露河南信阳农民暴力抗税这一消息的是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该组织负责人李强介绍说，抗税事件发生在信阳地区商城县，伏山乡杨桥村，属大别山区贫困地区。

李强表示，虽然该地区的人均年收入不足四百元，但当地政府仍向农民收缴各种苛捐杂税。根据李强介绍，由于不堪重负，不少农民从95年以来拒绝交税，当地税务，法院和乡政府组成工作队，向农民催交拖欠税款，就此酿成这次的暴力抗税事件。李强描述了农民抗税的过程。

商城县政府一位值班人员间接地证实了这起事件：这名值班人员也否认有政府车辆被砸的说法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减少农民负担。根据有关规定，农民纳税的最高限额为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五，但根据中国劳工观察的消息，商城县的一些农民交税率远远高于这一限额，甚至高达百分之五十。

为什么地方政府没有执行中央的有关税收指令呢？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专门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黄树民教授认为，国家没有向地方政府提供足够的财政需要是导致地方政府向农民过多征税的主要原因。

黄教授表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中央政府增加对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但黄教授同时指出，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如果管理不善，很容易被地方官员挥霍。因此，黄教授认为，解决农民税收过重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农民从事农业活动以外的行业并使他们脱离贫困。黄教授说，沿海地区的农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嘉远，华盛顿报道
2002. 01. 06

在中国官方给李克强的正面评价中有这样一段话“1998年6月起，李克强同志历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省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他提出实现中原崛起的奋斗目标，在全省上下形成发展共识，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同时，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李克强在任河南的几年内，河南的平均GDP增速为9.6%，和他前任和后任相比是差不多的。但总的来说，他也算推进了河南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但他是怎样实现这种工业化、城镇化的呢？是通过对农村的残酷剥削和吸血，是通过大规模压迫甚至消灭农民来实现的。高达百分之五十的农业税，这是过去旧中国的地主阶级对待农民时才会有的剥削水平，李克强做得比中央规定还要狠十倍。当然这不是他一个官员的个别现象，而是中国官员资产阶级的普遍现象。

但李克强在河南达到的这些成绩也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们普遍认可的成绩，是符合这个阶级的共同价值标准的。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标准呢？这只能是一种要资本权力不要人民权力、要利益不要人命的标准。当然，这种罪孽不能只让李克强一个人来负责，那也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正的，因为他只是这个阶级的一份子，这个罪孽只能由他们这一整个阶级共同负责。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李克强和习近平等其他一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都是一类货色，即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吸血鬼。对于我国广大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来说，在评价这些吸血鬼的问题上只有程度上的差别。

同样，李克强做国务院总理时期的许多政策也没有根本的维护过人民群众的利益，他提出的许多改良的政策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疫情时期的“地摊经济”等，都只是试图不动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基本利益的基础上做一些有限的改良，在维持这个阶级的剥削的基础上

尝试短期的减少一些剥削的增长等。简而言之，我们至多只能这样评价他的这些尝试：他比其他一些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更长期的考虑他们的统治利益、剥削利益，和他早期十倍的剥削河南农民的图利的虚伪形象形成了对比。但这本质上也还是一样的，奴隶主让奴隶吃饱一顿饭只是为了好让奴隶多干一点活，而不是他真的要解放奴隶了。而在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日益严峻的今天，他的这些改良政策也愈发的不起作用，这是由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共同的贪婪的增长和资本主义必然危机所造成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奴隶制度范畴内的）改良也已经愈发的不可能了。

因此李克强“长江黄河不能倒流”的情感寄托，在他看来也许也是对理想的寄托。但以无产阶级和更广大人民群众立场看来这只能是吸血鬼的情感寄托。吸血的人，想要通过吸血的方式得出不吸血的结果，这是对历史的嘲弄，这是恶魔的虚伪自慰。

他所指的不能倒流“长江黄河”是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许他的确曾想象那个社会能变得无害化，但那也只能是幻想。所以他所指“长江黄河”对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只能是一个地狱，这个地狱的现实图景就是他所一手造成的河南血祸下的农村。而我们无产阶级要的那种“不能倒流的长江黄河”只能是要彻底废除整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消灭整个剥削阶级的社会。

二. 今天中国共产党内的斗争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

在自由派或其他一些政治爱好者看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内部是可以划分为好几个派系的，也许有不严谨和错误的成分，但如果要根据一些合理的标准来区分也的确是可以分为不同的几个派系的。但不管是团派、习派、江派还是其他的太子党等派系，他们之间的斗争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是这个阶级内部利益分配不均的斗争，这种斗争并不能改变他们整体一般的阶级性质。

因为不管是哪一派他们都是支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都是严厉的镇压无产阶级和其他更广大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政治人物。从这个一般性来说，他们都不得不具有维持雇佣奴隶制度、保证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剥削剩余价值、疯狂的追求资本无限扩张的阶级本性。即便有李克强等个别人物再谈一万遍“我国6亿群众月收入不到1000元”也是不能改变其阶级性质的。根据他的阶级性质，他的行动必然是导向相反的方面。过去曾血腥的用坦克和机枪镇压人民群众和进行大清洗的邓小平也曾自称过“中国人民的儿子”，说过“要让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但结果也事与愿违。自由派们应该承认，你们所期望实现“民主中国”的这些人总是会对整个我国人民群众造成相反的结果，总又是“地狱中国”的代表。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用资产阶级的空话和歪曲历史的方式包装起来的血淋淋的人肉盛宴，这是人类历史倒退的产物。

关于李克强在他们官僚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细节问题我们不想深究过多，因为关于这些细节的可靠材料目前还不多，而且脱离问题中心，无关的阴谋论也不是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我们只需要指出其内部斗争性质和影响其斗争的一些重要标准就行了。他们斗争只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更进一步的说是关于其内部利益分配的斗争，决定参与这个斗争的力量也主要是他们内部的力量大小，也就是按实力分配。他们内部政见不同也只是在如何剥削人民群众的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以及照顾阶级利益的方式（短期利益或长期利益）不同，而对于我们来说至多只有对人民群众剥削程度和剥削方式上的不同。

当然历史上的情况也和今天不同，当党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构成的，以及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又尝试在生产领域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时候，这种党的才会有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可能，这个时候党内的斗争就会直接涉及到不同阶级利益和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斗争。而今天则是相反，在私有制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普遍实行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政治代表人物，只能是维护这个制度本身的人物，而今天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只能和这整个党的统治对立起来。

三. 团派、自由派和一般民主要求的关系

团派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个派别，他们受到许多自由派的期望，可以说承载了他们的自由主义愿望。除了李克强以外，胡锦涛也被许多自由派们所赞赏，他也是团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在我们看来，他也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我们也可以举出胡锦涛的一些例子。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1989年1月28日因为突发心肌梗死圆寂于日喀则，西藏独立的人士开始举行示威，并爆发一系列骚乱，局势异常紧张。根据《胡锦涛文选》记载，1989年3月8日，中央政府宣布拉萨戒严，胡锦涛领导下的西藏党委迅速响应，果断处置了骚乱，迅速恢复了社会秩序，戒严直至1990年5月1日解除。1990年4月30日，胡锦涛发表讲话，将平息拉萨骚乱定性为西藏反分裂斗争的重大胜利，并指出境内外分裂势力、达赖、台独等分裂主义分子仍然是西藏社会的隐患。

此事据称使得邓小平等中共高层认为胡锦涛行事果断，对党和国家忠诚，使胡进一步得到赏识肯定，为其几年后的高升奠定了基础。

接班人问题一直是历朝历代最难以解决好的问题，不知多少统治者在这上面栽了跟斗。到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这个问题依旧悬而未决，直到胡锦涛在西藏骚乱和班禅事件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后，才得以迎刃而解。

当时，胡采取先斩后奏的做法，一举解决了危机，等到了北京面见老邓，才把事情の詳細背景给讲了出来。据说邓当时听后惊得连声赞叹：“原来我以为自己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已经够狠了，没想到你比我还厉害！”顿时对胡另眼相看。而那个处处和邓小平唱反调，讲什么“鸟笼经济”、“姓社姓资”的陈云，也在党的接班人问题上罕见地和邓小平保持了高度地一致，他在听了胡的汇报后，感叹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啦，我们这些老家伙老啦，不中用了，以后就要全靠你们了。”多次开会，都把胡叫到自己身边坐下，十分亲热。老人们一致同意，以后的江山只有交给胡才放心，对于已经做了总书记的江，只能起一个过渡作用，第四代交班一定要交到胡手里。

-亚洲时报《事实证明 邓小平对胡锦涛的选择极其英明》
2006. 9. 29

这些内容也许有很大的故事化成分，但并不算空穴来风。胡锦涛的第四代领导的地位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酝酿和初步确定的；而江泽民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地位，也是在江泽民果断选择镇压上海自由主义运动后被党中央确定的，这件事也是江泽民自己公开指出的。可见，在邓小平等一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看来，能保护其阶级利益、阶级统治、关键时刻能进行镇压人民群众等行为才是主要的接班人标准。那么胡锦涛的果断镇压群众运动的行为自然也符合了这个阶级内部晋升重要标准之一的情况。

我国过去的自由主义运动高潮是“六四事件”，而在2012年7月1日的香港特首就职仪式上，有人在胡锦涛演说时喊话要求“平反六四”却被带走。

团派的官僚大多出自共青团系统，出自各种名牌大学，相比其他官僚有较高学历、较高的一般文化水平，比如李克强就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高文化水平的高级官员。并且，团派们似乎都有一些自由主义的倾向，自由派是从他们的教育经历和部分言论得出这个观点的。但这些因素并不能改变他们阶级性质，并不能挽救这个阶级和我国人民彻底对立的情况。

高学历的李克强在河南时一边做吸血鬼剥削人民群众，另一边又采取专政手段来保住自己的名声，这说明他们自己也是反对“民主”的，或者说他们想要的那种“民主”是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对立的。

相比其他官僚，许多团派官僚也许没有那么多的直接参与六四的镇压活动，这也是因为团派崛起的历史相对较短。但他们在剥削人民群众和在各种关键时刻对人民群众进行镇压的阶级立场上是和其他官僚资产阶级完全相同的。但我国的历史已经足以证明，所谓的“团派”不仅也是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彻底的敌人，是既想实现“民主”、但又害怕“民主”的虚伪生物；也是反复背叛自由派的利益却又一直饱受自由派期望的“救星”。

今天献花的人们应该尽快明白，李克强始终是一只吸血鬼，他的本性和其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完全一样，就是吸血和食人，他要种下果实也只能是食人花。而今天的人们去感怀这样的人物不能不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历史悲剧也在于今天自以为领悟了李克强的“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情绪的人们把这份食人花的情绪浇灌给了食人花的种子，它必然会结出食人后果。而人们却要在承受了自己所造成的这个后果后才能够明悟过来。但也只有到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昂起头来、挺起胸来，把这种可怜情绪的寄托行为看作是奴隶匍匐在奴隶主膝下的哭泣，看作是奴隶成长的必然经历。

今天中国共产党内的团派政治人物，不管其有怎样的自由主义倾向他都首先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物，他想要维护自身的存在和自身的发展也必须首先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党外的自由派们和党内的团派完全是不同的阶级，是主人和奴隶关系。无数的历史已经证明，团派官僚是绝对不会为了自由派的利益来放弃自己的阶级利益。

所以团派根据其阶级本性所最大能允许的那种民主是怎样的“民主”呢？只能是党内的民主，吸血鬼内部的民主，能让他们平等的瓜分人民群众血肉的民主。而一旦涉及到和人民群众相对立的情况时，不管是非团派还是团派的李克强、胡锦涛马上就不要民主了。而无产阶级和其他受压迫群众要实现自己的民主要求，就一定要消灭他们的统治和他们剥削利益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可见在阶级社会的环境里民主首先要有具体的阶级性，否则它就无法存在，没有阶级性的民主在今天只能是虚幻和骗人东西。

所以哪怕是最诚挚那一部分自由派，他们想要实现的那些一般性民主的愿望，如果不包含具体的阶级立场、阶级性质，不以阶级专政为基础就是不可能实现的。被剥削压迫者的共同民主非得靠无产阶级的专政来保证不可，非等用对吸血鬼的不民主来保证不可（正如吸血鬼的民主要用对人民群众的不民主来保证一样），这里是没有可以妥协和幻想的空间的。

所以实现被压迫者的民主愿望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够实现，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实现全劳动人民的民主，这个民主是不包括一切剥削和压迫的现象的民主。今天的自由主义之于我国人民就是有害的毒药，想要用自由主义来实现被压迫者的民主自由，等于是饮鸩止渴。

四. 短暂的全国性运动

李克强去世之后，在部分自由派和部分群众的参与下，全国性的运动迅速发展了起来。合肥红星路有大量的群众鲜花、悼念，有民众齐声呼喊“总理，一路走好”。在长沙的烈士公园、昆明的海埂公园、郑州的千玺广场、上海街头、南京大学、福州的西湖公园、南昌的八一广场等地方都有人纪念。

截至10月31日晚的网络信息。北京，杭州，成都，河南洛阳，南京，济南，淄博，安徽，福州，哈尔滨，大连，山西，嘉兴，贵阳，成都，澳门，云南，青岛，江苏，武汉，重庆，潍坊，浙江，辽宁，云南，烟台，厦门，香港，宁波，湖南，合肥，甚至有东京，纽约，悉尼，韩国，英国这些国外个人悼念和团体游行。也有上海年轻人借助万圣节和李克强去世双重条件来活动的情况。

面对群众的活动，统治阶级做了各种措施，在互联网上，让淘宝无法搜索购买“李克强”相关画像，提示外卖骑手“敏感时期，禁止配送菊花或祭奠用品”，有关合肥红星路的许多信息被屏蔽，转发也被限制等。在线下，合肥的音乐节和其他大大小小的活动被取消，合肥红星路和上海街头等地都不同程度的派出了警察来试图控制局面，有的地方甚至紧急安装摄像头来记录人群，还有的地方把一些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纪念碑或历史塑像全部封锁了起来。而在湖南衡阳市等地则出现了警察逮捕参与悼念活动人士的情况。

在纪念活动中最多献花的就是各地的学生，在网络上所有有献花留名的照片中，来自学校和学生的留名比例几乎占到了80%，当然这也许也是因为学生比其他群体更爱留名一些。各地的市民也有参与，比如在10月28日郑州的悼念活动中就出现了郑州禹洲嘉誉风华烂尾楼业主们的留名，这说明这个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中已经有许多的不同被压迫群体的参与。

但另一明显的迹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活动中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其他群体的参与活动明显减少。所以我们也看到运动的自由主义倾向在加强。但也是从31号开始，各地的活动基本上就已经剩下了自由派。

除悼念活动以外，各种讽刺活动和表演也在进行，在上海最为突出。上海的年轻人们借助万圣节和李克强死亡的双重条件，利用COS等方式进行了许多政治性的讽刺活动，如COS贪官的、COS给人做核酸的大白的、COS摄像头的、COS鲁迅的、COS小熊维尼的、COS刺杀安倍晋三的山上彻也的。最后引来了大量警察的针对，警察威胁年轻人们“任何未批准的聚集都是非法活动”，甚至还关停了淮海中路等地铁站，请组织该类活动的人喝茶。

虽然上海年轻人们这样的活动明显丰富了斗争方式，但也使斗争退化的地方。即他们更不在乎斗争性和战斗的目的，使得整个运动的斗争性下降。并且就整个运动共有的问题来讲，运动在上海更不包含明确的斗争目的。

而一旦过了31日自由派们就会失去合法的理由继续进行游行、聚集等活动。所以我们可看到，从11月1日开始，到11月2日，各地的活动情况也普遍下降。到11月1日晚间，上海巨鹿路就已经没有任何活动了，前几天晚间满街的年轻人现在却不见了踪影，剩下只有现场大量的警察巡逻、各个路口的封锁警车。而前几日在互联网上发誓要为李克强报仇，或者在互联网上恶狠狠的暗讽“小学生”、“陕西人”、“朱元璋”的人群，在李克强逝世的11月2日却集体的失去了活动能力。

今天我国的自由派的活跃性只能保持五天，而斗争性大概只限于讽刺的程度。

今天来怀念李克强的一方面自然是由于对李克强等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了解不足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习近平目前所造成更直接、更现实的剥削压迫和专制的感官所造成的，2021年对河南郑州洪水的失败处理、2022到2023年的河南更是爆发了多起社会运动（疫情冲关事件、富士康的两次运动、九十学运等），造成河南许多群众直面的反对习近平而怀念他们所了解不多的另外一个说了许多好话的官僚。对于全国各地的许多人来说也是如此。

我国的许多自由派们认为，我国的群众运动主要源于少数人进步人士的奋斗或理想，我国的社会进步也必然要靠这样的少数人。我们的看法则相反。我国群众运动的根基源于我国广泛的阶级压迫，源于每天都在活生生的发生的剥削事实里。在于被现实揉拧的艾滋村村民、被吸血的农民、被侵犯的储户、被欠薪的职工、被镇压的工人和农民工、被压迫学生、烂尾的业主们等等。广泛的阶级压迫造成广泛的运动潜力，这种压迫并不会因为是李克强还是习近平而得到根除，这只有实现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并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结果才能够得到根除。而自由主义者却总是希望其他更多群众们能像他们一样去追求换个主人来得到“民主”的结果。

五. 运动的问题

再说说运动本身的问题。首先，本次运动的最大问题自然是在用我们敌人名义和维护我们敌人利益的方式来和我们同样的敌人作战。这就证明着我们还默认着自己的奴隶地位，证明着我们是不敢反对整个奴隶主的统治的，证明着我们还是在做奴隶的斗争，就是那种至多争取换一个主人的斗争。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这和在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争取换一个总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一定要谈有什么进步意义，那么唯一的进步意义就在于使一些人至少敢去做奴隶范畴内的斗争了，而在此之前这些人们是连这种斗争都不敢参与的。

自由派们想裹挟更多的群众来一同实现他们的天真想法的打算再一次破产，正如六四的学生领袖最后的想法是利用和背叛其他学生、利用和背叛其他工人人们的斗争一样，今天的自由主义者的路线一开始就提出了背叛其他被压迫者的利益口号。正如他们和团派对“长江黄河不可倒流”的共同解读之一是不能倒退回“文化大革命”时期或者过去那种“社会的主义”时期。他们用自己那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无知、浅薄的知识来试图绑架其他其他群众。他们不能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也不懂民主的阶级性质，他们只是从一些个人崇拜的现象就得出了习近平等于毛泽东、今天等于70年代一样，李克强等于赵紫阳，坚持改革开放等于实现民主制一样，由于分不清奴隶主和人民英雄的区别，所以他们现在渴望换一个奴隶主来达到目的，把这种反动的解读内容当作了他们的运动口号。

但真正的历史是，推动人民群众一同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毛泽东同志得到了人民群众自发的崇拜。而坚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和其他所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造成我国新的阶级剥削、消灭劳动者政治权益的罪魁祸首。而过去所谓坚持民主改革赵紫阳也从来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甚至是其本人也是我国资本主义复辟时期大规模清洗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重要刽子手之一。

所以，如果我国的群众政治运动不能把运动的目的和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对立起来，那就不能得到任何有利于群众政治利益的让步，更不可能实现人民民主和革命目的。因此，今后参与政治斗争的人们，就应该认识到我国被压迫群众的整体阶级利益并以此为方向进行斗争，否则我们就不能进步。比方来说，如果今天的群众是争着焚毁李克强的画像和侮辱李克强，斗争效果会比悼念李克强好上很多倍，因为这就证明我国群众已经多少觉悟到了自己的阶级性。

第二，由于我们要为了被压迫群众利益而进行政治斗争，那么任何被压迫群众的受害现象都可以成为我们进行政治斗争的理由和参与政治斗争的方式。这样进行政治斗争的范围就可以扩大一万倍，政治斗争的方式也可以丰富一万倍，政治斗争的深度、持久度、继承性也可以扩大一万倍。

第三，整个运动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目标，运动没有具体的斗争要求、没有现实意义的口号。所以这是仅仅只是为了发泄一些错误情绪的运动，是盲动。当然，盲动已经比不动好了。但我们未来应该提出现实的服务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口号，还要使它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建立联系。比如我们可以明确的提出这样一些要求：自由结社、组建工会、言论自由、宣传自由、办报自由等权利。这些内容都是我们需要的内容，是可以增强被剥削阶级的斗争力量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还能为未来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和实现彻底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更好条件的口号。当然这么多目标很难一次性全部完成，在各种不同的具体斗争中肯定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考虑，然后一步步的完成我们的整个目的，我们总是要朝这个方向来彻底改变我们的整个运动的。

第四，运动没有组织。整个运动没有任何有继承性的群众组织和合格的活动家组织来负责，使运动松散无比，进行不了任何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更不可能战胜我们的敌人。可以说运动没有足够的组织性就解决不了以上所有的问题。

第五，我国群众运动的水平还极端落后、革命分子的工作极其不足，但就比较而言还是革命分子更不足一些。因为当部分群众多少参与了各种经济斗争或政治活动的时候，我国的革命

分子今天还是起不到对应程度的帮助作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进步的空间更大，主要是群众工作方面的空间。

因此，我们只要认真的汲取了以上的种种经验，并在未来刻苦完成这些工作，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未来和广大被压迫的奴隶们一同团结起来斗争，就一定能够实现被压迫者们自我解放的历史命运，使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得以实现。

评最近农村的阶级斗争

革社（RSF）编辑部

正如我们曾经在《评我国农业领域中的最新变动》所作的分析一样，农村变动的整体面貌是在朝着加速剥削农民的方向发展的，展现出我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加强对农民的镇压、剥夺农民土地、保证和扩大粮食产量的特征。而最近的一系列农民分散的农民斗争的发展又不断的给我们展现这些特征，并为我们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线索。

一. 维护土地的斗争

从农业农村部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和中国国务院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实施以来，农村土地流传的现象在我国继续发展，除了在生活条件的逼迫下放弃继续耕种土地的农民外，被强迫着“自愿流转”土地的现象在今天也到处都在发生，这些内容也是我们曾经指出过的，这将会导致农村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发展。除此之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不断的通过强征土地和退林还耕政策等方法来进一步的剥削、压迫我国农民。这些剥削、压迫主要都是针对农民们的土地，所以我国农村所必然要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斗争就是农民维护土地和个人利益的斗争。

比如在10月26日的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县政府两年前拍卖了本县的基本农田，但另外一方为了保证耕地面积达到“占补平衡”的要求，于是又要去扩充耕地，所以他们甚至跑到了山区强拆老百姓牛棚来达到目的。强拆、强占的现象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如在11月8日，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永二村，政府毁约强行收回土地，并且出动警察、公务员等镇压维权的代耕户，并且打伤了村民。11月11日，由雷波政府派出的千人强征队进入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黄琅镇马湖乡唐家山村强拆民房，与当地彝族村民爆发激烈冲突，多名村民遭到警察抓捕，另有多名村民受伤入院，当地手机信号一度遭到屏蔽。

除了强拆、强占土地，也有破坏土地的现象。在10月下旬的河南滑县老店镇，有上百亩耕地未经村民签字同意就遭高速公路建设方毁青、滥挖取土。施工方是这样表态的：

针对近日有网友反映“滑县高速公路建设非法取土”问题，作如下说明：

安罗高速是重大交通工程项目。为确保项目顺利建设，滑县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严格按照政策，编制了取土复垦方案，并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复。

该项目取土地块为一般耕地。取土前，乡村两级干部与群众积极沟通，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并及时按政策补偿到位。取土时先剥离表层熟土30公分，取生土用于项目建设，熟土进行回填，达到复垦验收条件。

-滑县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
2023年10月24日

当地农民在报道称中“事先没经过我们同意。”虽然有情况显示，事后官方给村民的赔偿方案是一亩地赔 6000 元，部分村民的赔偿款已“被强行打到了社保卡账户”，但许多村民们“不同意这种赔偿”。对于“回填”“达到复垦验收条件”，被采访农民说：“地里的线缆也被破坏了，即使种上其他作物，也没法儿灌溉。”而且回填土多为沙土。还有村民称，被挖取土后因回填不及时，耕地出现了严重积水问题。并从长城网的采访中表示，被取土后的耕地变得坑洼不平，部分耕地积水严重。而面对记者的询问，官方只是继续踢皮球。但很可以很清楚的查到的是，10 月 24 日，据新京报报道，滑县一被取土区村干部称：临时征用土地取土的手续上有村委盖章，但不清楚是否召开过村民大会征得同意。那么问题就很清楚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选择破坏了农民的利益、破坏了土地这个农民最主要的生活手段。

除了农民的土地以外，农民的住房也破坏，大量的农民成为无家可归者。如在甘肃兰州一地的农村，政府拆迁了村民的农村自建房 15 年，不给建房不发过渡费，无人问津，导致大部分老人长期消耗下生活逐渐贫困，不得不前往市信访局维权。有 80 岁老人哭诉：“政府把我们害苦了”，她表示原本自己 15 间房子，如今全家四散到处找便宜房子租，跟家破人亡一样。而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镇四村，同意因为政府拖欠返迁费、以及不为村民购买失地保险和回迁房没有大产权等原因，导致村民拆迁十年后仍未能住进安置房，村民连日围堵镇政府。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二里店村，在政府的拆迁安置房烂尾后，要求村民自发筹钱将其建好，但没想到当地政府因为有利可图，一直拒不交房。11 月 15 日，数百村民持横幅行进至汝州市政府，将政府大门堵得水泄不通。

除此之外，“退林还耕”的政策现在也成为了通过破坏我国农民生活手段的和土地来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因为一边存在着强征农民土地的现象，大量农田成为了非农业用地，丰富了各级官僚资产阶级的腰包，但也使得粮食生产也不得不受到影响。所以另一边为了保证耕地红线和粮食产量那就要另外增加粮食耕种面积，在“退耕还林”以前，官僚资产阶级们主要通过把农民驱赶到更偏远的山区开垦新农田的方式来达到，现在也开始大量通过“退耕还林”的方式制造耕田、出现了强迫一些靠种植经济作物和农副生产而较为富裕农民改种粮食。如在 11 月，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小草坝镇，当地政府为了响应“退林还耕”政策，决定将镇上竹林悉数推平，而竹笋种植产业是全镇的支柱产业，引发了当地农民不满，与地方政府发生多次冲突。而同一时期，河南开封的乡镇政府为完成“退林还耕”任务，在没有任何赔偿的情况下将农民用来养蚕的树推平，要求改种小麦。

这种政策也加剧着我国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 11 月 10 日海南省东兴镇东兴村村委会土地整治项目工作会议上，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符策武和约 20 名村名代表产生了矛盾。这一次会议主要是讨论“退耕还林”的问题，镇长所提出的具体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得到在场的村民的认可，这位镇长突然大怒拿起矿泉水瓶砸向前方的桌子，而此时一个村民也拍案而起，随后，越来越多的村民拍案而起与镇政府代表产生了冲突。在这次会议里，村民们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的对立了起来。

“退林还耕”的政策强迫让种植经济作物或从事其他较高收入的农林副业的农民种植粮食，它侵犯着农民的个人利益。它不仅使大量农民变得更加贫困乃至破产并且也势必要威胁到我国工业的稳定。工业所需要的除粮食之外的工业原料势必要大量的减少，使得我国工业越

来越依赖国外的原料进口进而增长我国的帝国主义寄生经济性质和我国人民消费支出。这种政策在今天得以大规模的实行也足以反应出我国农民和我国农村的地位，农民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奴隶、农村成为城市的附庸，所以才会出现这样野蛮和不合理的政策。它反映着我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张极其丑恶的面目，他们恨不得把农民吃干抹尽，他们一边通过破坏农民们的生活、强占农民们的土地来扩张城市的影响力，把本来上好的农田变成钢筋水泥，再通过让农民改去更偏远和条件更困难的地方进行耕种或者把富裕农民变成贫困的农民的方法保证粮食产量，这样就在同一头牛的身上剥下了两张皮，我国农民怎么不反抗呢？

二. 维护集体利益的斗争

我国是一个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国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复辟后为了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利用国家机器给农村造成了新的制度。涉及每一个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和承包制就是今天我国农民的利益所在，这就决定了我国农民普遍会有至少这两个重要方面的物质利益。如果说承包制代表的是我国农民对个体土地、对自己的土地、也就是对自己的个人利益；那么集体所有制代表的就是我国农民的集体利益。这种集体所有制虽然目前已经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国有制下的附庸，被资产阶级的利益所绑架，但就其内容它还联系和维护着今天我国农民们从过去社会主义时期继承下来的集体资产、集体利益。所以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农民们为了集体利益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为了维护从过去继承下来的集体资产，但在很多时候这种斗争也已经不限于维护那种集体资产了，这便是我国农村中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斗争。

在11月的江苏无锡，因村办集体企业面临破产，无锡市江阴市华士镇向阳村数百村民于11月12日发起维权，追讨被拖欠的失地补贴。14日，村民一度游行到街头，但迅速遭到赶来的大量警察阻拦。截止15日，村民的维权行动仍在持续。而在11月13日上午，福建省漳州市台商投资区龙池片区角美镇金山村数百村民，因不满当地村委卖地后不分钱，还要继续变卖村里的集体资源，遂将村口的G228国道阻断进行抗议，导致G228国道厦门至漳州段交通大堵塞，大量车辆滞留。

以上两个斗争是村民们维护自身在农村的集体企业、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利益，这样斗争还属农民们维护集体资产的斗争，这些资产全是过去社会主义时期遗留给我国农民的，直到今天这种集体所有制也以特殊的形式继续延续在我国乡村，虽然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和经常的侵犯下，这些资产已经被实际上的夺走许多了。

复辟者为了盗取长子的合法财富，他们通过承包制欺骗农民、鼓动他们放弃更大的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从一整个团结的阶级变成进行小生产的松散阶级，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针对农民的现代“推恩令”罢了；而另一边复辟者又在《土地管理法》中不得不这样的承认：“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种行为也只能看作是为了不激起农民的社会主义进步性、为了博取农民的信任后再方便用盗贼和强盗的手段把遗产夺过来的手段，正如他们今天所作了那样。但这样行为也只能说明篡位者终究是篡位者，盗贼终究不

能以主人方法来使用财富，而长子的继承权始终是存在的。因此，只要过去共和国的孩子们只要觉悟过来，只要能够进行彻底的斗争，他们就一定能把一切失去一切财产夺取回来。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斗争，农民们为争取自己其他的集体利益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在我国条件下不得不看作是某种程度上维护自身的主人翁利益的斗争。如在11月7日，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英庄镇前英庄村，村民抗议政府把污水处理厂建到居民区附近，随后遭到大量政府人员殴打和扣留。而在11月9日，为抗议政府在村子里修建火葬场，辛史村上百村民于上月末发起维权行动。大批警察以及政府人员进入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王庄乡辛史村，他们镇压维权村民，打伤并抓走多位村民。而在同一时期，广西玉林市北流市北流镇六行村，政府在没有征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在村民的水源地上建火葬场，引发村民不满，于11月开始维权。

以上这些内容将说明我国农民今天的阶级斗争的特征不同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农民的阶级斗争，前者一种情况的农民不仅要为了个人利益进行斗争也更要为了维护集体资产、集体利益、集体所有制和农村长子权的斗争，而过去农民斗争的情况更多的只是为了消灭地主的统治而维护小土地私有制和私人利益所进行的斗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就如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农民的阶级斗争不同于旧中国封建史的农民阶级斗争一样，今天农民阶级斗争的主要性质、主要形式也和过去完全不同了。今天的我国农民既要既维护个人利益，也更要维护集体利益，维护集体财产，集体所有制，否则他们就一无所有，这种斗争在今天不得不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这种性质在今天的条件下也是农民斗争主要的性质，即恢复过去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阶级斗争。

三.斗争的方向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这段内容精辟的描绘出了小农这个阶级的社会面貌和阶级特征。中国今天的小农在许多因素上和马克思所论述的这一时期的法国小农是一致的，但从整体的社会特征来看也有了许多根本不同的地方，这个不同是由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工业化的普及以及我国特殊的土地制度所造成的。虽然今天中国的小农由于他们生产方式同样促使他们互相隔离、难以利用科学、缺乏多种多样的发展和丰富的社会关系、难以形成一个阶级。但在今天的中国，商品经济对农村已经具有了绝对的优势，农业也被拉入了城市工业的轨道中。小农在今天中国的生活中所需要的绝大多数生活资料、以及包括种子、化肥等在内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资料也必须主要通过商品交换来获得，他们需要向市场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来养活自己，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就不能保证自己基本的生活条件和基本的农业收入。小农的劳动在今天的中国也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受生产费用和供需关系的主要影响。今天的小农离不开商品交换，而商品生产在今天又被我国的资产阶级的所控制着，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着他们的，于是他们就成为城市的附庸和资产阶级的附庸。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边是促使整个小农互相隔离、阻碍科学应用和社会关系发展的小农的生产方式，另一边是资产阶级强迫整个小农阶级要靠市场经济的方法活着。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冒充这个人的人，而他冒充为这个人，只是因为他一根据 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中的一条：《La recherche de la paternité est interdite》（“不许寻究父方”）——取名为拿破仑。经过了二十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儿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里的情况比起法国的小农迷信着实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但能保证他们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人物拿破仑，中国小农们更迷信毛泽东。而毛泽东恰恰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他所代表的恰恰是完全不同的历史情况。于是情况就整个的反了过来，过去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代表着革命农民、代表着力求摆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代表着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代表着农民的开化、代表着农民的理智、代表着农民的过去（社会主义时期）也更是代表着农民的未来。

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为了巩固政权，中国新兴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们选择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小农的生产方式、恢复私有制。但由于过去革命消灭了整个地主阶级、由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由于人民公社所造成的整个私有制根基的消灭、由于工业化的实现、由于封建的物质因素已经彻底的消失于中国大地，所以他们必然只能恢复一种不是地主阶级主导的、没有封建生产方式的、服从于工业化的、服从于国家主导下的“集体所有制”的特殊的小农

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也就是通过承包制下的小农生产和商品经济而活着的新小农。这种特殊的小农阶级一经诞生，和他利益唯一对立的阶级就只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了。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到处都在消灭小农在承包制下的个人土地、消灭他们的生存手段，到处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等方式掠夺小农，并盗取他们的集体资产、集体利益。而今天的小农如果要实现自己的利益的话，就不可能去要求恢复那种已经被大半个世纪以前革命所消灭的古老中国博物馆中的彻底的土地私有制，因为这种制度一恢复马上就要导致农民更彻底的失去自己的土地（被通过私有交易手段大量夺走），并且还将彻底失去自己一切的集体资产、集体利益和农村的长子权。今天的小农只能在无产阶级力量的帮助下保住他们承包制下的个人财产，并通过恢复“集体所有制”的真正阶级性质、恢复社会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和集体的大农业生产方式、恢复农村和城市的平等地位等过去社会主义时期的方法来使他们集体的富裕起来。

所以今天的中国的工农联盟便是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盟，而不是某种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联盟。在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最为强大，他们需要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今天的我国农民也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恢复他们所失去的一切，因此这样工农联盟不同于过去的工农联盟，这是一种必然要求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农联盟，这样的工农联盟不需要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来作为过渡阶段，因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在我国已经发展到了极致、而社会主义的线索却联系着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制都是更有害于他们的利益使他们受陷于更深刻贫困的陷阱。

所以我们应该喊出这样的口号：

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消灭一切剥削、压迫的现象，实现社会主义！

简评上海某中学学生学农期间发生的卫生事件

革社（RSF）编辑部

一. 事件曝光

11月18日，上海市北中学学生在微博发文称，上海中学生学农教育活动出现大面积感染，学生集体爆发腹泻，呕吐，发烧等症状。

据悉，依据上海市教委规定，市北中学，田家炳中学，风范中学从11月13日开始在东海农场进行为期5天的学农教育活动。

在11月15日下午、晚上及11月16日凌晨时，市北中学集中爆发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市北中学参与学农的学生有超过23.3%出现病症。

但是本次卫生事件至今未获得来自学农基地、学校或其他任何官方渠道的答复与解释，没有来自它们的任何消息，更没有来自它们给予的任何补偿。

该名学生在文章中介绍了东海农场的环境，主要问题在于学生宿舍、餐厅的洗手池、开水房的水龙头、澡堂的淋雨喷头等大部分生锈、损坏、有异味，而饮用水是由一辆三轮车载油漆桶提供，其水龙头同样存在严重问题。除此之外，室内空调积灰短路、缺乏消防安全设施及应急医疗救护场所等问题也极大地危害着学生的安全。而10元的早餐仅有白粥、限定数量的白馒头、菜包、煮蛋、咸菜，教官还要求学生上交未吃过的白馒头及煮蛋，这也让学生们怀疑回收的食品被用来当作第二天的早餐内容。还有同学发现晚餐发放的橙子已经发霉变质。而教官们也态度散漫，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极不注意个人卫生。

到了第三天下午，也就是11月15日，市北中学的学生开始陆续发病，出现上吐下泻、发热、头晕、贫血等症状，送医检查后大部分患病学生被确诊为急性肠胃炎。到了16日上午，市北中学决定提前组织学生返校，并统计学生的就医和住院情况。

不难想到，学校等相关部门对此次事件采取的做法就是打压涉事学生，把热点压下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舆论风波尽快平息，以维护学校及相关部门的利益，在这样的事件发生时，他们的利益与受害学生们的利益之间就变成了不可调和尖锐对立的矛盾，这就是事件揭发者没有想通的问题“为什么没有给受害学生补偿、中学生的权利由谁来保障”的答案。无论平时校方为保护学生安全采取了多少措施，那也是在维护校方自身的利益，为了取悦上级主管部门、为了和其他学校竞争。一旦真正发生安全事件，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摘下伪善的面具，坚定地站在受害学生们的对立面。

二. 市北中学

上海市的市北中学前身是唐乃康于1915年创办的私立市北公学，最初只有小学部，后逐步发展初中和高中部。

唐乃康先生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上海起义，在讨袁二次革命遭遇失败后，他便在上海创办了这所学校，孙中山及蔡元培、于右任、林森等国民党元老都曾为该学校题词，唐乃康也在国民政府中任职。1932年该学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而化为废墟，唐乃康为了重建学校四处借贷，最终难以为继而将学校上交给上海市教育局，该学校从此成为了公立中学。

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了该学校。1954年，该学校被评为上海市重点中学之一。1994年，原闸北中学并入该学校。2005年，该学校被命名为首批“实验性示范性高中”。2009年该学校与其它24所上海重点高中组成了上海大学自主招生选拔联盟。该学校高考的重点大学升学率为80%左右，复旦和上交的录取率达到了20%以上，除此之外，该学校在学科竞赛及音乐、体育等方面也有突出表现。然而，一些毕业于该学校的网友表示，该学校与上海“四校”有着很大的差距，该学校主要是以高考为导向，并且以理科为主，在学科竞赛、高校自主招生以及文科方面存在缺陷，还面临着资深老教师陆续退休、青年教师水平不足等问题。

可见，在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上海市，这所百年老校只能算是一所二流重点高中，因为它不能满足出身于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学生在高考之外的多样化需求，在跟其它重点高中的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该学校此次响应上级号召参加学农教育活动，大概也是为了丰富教学活动内容、争取更多荣誉、提高学校的吸引力，却不料适得其反，把活动搞砸了，严重损害了学校名誉，因此他们绝不允许事件发酵，力求把事件影响降到最低，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放下良知，对学生们受到的伤害不管不顾，对事件的揭露者、传播者进行威逼利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校方的利益损失最小。

三. 学农教育

在中学时代参加过“学农教育”的人可能并不多，因此“学农教育”这个词对于很多人来说比较新奇，这里作一下简要的说明。

据媒体报道，“2020年3月20日，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意见》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正被淡化、弱化。对此，全党全社会必须高度重视。

《意见》要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国务院的这个意见中可以看出应对躺平现象之意，统治者试图改变青少年不愿努力劳动的局面。2020年7月7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其中详细规定了劳动教育的性质和基本理念、总体目标和主要内容、途径、关键环节和评价、整体规划和组织实施、条件保障与专业支持。

其中，《主要内容》包括“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中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而生产劳动教育“要让学生在工农业生产过程中直接经历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体验从简单劳动、原始劳动向复杂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发展过程，学会使用工具，掌握相关技术，感受劳动创造价值，增强产品质量意识，体会平凡劳动中的伟大。”

在《学段要求》中，普通高中的部分有这样的要求：“统筹劳动教育与通用技术课程相关内容，从工业、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项目中，自主选择1—2项生产劳动，经历完整的实践过程，提高创意物化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品质，增强生涯规划意识和能力。”

在《劳动教育途径》中，有一条是在课外校外活动中安排劳动实践，具体要求如下：“将劳动教育与学生的个人生活、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丰富劳动体验，提高劳动能力，深化对劳动价值的理解。”“大中小学每学年设立劳动周，采用专题讲座、主题演讲、劳动技能竞赛、劳动成果展示、劳动项目实践等形式进行。”“普通中学、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兼顾校内外，可在学年内或寒暑假安排，以集体劳动为主，由学校组织实施。高等学校也可安排劳动月，集中落实各学年劳动周要求。”“建立协同实施机制”“中小学要推

动建立以学校为主导、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协同实施机制，形成共育合力。”“学校要与相关社会实践基地共同开发并实施劳动教育课程。”

上海市教委发起的为期五天的中学生学农教育活动，就是在贯彻落实教育部的上述要求。

在《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中，关于实施机构和人员，“学校要建立健全劳动教育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明确主管校领导，设置机构或明确相关部门负责劳动教育的规划设计、组织协调、资源整合、师资培训、过程管理、总结评价等。”“要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教师队伍。根据学校劳动教育需要，明确劳动教育责任人，进行劳动教育规划、组织实施、评价等，配齐劳动教育必修课教师，保持教师队伍的相对稳定性。要充分发挥教职员特别是班主任、辅导员、导师的作用，利用少先队、共青团、党组织以及学生社团等各方面的力量，合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家长及当地人力资源，聘请相关行业专业人士担任劳动实践指导教师。”

然而，在上海东海农场举办的这次学农教育活动中，教官们因为态度散漫、不注意卫生而被多数学生评价为极不专业，不知道这些教官算不算教育部文件中要求的所谓“劳动实践指导教师”，学生们似乎把这次活动类比为他们更为熟悉的军训活动，因此习惯性地称呼指导者为“教官”，教育部文件中通篇都没有使用过“教官”这个词，在学农教育活动中，本就不应该出现“教官”这个岗位。一些中学和大学会在校外选择一些拓展训练基地作为刚刚入学的新生军训的场所，而军训活动早已变成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学生们使用的“教官”这个称谓反映出所谓的学农教育活动更是流于形式，无论是学生还是学校老师还是临时聘用的“教官”们，都没搞明白学农教育跟军训之间的根本差别，或者说他们都认为没有必要搞清楚二者的差别，仍然按照旧的套路去应付这种活动，他们只需要把学生带到基地“教育”五天就算完成了这次任务，至于是军训还是学农都无所谓。被学校拿来当作借口的说辞“学农就是让学生去吃苦吃亏的”，也同样被用于很多学校的军训活动中，似乎无论是军训还是学农教育还是其他类似活动，只要学生吃到了苦，就算完成任务了。

在《劳动安全风险防范与管理》中，“学校要把劳动安全教育与管理作为组织实施的必要内容，强化劳动安全意识，建立健全安全教育与管理并重的劳动安全保障体系。”“要依据学生身心发育情况，适度安排劳动强度、时长，切实关注劳动任务及场所设施的适宜性。科学评估劳动实践活动的安全风险，认真排查、清除学生劳动实践中的各种隐患。在场所设施选择、材料选用、工具设备和防护用品使用、活动流程等方面制定安全、科学操作规范，强化劳动过程每个岗位的管理，明确各方责任，防患于未然。制定劳动实践活动风险防控预案，完善应急与事故处理机制。要特别关注劳动过程中的卫生隐患，按照疾控、卫生健康部门及行业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切实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鼓励购买劳动教育相关保险。”

很显然，这次学农教育活动违背了教育部文件精神，没有建立完善的劳动安全保障体系，没有评估、排查、清除劳动实践中的隐患，没有制定风险防控预案和应急事故处理机制，而教育部特别强调的卫生隐患更是被严重忽视，导致了这次卫生事件。为什么学校敢于公然违背教育部文件要求呢？这是因为，教育部的文件看似面面俱到，实际上其中的内容是分轻重缓急的，有一些是硬性规定，下级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而另一些则可以灵活掌握。卫生安全这一块就是如此，只要不出问题，教育部及相关监管部门通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关心学生群众的安全健康，他们的利益在于保持自身的社会名誉，同时完成国务院交代的任务，只要这件事做了就算任务完成，不出差错就行。一旦出了事，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竭力掩盖事实真相，如果学校没有处理好，让事件影响扩大，那就是给上级部门领导添了麻烦，上级部门就可以根据教育部的文件治学校的罪，通过牺牲学校的利益来保住上级部门的利益。但是这次事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学校成功地化解了危机，这就是学校不认真执行教育部文件要求的底气，他们不采取卫生安全措施，未必会出现大范围卫生事件，即使出了问题，凭借学校及相关部门的力量也可以把事件压下去，而不会让学校的利益受损，至于学生的利益是他们从始至终都不会去考虑的。

在《劳动教育条件保障与专业支持》的条件建设部分，有一条“丰富和拓展劳动实践场所”，“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规划和配置劳动教育实践资源，满足学校多样化劳动实践需求。”

充分利用现有综合实践基地、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劳动实践场所，建立健全开放共享机制，特别是充分利用职业院校实训实习场所、设施设备，为普通中小学和普通高等学校提供所需要的服务。”“可安排一批土地、山林、草场等作为学农实践基地，确认一批厂矿企业作为学工实践基地，认定一批城乡社区、福利院、医院、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公共场所作为服务性劳动基地。”

此次事件发生在“东海农场”，而据涉事学生称是在桃源路58号，实际上这里是“大东海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是上海市定点中小学生学军、学农课外实践基地，上海市的很多学校都会组织刚入学的新生在这里进行军训，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农场，而是与学校或有关部门某些领导利益挂钩的合作机构，是官僚资产阶级创收的渠道。实际上，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主席就提出了要劳教结合的主张。在上世纪50年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写进了党的教育方针，纳入宪法。学工学农、开门办学等，都是那个时代的创造。

据了解，当时的学校也是定期举行这类活动，一般为期半个月或一个月，学生们去工厂车间或农场中与工人或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不是入住某个专门为接待学生而设立的基地，工人农民吃什么喝什么，学生们就吃什么喝什么，而不是专门建立学生食堂，当时的农民喝村里的井水，学生们就也从井中打水来喝，因此并不是为了去吃苦而吃苦，而是真正地体验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卫生条件当然也与真正的劳动者所处的环境一样，并不像现在的这种基地，学生一走就荒废闲置没有人维护，导致设备生锈积灰。当时的农民、工人直接作为学生劳动实践的指导者，而不需要另外聘请专门的指导老师，更没有所谓“教官”，农民、工人平时需要进行的劳动，就让学生们参与进来协助他们一起劳动，赶上什么活就干什么活，让学生们体验到真正的劳动过程而不是形式化的模仿，这样才能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认识到“劳动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认识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

总之，学生学农教育是有意义的，但现在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教育部门只会把学农教育搞成这样形式主义的东西，完全背离了学农教育的宗旨，不仅损害了学生们的利益，还会让学生们对于学农产生极大的反感抵触情绪，否定学农的意义。

2023 年 10 月中上旬到 11 月中上旬工人运动的趋势

革社（RSF）编辑部

我们收录了发生于 2023 年 10 月 13 日至 11 月 12 日期间发生的 182 起工人讨薪事件，与上月数量相比变化不大，其中超过 100 人参与的有 28 件，比上月有所增加。

从地区分布来看，广东省发生了 44 件，比上月明显增加，反映出广东省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其它地区阶级矛盾的缓和。其余省份数量分别为：山西 2，山东 11，河南 8，河北 9，北京 2，天津 2，辽宁 6，黑龙江 7，吉林 4，安徽 2，江苏 12，浙江 9，上海 2，福建 2，江西 3，海南 3，云南 3，广西 6，贵州 6，四川 7，重庆 1，青海 2，新疆 4，湖南 5，湖北 3，陕西 7，甘肃 6，宁夏 2，内蒙古 2。

从行业分布来看，建筑业发生了 118 起事件，制造业 43 起，服务业 18 起，交通运输业 8 起，教育业 5 起。建筑行业仍然是主要的斗争领域，其次则是制造业。从企业性质来看，民营企业有 115 起，国有企业 59 起，事业单位 3 起，外资企业 3 起，港澳台企业 2 起。民营企业是主要的斗争领域，其次则是国有企业。

工人群众诉求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欠薪，索要工厂关闭或搬迁补偿，还有少量要求解决社保问题的。群众主要采取的维权和斗争方式有，抗议游行，阻塞交通，静坐，威胁跳楼，上访，要求劳动司法部门介入，网络曝光，求助媒体，申请仲裁等。斗争仍然是经济主义的。官方作出的反应，组织集体协商谈判的有 11 起，政府介入事件的有 8 起，警察出动的有 16 起。

第四部分 读者投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星火分散各地，但只有革命力量的集中才有革命事业的发展，我们意图推动这个集中和发展。这一部分文章是非我们编辑部创作的，而是直接向我们投稿的同志们的文章。我们精选其中质量较好，适合我们刊物主题的部分整编在了这一部分内。感谢同志们的投稿、支持。读者们也可以以此参考我国各地革命者的文章。

官僚制综述

同志来稿

官僚制(bureaucracy)，又称科层制，是资产阶级学者马克思·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提出的、广泛应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组织的一种管理制度。对于一些对“官僚”认识不清的左翼学者来说，“官僚”常常被认作社会化大生产中的管理人员。然而，“官僚”和管理人员并不等同，而是专指官僚制这种管理制度下的管理人员。这种把“官僚”等同于管理人员的错误认识可能来源于左翼学者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了解有限。通过对官僚制的概念、产生与发展以及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进行简要介绍，帮助左翼学者了解资产阶级管理学中已经明确概念且深入研究的官僚和官僚制。

1. 官僚制的诞生与发展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这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以内”的方法，一是垄断保卫能力为暴力机器，不允许被统治阶级持有武器，剥夺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手段。如一些国家严格的禁枪令、秦朝的“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鋌，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贯穿中国古代史的禁止私藏甲冑等。二是垄断管理能力为意识形态机器，不允许被统治阶级参与社会管理活动，剥夺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意愿，如奴隶制社会中允许奴隶主、自由民直接民主或参政议政而奴隶及妇女无相应权利。需要对于官僚制之前独裁制的更多描述及历史案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渐发展至封建社会，需要整个社会集体配合的活动也日益增加，规模日益扩大，如水利工程的建设、军事、城镇堡垒建设等，统治阶级中的个人越来越无法以个人的能力及学识管理社会的所有方面。适应这种需要，出现了官僚制的萌芽：统治阶级各分管某一方面。这种分工是临时的而非职业的。一个人被任命为某一部门的管理者更多是出于不会将该部门据为己有的信任，这种信任基于其为统治阶级一员及血缘关系下长期生活的过往经验，对于部门管理者管理能力的要求更多也仅限于能够维持该部门的存在。

需要临时分工的描述及历史案例在中国，由于长期的水利建设这种需要整个社会集体配合的活动的需要，因此官僚制的萌芽较为发展。需要中国有关水利工程官僚制的描述及历史案例

然而整个社会的生产依然是广泛的小农生产，生产领域不存在官僚制，而是宗法制度下族长的独裁制。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手工业工场及大工业工厂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各领域生产的广泛社会化。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生产规模还不大，一个资本家配以少数监工即可管理少数工厂。此时管理方式仍以独裁制为主。随着生产规模的愈加扩大，各领域生产的广泛社会化急需相应管理制度的发展，统治阶级常常向被统治阶级发出号召，参与管理活动，需要号召参与管理活动的历史案例 如何控制管理统治阶级之外的统治阶级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也越发重要。这种背景下，资产阶级看中了封建社会末期诞生的管理制度——官僚制。

最早提出官僚制理论的是德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认为，官僚制是指一种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依照既定规则持续运作的行政管理体制，其特征为管理活动的职业化和管理人员之间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种特征满足了资产阶级对于社会化生产的管理的需要，适应了资产阶级“不扩张就灭亡”的竞争压力。

管理活动的职业化，即管理人员专门从事某一特定领域的管理活动而非临时任命。如学习行政管理的相关活动、从事相关的管理工作。管理人员内部严格的等级制，即组织内人员地位依照等级划分，下级对上级负责。等级制既满足了管理活动自上而下指令传递的高效性，又符合资产阶级对管理机构控制的需要。

2. 官僚制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

如今，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任何稍大规模的企业，资本家都不可能独自管理。资本家个人的管理活动在大型企业中已经消失。典型的例子如著名的“狗狗资本家”冈瑟四世。资本家主动或被迫地完完全全和劳动相分离，包括管理劳动。而官僚制，就是资产阶级在和管理劳动相分离，彻底成为资本主义的代表以后，为了团结负责管理者而建立的具有严格等级制、专人专职专责的管理制度。

它具有如下的特征：

层级体制。“所有岗位的组织遵循等级制度原则，每个职员都受到高一级的职员的控制和监督。”组织内职员的地位，依照等级划分。下层对上层负责，服从上层命令，受上层监督。上级对属下的指示与监督，不能超过规定职能的范围。

专业分工。组织内每个单位、职员有固定的植物分配，每一个人的权力和责任都是名族恶的。根据严格的分工知足，所雇用的职员须具熟练的专门技术。

依法行政。官僚制的组织活动是“由一些固定不变的抽象规则体系来控制的，这个体系包括了在各种特定情形中对规则的应用。”法律和规章制度是组织的最高权威，任何组织成员在

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遵守。处理事务一切须按法规所定的条文范围引用，不得渗入个人因素，用以维持统一的标准。

非人性化。“理想的官员要以严格排除私人感情的精神去处理公务，没有憎恨和热爱，也因此不受感情的影响。”官僚制要求职员公私分明，从公务中排除爱、恨等各种个人的感情，尤其是那些非理性的、难以预测的感情，是保证公平和效率的前提条件。

量才用人。组织的用人是根据人员的专业技能、资历，不得任意解雇，升迁按个人的工作成就而定，薪资给付也按照人员的地位和年资，透过绩效管理审核。

永业化倾向。人员任用是经由公开考试或法定程序，两者间订有任用契约，若非犯错，不得随意解雇免职。

其中，第一点构成等级制，后五点构成了职业化，即专人专职专责。

3. 官僚制的缺陷

3.1 官僚的阶级划分

官僚进行某一领域的职业化的管理劳动，不产生资本积累，而是为资本积累提供必要的条件。官僚的所得来源于资产阶级剥削所得的分配。整体上而言，官僚属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劳动而非劳动力的交换。这是资产阶级吸收转化小资产阶级这一资产阶级坚定的同盟军的结果。然而随着官僚制的日益发展，等级制令官僚愈发脱离生产劳动，等级越高的官僚越与一线生产劳动甚至管理劳动相分离，越来越成为寄生在资产阶级这一劳动人民身上的寄生虫身上的寄生虫。资产阶级愿意团结的同盟军，从与封建主斗争时的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小资产阶级，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寄生虫的寄生虫，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在这里得到体现。

3.2 官僚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负责管理社会的官僚是资产阶级的同盟军。然而，在如何分配资产阶级的剥削所得上，有着分歧。

政治层面，某些国家，资本家收买官僚，对利益分配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某些国家，官僚和资本家是合作关系，甚至由于历史原因，官僚掌握着利益分配的主导权。当然，官僚作为管理机器可以获得利益分配的统治地位，军队作为暴力机器有时也可以获得利益分配的主导权，典型的如军政府。当然，对于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官僚、军队、大资产阶级谁取得利益分配的主导权，不过是“改朝换代”。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削压迫的地位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有剥削走的利益归谁所有。

经济层面，由于所有和管理的分离，管理者试图将受管理的社会部门占为己有的尝试越发露骨。需要对于官僚夺取的更多描述及现实案例；需要大量补充 资产阶级管理中格外重要的研究，主要就在于如何防止职业官僚利用管理劳动将资产阶级的所有物据为己有。

4. 结论需要补充

官僚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地位及相互关系”这一要素。官僚制的形成是“所有”和“管理”相分离的结果。如何打破官僚制、如何建立新的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亚于如何打破私有制、如何建立全民所有制。

1976年前，生产关系还未得到彻底的改变，这是生产力有限的缘故。所有制的改变不彻底，农村占主导地位的是集体经济，同时一些个体经济仍未得到改造；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地位及相互关系的改变不彻底，管理方式仍是以官僚制为主，一些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地区甚至是独裁制独裁制需要历史案例的大量补充；由以上两者决定的消费和分配方式的改变不彻底，存在着八级工资制，有些地方还有特供商店。

反对官僚制但不以现实的新管理制度代替之，是“空谈民主”。至于为什么反对官僚制看起来很突出，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上最顽强，受破坏最少，因而在管理制度上与官僚主义者的斗争表现出来的就格外激烈，然而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与衰亡着、垂死挣扎的资产阶级残余做着全面进攻。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最大的民主”：民主不是投票选举、一人一票这种表面形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无产阶级在社会上占多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专政，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是最大的民主。

对官僚制的改造和对新型管理制度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和“政治上的民主靠的是专政。一个阶级的专政可以没有民主，但是民主离不开专政”的讨论相类似，不能被认为是“顶层设计”。

RSF 编辑部评：

投稿同志关心生产关系方面的改进问题是值得赞赏的，这些内容也值得参考。但在另外一方面，同志把民主和专政问题同生产关系的关系所混淆了，也把民主和专政的关系和区别也混淆了，同志更多参考一下马列毛在这方面问题上的各种情况提法然后再做综合考虑。同志也可以看本刊物的第一篇文章《论民主集中的问题》来详细了解民主集中的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最大的民主应该指的是民主和专政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即对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对其他阶级的专政。而不能完全把专政和民主等同于一个东西，否则民主制和民主集中制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其他的条件下或不同时期时，列宁和毛主席都论述过民主集中制，因此不能用列宁在论述专政问题情况下对于民主的提法而把这个问题的所有内容所等同了。其次，民主和专政属于政治方面的范畴，主要是上层建筑，而不是经济中的生产关系，自然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有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但它和生产关系本身是有区别的。过去中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当然它不是最后一种，它自然也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也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本来就具有资本主义因素和共产主义因素的二重性，因此我们强调不断的改进生产关系。

而在相互关系方面，中国过去并不一直都是所谓的“官僚制”。过去中国恰恰批判过这个类似问题，但当时的提法是以批判“一长制”为标准的，中国通过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推动实现了“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明显不属于“一长制”的范畴也不属于“官僚制”或“独裁制”的范畴。“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内容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企业领导干部、技术或管理人员和工人相结合。

“运十”飞机的历史就可以看作这种生产管理制度的例子，运十在研制和生产过程中都采用了三结合。“设计、工艺、工人”三结合，“设计院、工厂、用户”三结合，“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关于运十生产的具体内容，有许多资料，在他们的手中，运十飞机本体100%国产化，机载附件95%国产化，造出了大型涡扇八发动机及试车台架。运十是上海公社的产物之一，他们的生产关系已经脱离了一长制而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当然，这个已经完成了的项目最后被邓小平给消灭了，飞机被遗弃和生产线被拆除。这种管理制度最终也被终止，这里恰恰反应的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生产关系的方面。

第五部分 宣传内容

本部分是用来专门刊登宣传内容的文章，除了一部分革社认为需要的政治内容外，这部分文章也具有更多的工作性质。

发展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的号召

革社（RSF）编辑部

如今，多个革命组织的同志们达成了一个马列毛主义力量的统一战线。我们在这里号召我国更多优秀的、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组织加入统一战线。同样的，我们也希望一些优秀的同志能够加入我们统一战线目前正在进行的种种革命工作，发展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

1. 对于想做电报群的宣传和电报群的组织工作的同志，我们邀请你们加入东风同志们的组织。
2. 想做时评、日报、月刊等宣传工作的同志们，我们则邀请你们加入斗争公社的组织。
3. 想专门创作理论方面或其他方面较高质量文章创作工作的同志们则可以加入革社（RSF）。
4. 而想做线下组织工作的同志们则可以选择加入革社（RSF）或东风。
5. 而想现在参与融工工作的同志可以联系“到工人中去”的同志。
6. 想参与理论学习、基本革命工作技能培训而之后进行其他革命工作的，请联系丧钟组织，学习班或工人讲习所就在这里。
7. 想做翻译工作的（专门翻译统一战线的组织文章以及翻译国际重要的文章为中文），请联系统一战线邮箱。
8. 统一战线的官方推特也以启用，欢迎同志们关注。
9. 组织上的事宜（如代表自身组织加入统一战线组织或合作等）请联系统一战线的邮箱或推特说明情况。我们会在本文末提供这里提到的所有组织或机关的联系方式。

东风：<https://t.me/MarxismLeninismDongfeng>

斗争公社：douzhengyuekan@proton.me

革社（RSF）：RSF-kan@tutanota.com

到工人中去：letsstartnow111@proton.me

丧钟：t.me/knellofcapitalism

统一战线邮箱：sinomlm@tutanota.co

统一战线推特：[@MLMunionChina](https://twitter.com/MLMunionChina)

第六部分 斗争艺术

这部分主要关注革命工作中需要的各种斗争手段或技术。这里整编了一些国外内各方面同志的相关成果的文章，具有很突出的帮助实践作用、推动革命工作的意义。

清楚网络访问痕迹-避免网络追捕

革社（RSF）编辑部

一. 访问痕迹的产生

当你在互联网上搜索的东西。不只有搜索引擎会跟踪你的上网习惯，你访问的的每一个网站都会这么做。这意味着除了本地的访问痕迹，你在互联网上的每一次访问都会在被访问服务器和数据传输基站留下痕迹。

想要在互联网上保持秘密，不被寻踪觅迹，我们首先要清楚什么会产生痕迹。

在互联网访问中产生的痕迹，究其本质来讲是一种元数据，一种与网络活动者身份相关的身份数据。几乎每一种网络活动都会产生元数据，以最常见的网页浏览活动举例，尽管 HTTPS 协议已经普遍的使用于互联网的网页上，确保了网页访问的数据不容易被篡改。然而，HTTPS 协议并没有完全保护访问者的元数据。通过对访问数据（HTTPS 数据包）头部的解密，除了访问者的设备与被访问服务器外，访问者使用的网络路由，中转访问数据的各地传输基站等中间环节都可以从中获得访问者的信息，诸如：访问的网站，访问网站的时间，访问者使用的浏览器和操作系统的版本，访问者在浏览器上安装了什么附加组件，以及在访问者搜索的时候计算机上还运行着其他什么程序（一切能被访问网页调动的程序或和浏览器有绑定关系的程序）。这甚至能暴露你的设备硬件的细节，比如屏幕的分辨率和板载内存的容量（判断访问者是使用移动设备和台式），使得访问者的部分身份信息暴露在其他人的面前，成为暴露访问者真实身份的一个伏笔（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使用了旧版的谷歌浏览器进行加密的网络访问，可这个浏览器的版本过旧，在目前很少人使用，则网络监察部门可以通过监视平时是否有人使用相同版本的浏览器进行正常的网络访问，然后再把这个正常的网络访问数据特征和加密网络访问的数据特征进行对比，判断这两种数据访问是否是同一人所为）

可是，既然几乎每一种网络活动都会产生元数据（痕迹），访问者该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份数据不会暴露，访问者的一切网络活动不被追踪呢？只有通过清除本地的和线上的元数据（痕迹），才能确保网络访问活动是相对匿名的，难以被追踪的。

二. 元数据的清除

针对网络活动的元数据的清除主要分为本地和线上两种清除方式。

首先谈谈本地的（访问者设备本身的）清除方式。以谷歌浏览器的无痕模式为代表的消除本地元数据的网络访问方式是最为大众所知和所使用的一种清除本地元数据的方法。然而这种访问方式在目前存在严重的局限性，首先是这种访问方式只能清除本地的元数据，而不能清除数据在网络访问时产生的痕迹（数据包在传输过程中仍然存在被解包和审查的威胁），其次是这种清除本地元数据的方式是不彻底的，仍然可能会在本地留下痕迹（比如在这个访问过程中缓存的一些数据残留）。

因此，想要从形式上确保网络访问痕迹被清除，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 尽可能为网络访问活动营造一个秘密的访问环境，一些监控软件（在电脑上表现为腾讯系，阿里系的软件，国产输入法等。在手机上表现为学习强国，美图秀秀等。）会实时从系统中

监控网络访问活动，此时浏览器的无痕模式也失去了其作用。（无痕模式对一些元数据的删除需要到结束浏览器后才会执行）因此，需要给网络访问活动提供一个相对秘密的访问环境，除了老生常谈的使用专门用于从事特殊网络活动的设备以外，还可以通过构建虚拟机（移动端则是双系统空间）等方式在系统内创造一个相对隔离的环境，避免系统内的监视软件对本地网络访问活动的监视。

2. 使用正确的浏览器和插件 大部分国产浏览器都是基于谷歌或火狐浏览器为内核进行开发的，并在这个基础上添加了大量的监控程序于其中，因此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使用任何国产浏览器，选择使用 Chrome, Firefox, Tor 等相对安全的浏览器作为网络访问的基础。

在选择正确的浏览器之后，还需要对这个基础的访问工具进行加固，加固的内容又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a. 关于防范网页脚本（JavaScript）的加固

一个现实的这方面的负面例子是，可以通过所谓的单像素图像文件或网络信标（web bug）来了解关于网站访问者的信息。例如一个空白的浏览器弹窗（实际上一个网页脚本），它是一个放在网页上某处的 1×1 像素的图像，尽管我们看不见，它也会被将其放置于此的第三方网站调用。其后端服务器会记录试图显示该图像的 IP 地址。由此监管部门可以通过与第三方网站的关系了解到该 IP 的实际网络活动。因此，在这方面需要通过一些第三方的插件对访问网络的基础工具-浏览器进行本地加固，以减少遭受网页脚本陷阱攻击的可能性。以本文推荐的 Chrome 和 Firefox 浏览器为例，Chrome 可安装 ScriptBlock 插件，Firefox 可安装 NoScript 插件，上文提及的 Tor 浏览器自带此类插件，故不需手动进行加固。需要注意的是，此类防范网页脚本（Script）可能会对访问页面造成影响，可能造成部分页面的部分功能无法使用，可根据访问的安全性和必要性自行考虑是否在访问此页面时打开此类插件。

b. 关于 cookie 方面的隐患

当访问者在进行网络访问时，经常会遇到是否记住此账号（记住此条搜索记录/记住密码）等提示，然而这些信息能够被记录下来，在访问者下次访问这个网页时仍然存在，是因为访问者在访问此网页时，在系统中生成了一个属于这个网页的 cookie（曲奇），这个 cookie 相当于访问者的临时身份证，只要持有这张身份证，访问者就可以省去身份验证（登录）的步骤，直接享受自己在该网页中的待遇（继承保存在网页中的信息）。然而，cookie 在便利了访问者进行网络访问时不需要进行重复的登录活动（或重复的输入活动）的同时，也给访问者带来的种种隐患。cookie 往往往往保存在访问者的本地设备中，一旦访问者的设备存在隐患（不论是系统上的还是软件上的），cookie 都极易被泄露出去，成为别人冒充身份的工具（通过 cookie 可以绕过账号密码进行登录活动，国内早期存在的 QQ 盗号行为往往就是这个原理）同时，cookie 可以被第三方（通常是广告代理商）获取和调用，cookie 能够向第三方提供关于你的账号和特定偏好的信息，第三方可以通过 cookie 对访问者进行身份建构，通过追踪构建的 cookie 身份来追踪访问者的网络访问活动。

因此，任何想要保护身份安全，避免网络访问痕迹泄漏的访问者都应该在每次网络访问活动结束后以后清除本地的 cookie，这个操作操作在浏览器中就可以完成。（考虑到清除全部 cookie 可能会给访问带来操作上的麻烦，可以仅清除重要网站的 cookie）

c. 指纹

目前普遍使用的网页协议 HTML5 自带了一项超级追踪功能，canvas 指纹跟踪。这是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网络跟踪工具。canvas 指纹跟踪会使用 HTML5 canvas 元素来绘制简单图像。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之一秒。图像的这种绘制过程发生在浏览器内部，你没法看到，但发出请求的网站可以看到绘制的结果。该指纹图像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串独一无二的数字，这串数字会指定向一位访问者（数字的生成机制和访问者的系统和访问软件有关，很难被替换掉，因此具有相对唯一的指向性）特定网站可以基于 canvas 指纹识别访问者的身份，并针对这个独特数字进行数据匹配，以追踪访问者在其他网站上的访问活动（与 cookie 的追踪方式类似）

canvas 指纹跟踪是一种伴随式的过程，它不需要访问者点击或做任何事，只需看一个网页，它就会自动完成。幸运的是，有可以屏蔽它的浏览器插件：火狐浏览器有 CanvasBlocker，谷歌 Chrome 有 CanvasFingerprintBlock，使用此类软件可以有效防止因为 canvas 指纹泄漏导致的网络追捕。（可以通过 amiunique.org 这一网站检查是否存在指纹泄漏风险）建立一个良好的访问环境，有利于确保网络监听机构在形式上无法通过网络痕迹对访问者进行网络追捕。

三.线上痕迹的清除

然而，可能造成网络痕迹残留的情况不仅存在于访问者的本地设备中，也可能存在于访问者的网络活动中，尤其是存在于访问者的访问内容中，下文将从三个部分说明可能存在网络痕迹残留的情况，以及消除网络访问的线上痕迹的方法。

1. 盲水印与特征码

盲水印与特征码是最为常见的被用于进行网络追踪的网络痕迹，究其本质，盲水印与特征码同样也是元数据，但却是相对特殊的元数据，很难或无法被去除，且和访问者的身份具有强相关性。盲水印与特征码在墙内被广泛的应用于网络追踪，用于确定访问者的真实身份，以知乎这个墙内信息平台举例。知乎作为墙内最大的信息产出平台，在该平台截图或转发的一切信息都带有元数据，这些元数据可能是潜藏在图片（主要是截图）底层的盲水印（肉眼看起来就是正常的图片，通过特殊的方式才可以看到的特殊数字信息），或是存在于转发链接中的特征码。（在文章 id 之后的一串代表转发人身份的特殊字符）需要注意的是，经过调查发现，国内的短视频平台除了网页使用链接后缀的特征码外，还会通过定制转发短链接的形式来进行追踪（不同于明显的后缀特征码，这种短链接本身就是一种带追踪性质的特征码，使得分享出去的链接和分享人的身份带有强绑定性）针对这种在访问过程中产生的网络痕迹，目前暂无相对完善的应对方法（主要是图片中的盲水印），而对于转发链接中存在的特征码，可以通过安装 ClearURLs 这一插件进行拦截（部分国内网站无效），对于已经形成的带有特征码的短链接，可以通过米发，b23.wtf 等工具对存在特征码的短链接进行还原，避免将含有自己特征码的链接泄漏出去，也避免打开含有钓鱼特征码的网站而被监管机构注意到。

2. 避免账号之间的串联

使用 xx（QQ/微信/邮箱/手机号）已经成为当下网络访问最常见的登录方式。然而这种登录方式在事实上为监管机构提供了一份自己的网络访问记录，同时也让监管机构冒名顶替登录变得轻而易举。因此任何访问者都要尽可能的避免使用快捷登录这一功能，做到一个网站一个账号，避免账号之间的信息串联，导致网络访问痕迹也被串联起来

3. 支付手段的隐患

毫无疑问的是，墙内是一个支付实名制的世界，因此一切访问过程中的支付行为都是事实上的实名行为，监管部门可以根据常见的支付手段（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支付软件）对一个人的网络访问行为进行追踪，通过监视特定网站的购买行为来监视可疑人物，或者通过公开的信息对支付行为的实际支付人进行反向追踪。因此，在网络活动的过程中，访问者应当尽可能的避免使用墙内的实名制支付手段进行支付，在遇到必须付费进行的特殊活动时，可以尝试通过购物卡或者虚拟货币等支付手段进行间接支付，避免因为支付行为而暴露网络活动痕迹。

四.最后

本文列举了几种可能在网络访问活动中导致访问者身份泄露，留下网络痕迹，招致网络追捕的隐患，并针对这些安全隐患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然而，每一位访问者想要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和防护手段，应该试着通过网络渠道获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捍卫隐私》一书，该书可以很好的增强每一位访问者在隐私安全方面的意识和应对能力。